目　　录

导言　从人的角度看不发达问题

两 个 家 庭

艾非一家

在非洲中西部，居住着一家人。这个过着俭朴生活的家庭，说明了本书中我们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称这个家庭为艾非家庭。他们的真实姓名是无关紧要的，他们究竟住在哪里也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他们是生活在世界上通常被称为"不发达"的那部分地区的一个家庭。

艾非一家共五口人。母亲和父亲都在35岁上下。他们生了五个孩子，活着的有两个，一个在一岁多时因热病死去，还有两个生下来就死去。活着的两个孩子中，一个是男孩，13岁，一个是女孩，两岁。这个家中的第五个人是艾非的父亲。他是在他们家度晚年的，因为他既老且病，已不能工作。虽然照顾他是一种麻烦，而且他是一个必须养活的非生产的家庭成员，不能对家庭收入和家务有所贡献，但他们待他很好。

关于艾非一家，你可能会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共聚一堂的温暖。他们相互之间感受的爱，特别是他们对年老无用的祖父的和善。另一件你可能会注意到的事，是他们的生活情趣，他们怎样仰头捧腹大笑等。这种大笑近来已很少为人们听到，但在非洲像艾非这样的家庭中仍能听到。第三个你可能从艾非家得到的印象是，你看到了聪明、机灵和有天才的人民。尽管他们从

来不谈离家十英里之外发生的任何事情，尽管他们的家庭环境和工作方式是原始的。

你也许会感到，艾非一家不是很有抱负的。看来他们没有奋发向上的那种"升入上层社会的可变性"。当你想到他们的本能时，你可能会感到不可思议。但当你更了解他们时，你将知道，他们常常生病。他们患有痢疾、疟疾、钩虫病，经常受到热带寄生虫的袭击。他们有时挨饿，他们会向你隐瞒这一点。但如果你观察他们吃饭，你就会了解，他们每天平均摄取的卡罗里不超过1700—1800，而欧洲人或美国人则为2500—3000。他们经常不吃午餐，而是连续数小时地把果核含在嘴里舐，以此减轻饥饿的感觉。他们很少吃肉，只是偶然吃些从树林中打猎得来的鸡或小动物。他们食用能够得到的木薯根、豆子、花生、大米或水果，并用随便什么可以得到的东西来补充这些主食。这是一种低蛋白质，高碳水化合物的伙食：它可以借此抑止饥饿的痛苦，但不能使人精力旺盛，劲头很足和奋力工作。

而且，艾非先生也没有什么选择职业的机会。在他的村里没有一种可使他得到一个职业的工业。他希望成为一名政府工作者，但这对他说来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学过阅读和写字，他和大多数村里的人一样，靠从灌木丛中开出小块耕地来谋生。他用土制工具进行耕作；种一年，闲置三四年，等那地力消耗了的贫瘠的土地恢复它的矿物质含量。第二年，他到另一块土地上耕作，第三年，又换一块地，如此而往。他住的房子和村里其他的房子一样，竹架泥墙茅草顶，还有用圆石子垒起来的炉灶。白蚁啃食房子的木头框架时，房子倒塌，他得重盖他的房子。他想有一个洋铁皮的屋顶，但是，这对于他来说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他在一年中能动用的现钱只有50美元。而这50美元中，他还得设法购买副食品、衣服、烟草、饮料和医药品。

然而，人们没有注意到，艾非是个相当特别的人。即使在他谈论耕作或茅草屋顶这类家务事时，他那清晰的头脑和敏锐的思想也会给你很深的印象。他出人意料地谈论很多过去的事。他没有读过一本历史书，这是当然的，但他对于他的人民的过去很感兴趣。他指出，由于长期的殖民主义的统治，他的人民有着一个被隔断了的过去。因此，在殖民地时代以前发生过什么事，生活着什么样的人，他们做了些什么事，现在他们已经记不清楚。譬如，他猜想那时的房子和他村子北边山上已变成废墟的房子是一样的。毫无疑问，艾非对事物有着可以通过教育培养起来的深切和浓厚的兴趣。

虽然他很少见到机器，但他对于机械的东西很感兴趣。一天，他观看一位政府工程师使用抽水机，一看看了几小时，工人们刚走开，他就把机器拆开，看它是怎么动的。工人们看到他拆机器，生气地把他赶跑了。如果他是生活在发达国家中的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也许会成为工程师。

他还有领导的才能。他村里的人常去他那儿征求意见和指导，然而，他的领导才能对于他那工作繁重和目标巨大的国家来说是很少用处的，因为关于国家发展的新闻是如此微少和遥远。国内新闻，发展的政策等对这个村子来说都没有多大的意义。有些村里人甚至还不很清楚他们的国家是否已经独立。

艾非一家中的其他人也是有天才有能力的人。那位母亲是编制色彩绚丽的筐子和篮子的巧手。她用村子附近生长的藤条编制这些东西。那13岁的男孩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能在听过一首当地的歌曲后准确地重唱出来。可惜他在念完三年级后再也没有念书了。他曾不得不在灌木丛中步行六里才能走到学校。三年级时，他患了寄生虫和疟疾病，病得很厉害，在学校上半天课就得搭拉着脑袋，靠到桌子上。老师不喜欢他这种行为，他同学校的关系

越来越糟，最后终于离开了学校，开始帮助家里干农活。当然，他已学会了阅读一些简单的材料。在他离开学校后，偶尔也问过他的父亲，他们是否应看看报纸。但他们没钱买报，没书可借。由于缺少实践，这孩子的阅读能力渐渐消失了。他还能写他自己的名字，他父亲有时也要他写给尊贵的客人们看。

关于艾非一家，还有好多可谈的。但总起来说，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家庭是一种没有充分利用的资源。你看到他们后，离开时会想，只要他们的伙食好一点，他们就会更有活力；只要有人清楚地向他们劝说为什么应该把水烧开；只要他们能受到教育，以充分使用他们的才能；只要那聪明伶俐的男孩在三年级时不失学；只要艾非一家的人力不被浪费于从事无专门才能、只是为了维持生计的农业，而是受到教育，使他的聪明和好奇心以及他的领导才能能够被妥当地用来为自己及其邻居们谋福利；那么像他那样能干的家庭就能积极参加他家乡的建设来发展他的国家！

这些就是在你遇到艾非一家后所产生的一些思想。现在，让我们挪到数千里之外，再看看另一个家庭。

巴尼一家

巴尼不是他们的真名字。但这样称呼他们比较方便。他们住在亚洲南部一个很古老的国家里。那里的人对他们的过去比艾非家记得更清楚。因此，巴尼家的生活继承了丰富的宗教、哲学、诗歌和艺术的遗产。许多过去的纪念碑仍然以原有的辉煌竖立在那里，供众人观赏。但是，在经济方面，巴尼的国家几乎和艾非的国家一样的不发达。

虽然艾非家和巴尼家的食物是不同的，但就他们能够得到多少吃的东西而言，可能没有多大的不同。巴尼家种大米，这是他们的主食。有时他们只吃大米，有时把大米和豆子或用胡椒等调

味品制成的热的调味汁放在一起吃。偶尔，他们也有一些家禽或肉食。他们摄取的卡罗里超过2000的日子是很少的。

巴尼家给人的印象比艾非家更加健康和富有生气，他们是很好看的人——矮个子、深肤色、明亮的眼睛，加上宽大和聪颖的面庞。他们可能比艾非家较少得慢性病或虚弱病，但他们国内流行瘟疫病。他们的孩子经常因天花或霍乱而死亡，或在分娩时因并发症而夭折。

艾非家有5口人，巴尼家有14口人，他们的家庭生活看来是不同的。巴尼一家人都住在一起，共住4个单间房子，有一垛小院墙把院子同村里的其他部分隔开。他们实际上是三家人。巴尼家的家长和他的妻子住在院子角落的房间里。像其他房子一样，他们的房子是用泥土盖的，泥土被压实、晒干，在太阳下焙晒成像水泥一样。和所有其他的房间一样，他们只有一间屋，并且几乎是没有家具的，在邻接的两个房间里，居住着他们的两个儿子及其妻儿。巴尼家的家长有50来岁，在这个国家是年老的了。两个儿子都是机警、聪明的人，他们都靠近40岁了。比他们苗条的黑眼珠的妻子都要稍微大一点。院子里还有一间房子近来因为死了人而空着，留待一个孩子结婚时用。

家中儿子结婚时，他们把妻子带到家里住在院子里。女儿结婚时，她出去住在丈夫家。这种形式的家庭称为大家庭，在这样的大家庭中，一个人不会感到孤独，几家的孩子在一起玩，大人在一起干活。温和的大水牛和小公牛同人们一起呆在院子里。白天，女人们一起说东道西，傍晚，他们坐在门外，男人们抽烟偶尔也传出歌声。那家长回忆一个关于巴尼家的传说，孩子们出神地听着，在黑暗中，他们的眼睛显得又大又白。他们黎明即起，天黑不久就睡觉，在一年中天热的时候，他们在院子里露天睡觉，人和动物一起睡在晴朗的天空下。

尽管他们财产不多，但他们共同分享他们的财产，一起耕种他们很少的几亩土地。全家要作决定时，他们就去家长那儿。家长经过沉思默想，最后他的话就是全家的决定。虽然有时孩子们会摇摇头表示失望，但在这类事情上是很少发生争论的。那家长是一位善良而粗暴的统治者，他的决定很少受到挑战。如果年轻人不同意他的意见，他们不是顺从，便得离家出走。事实上，巴尼家的两个儿子已经出走。家长曾把两个儿子送到学校去读书。他们带着新的思想，特别是带着找职业、挣工资的思想回家。但在家里，他们的思想得不到什么同情。所以有一天，他们到城里找工作，一去不回了。这对那位家长来说是个惨痛的教训，他从不当众谈起他那两个儿子。

事实上，目前这位家长只是在几年前才取得他在家中的这种显要地位的。因为他自己的父亲非常长寿，在去世之前一直掌管着一家的权力。这位家长年复一年地等待着继承他父亲的地位。他看到自己的兄弟们相继死去，看到他的儿子们长大娶媳成亲，看到孙子一辈长大快要结婚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得侍奉他年长的甚至有点怪癖的父亲。随着岁月的消逝，他越来越感到意气消沉。现在，他的大儿子尊敬他，听从他的差唤。

眼下巴尼家的院子里有点紧张起来了，因为变革之风已吹到了这个村庄。譬如说，政府正在派出社团发展工作者，设法增加农业生产。他们同巴尼的儿子谈了这件事，巴尼的儿子回家把这事报告了他们的父亲。

这两个年轻人说："这些人说，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耕种，我们的大米收成可以更多些。"

家长问："为什么我们要生产更多的大米？"

"他们希望我们生产更多的大米，卖掉大米好换钱。"

家长说："钱是麻烦的东西。"

“用这钱，你可以给母亲买一件新衣。”

“她有一件衣服，她把新衣服放在哪里呢？”

“用这钱，我们可以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去。”

“家长问，那他们会离开我们而到城里去？”

他的声音很严厉，自从那两兄弟逃跑到城里后，巴尼家没有一个人上过学。那两位年轻人知道，向他们的父亲谈论政府所提倡的变革还不是时候。

你想想，如果那父亲更年轻些的话……或者，家庭制度使年轻人在家中有更多决定权的话……

在这个村子里，变革来得很艰难。那里的老人都是决策者。他们常常作出保守的决定。牢固的种族等级制度限制人们去从事人人都可以追求的各种工作。这种制度对于妇女能干什么工作，能起什么作用都有严格的规定。政府一直在设法打破这些规矩，但这种事很难通过法律来实现，旧的风俗习惯经久不废。全村的制度趋向于因循守旧而反对创新。在村里你会听到，几年前有个巴尼家的邻居由于坚决反对村里传统的耕作方法和不听老人的劝告而经历的遭遇。他似乎因此取得了一点成就，但他失去了朋友，他的朋友们不再同他说话，他们的妻子也不再同他的妻子说话。一天晚上，不知道是出于偶然还是有人故意安排的，一些公牛闯进了他的田里，不久之后，他又恢复到用老法耕作了。

所以，这个村子有它自己推行它的风俗习惯的办法。然而，你对巴尼家的家长越了解，你就会越清楚地知道，他的反对变革的态度并不是由于他的顽固不化。相反，他是考虑慎重的。他已学会在一小块土地上耕种。他知道坏收成意味着饥饿。多少年来，他已学会用一种比较稳妥和安全的方法来耕种。他从他自己的父亲那里学会耕种，他看到他的邻居和他父亲一样耕种。五十多年的不断摸索使他掌握了耕种的技巧，他相信这些学到的东西。他

没有理由相信一个带着关于变革现状的奇特的建议、从远道而来的政府人员。老式的、经过试验的、就近的、他自己做过的总是保险的；遥远的、新的总是不可靠的。现在，他对全家负有全部的责任。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理由不愿冒险行事。

而且，他在村里听到的有些关于变革的建议伤害了他坚定的信念。他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有着一种强烈的感情。在他看来，人竟然有意地操纵自然，使自然界为人服务，这是不对的；他对于杀生（指不该杀生——译者）也有同样强烈的信念。这类信念是这个国家里一些最神圣的人物和最伟大的著作所宣扬的。

而且，他还受村里制度的约束。这个村子有它推行自己准则的办法，顺应老的准则要比设法引进新的准则容易得多，而且更使人愉快。

没有社会模式的改变，什么也不会使巴尼一家很容易地得到改变。

老巴尼比他的外表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他矮小、瘦削，由于年老加之天热而显得形容枯槁。十五岁时得了一场几乎使他丧命的天花，脸上还留下了麻点。但是在村里，他仍然是享有尊严和惹人注意的人物。他作决定时考虑周到；他对待这个大家庭持重而仁爱。他讲话常用他们人民中流行的诗歌的调子，讲得出人意外的好。他年轻时学过许多诗，记下来了。他还记得许多古老的传说，常常给孩子们讲。他目不识丁，但他决不是无知的。的确，他积累了大量的民间知识、谚语、箴言和普通常识。他没有远离过他的家，他也没有和科学或现代政治打过交道，但他对所看到了的东西——他真正感觉到了的东西——有很深的体会，能够活龙活现地谈论它。他决不是一个迟钝和愚笨的人，他只不过是一个受到限制的人。

我们也许可以把巴尼家称为受限制的人，他们受到保守的领

导、严格的社会制度和村里传统准则的限制；在所能受到的教育和得到信息方面以及被准许创新改革方面受到限制；在他们能够用他们本能的智力和精力帮助国家发展的程度上受到限制。

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需要社会的改造，这从巴尼家可以比艾非家的情况看得更加清楚。而一个社会的改造基本上是一群人的改造——人们将受到教育、获得信息，他们的态度、价值观将要改变，人的关系、风俗习惯、社会行为将得到重新评价和重新考虑。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要求农田提高生产力，使部分人力资源能够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中去。但是，即使是像巴尼家的一个儿子离开农家到城里去找工作——今后十年内他的成千上万的同胞都会这样做的——那样简单的事，都会引起一系列人的问题，并向社会制度提出了挑战。在每个社会问题中，都存在着人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

这可以说是一种规律：

> 国家的经济要有发展，必须有社会的改造，为了使社会得到改造，就必须动员人力资源，必须解决难弄的人的问题。

富国和穷国

我们从巴尼家和艾非家的情况写起，因为本书所涉及的就是他们这样的人。他们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在那些国家里，变革之风正在劲吹。

按照联合国的说法，一个人均收入为300美元或不到300美元的国家就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发达国家"的全部意思。这类国家并不是在一切方面都是不发达

的：它可能在经济上不发达，但在某些个人关系方面（像艾非家那样）或在艺术、哲学方面（像巴尼家那样）是高度发达的。在这样的国家里，并非所有的人在经济上都是不发达的：在巴尼的国家里，有少数富有的地主和很少的几家大工业散落在小块农田和贫苦的人民之中；在艾非的国内，大多数人民不会读书写字，但极少数人从欧洲的一些最古老的大学里获得了高级的学位。所以，如果把巴尼一家和艾非一家看作是"不发达的人"那是毫无意义的，虽然他们的确代表着一种没有充分使用的资源。他们能够干些什么是受他们所处社会环境限制的，是受贫穷和缺乏教育等情况限制的。经济和社会一发展，人们的行为就会不同了。

因此，"不发达"并不是一个贬意词。它只是表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必然到来的社会变革）还没有通过某一点。而被称为"发展中国家"则是一种光荣的标志，因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已经着手用自己的力量来摆脱经济不发达的状态而使自己得到提高，并且用不到几十年的时间来完成早先历史上通常要用几个世纪来完成的事情。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民分成两个集团：人均收入为300美元或不到300美元的国家（即"不发达国家"）的公民为一个集团，所有其他国家的公民为另一个集团。假如有可能把这两大集团的人集合在几个大的公开场所，使你可以乘一架喷气式飞机从空中看到他们，那么你将会看到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经济上不发达国家的人数比其他国家的人数要多一倍！

在地球上2/3的人居住着的一些国家里，平均五口之家每年的现金、实物或劳务收入不到1500美元。而还有许多国家还远远少于这个数字。在巴尼和艾非家居住的地方，平均五口之家每人的总收入不到300美元，而这些钱至少有2/3必须用于食物，剩下不到100美元用于衣服、住房、医药开支、教育和零用。这收入同在

一个经济先进国家里的平均收入之间的差距可能达到25：1。德舒穆克指出，在印度总人口中，不到1%的人的收入相当于或大于美国公民的平均收入，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事实之一。

世界上国民人均收入不到300美元的2/3人口分布在哪些地方？(参阅表1)

这些地方包括除南非联邦之外的整个非洲；除新加坡之外的整个南亚地区；除日本之外的整个东亚地区；除苏联扩展到亚洲心脏地带部分之外的整个中亚地区；因此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稠密的国家也包括在内。这些地区还包括除了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牙买加、巴拿马和委内瑞拉之外的拉丁美洲各国；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的大多数太平洋岛屿。几乎全部中东以及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葡萄牙、南斯拉夫等欧洲国家也包括在内。这些就是世界上的不发达地区。

这些不发达地区和其他地区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地理条件不同吗？不发达和发达地区的分布状况虽不完全与世界上各个洲有关，但基本上是由洲来划分的。例如，欧洲的大部分是很发达的；亚洲的大部分是不发达的；但是，日本的情况证明，一个亚洲国家可以是个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国家。是气候条件不同吗？大多数较不发达的国家处在温暖地区，但并不是所有不发达国家都在那些地方。埃及、叙利亚、希腊等过去曾是十分繁荣而今天已不那么繁荣的国家，都是在气候温暖的地方。资源条件不同吗？在发达国家中，并没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譬如说，瑞典在自然资源方面就比印尼和巴西贫乏得多。是扩展的余地不同吗？美国、苏联和澳大利亚有广阔的土地，但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同样有广阔的土地。而亚洲最繁荣的国家是世界上人口最拥挤的国家之一。①

表1　1958年世界各国人均产值的排列(以美元计算)

100美元或少于100美元		101美元—300美元		301美元—600美元	601—1000美元	1001—2000美元
亚丁	新几内亚(澳大利亚)	阿尔及利亚	黎巴嫩	阿根廷	奥地利	澳大利亚
阿富汗		巴巴多斯	利比里亚	智利	丹麦	比利时
安哥拉	尼日尔	巴西	利比亚	哥伦比亚	芬兰	加拿大
不丹	尼日利亚	英属婆罗州	马达加斯加	哥斯达黎加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法国
玻利维亚	巴基斯坦	英属圭亚那	马来西亚	古巴	冰岛	卢森堡
缅甸	巴布亚	喀麦隆	马里	塞浦路斯	荷兰	新西兰
布隆迪	葡属几内亚	中非共和国	毛里塔尼亚	希腊	委内瑞拉	挪威
柬埔寨	葡属帝汶	锡兰	毛里求斯	瓜德罗普	西柏林	瑞典
乍得	卢旺达	中国(台湾)	墨西哥	爱尔兰		瑞士
刚果(利奥波得维尔)	塞拉勒窝内	刚果(布拉柴维尔)	摩洛哥	以色列		英国
	索马里亚		尼加拉瓜	意大利		
达荷美	苏丹	多米尼加共和国	巴拉圭	牙买加		2000美元以上
埃塞俄比亚	坦噶尼喀		秘鲁	马耳他和戈佐		美国
冈比亚	泰国	厄瓜多尔	菲律宾	马提尼克		
		萨尔瓦多				

海地	多哥	斐济	南朝鲜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印度	乌干达	加蓬	葡萄牙	桑给巴尔		
印度尼西亚	上沃尔特	加纳	留尼汪	巴拿马		
肯尼亚	越南	危地马拉	罗得西亚	波多黎各		
老挝	也门	几内亚	尼亚萨兰	新加坡		
莫三鼻给	西伊里安	洪都拉斯	琉球群岛	南非		
马斯喀特和阿曼		香港	沙特阿拉伯	西班牙		
尼泊尔		伊朗	塞内加尔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伊拉克	苏里南	乌拉圭		
		象牙海岸	叙利亚			
		日本	突尼斯			
		约旦	土耳其			

资料来源：1962年国家年鉴统计说明(联合国，1963)

是种族不同吗？的确，大多数主要为白种人定居的地方，经济上相当发达。但是，有许多白人国家在经济上并不很发达。现在，不同种族和不同肤色的人民在为争取发达而进行的必要的工作中，已经表现得很出色。

是新老不同吗？在不发达地区，新兴国家的确占有很大比例，包括许多不久前取得独立的国家都在不发达地区。但并不是所有不发达的国家都是新兴国家。如埃塞俄比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谢巴皇后时期，而且在几个世纪前就已获得独立。有些较不发达国家在1000—3000年前还曾是世界领袖。

只有一个区别是普遍适用的。这就是：较多高度发达的国家都曾经历过产业革命或类似的革命；而不发达国家则没有经历过这种革命，或者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或只是在有限的居民阶层中经历过。许多不发达的国家还没有为一场产业革命作好准备。曾推动欧洲产业革命的值得注意的因素在其他地方还没有出现。在西欧，文艺复兴、广泛的政治自由、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进步、商业和资本的发展、居民中事业家和发明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以及有利于势在必行的改革的思想，都为产业革命开辟了道路。[②]这种革命很快被输出到北美的欧洲人中间；后来，又输出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欧洲人之中。更晚些时候，日本、苏联和阿根廷经历了他们自己的产业革命。某些19世纪完成这个任务要75—100年，而现在能够更快地完成这个事实，对于正在羡慕地仰望着经济高山的国家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励。

目前不发达的国家不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产业革命闹得正欢的时候离开产业革命中心最远的国家；就是情况很糟、无法利用这场革命的国家。现在这些国家都渴望着弥补它们失去的时间。我们正在注视着世界历史上激动人心的一个篇章。世界上2/3的人正在准备——至少他们的领导人正在设法准备——经历一场产业革

命。如果他们取得成功，他们将改变地球的面貌。

但是，为什么在现在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些人常常比另一些人贫穷。教育通常是富人的特权。人们的健康状况在一些地方总是比另一些地方要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存在特权和差异。那末，为什么恰恰在现在，有这么多人对这些问题感到担心？

一个原因是，现在有更多人了解到这些问题了。传播范围的大大扩展，使人们能清楚地了解这些情况了。公路通到了村里，汽车带着人们通过公路。喷气式飞机把国家和城市联接了起来。因此，村里的男人和女人们得以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城里人相比，不发达国家得以把它们的生活水准和经济上发达的国家相比。现在，简直再也不可能用"别处的人可能都有我们这样的问题"这种自我安慰的思想来回避问题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是太大了，人们无法忽视它。

殖民主义的结束和众多新兴国家的出现，已经给许多较不发达国家的人民以真正的机会来改善他们自己的经济状况。这些新兴国家都很焦急——至少他们的领导人是如此。他们不愿继续保持无正当权益的地位。他们希望与先进国家分享美好的生活。他们也许比那些较先进的国家更清楚地看到不发达和高度发达经济之间的巨大鸿沟。

为加速发展过程，新兴国家通常向发达程度较高的国家寻求帮助。他们要求老的较先进的国家给他们以经验和技能方面的帮助。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要求投资或提供经济援助。他们通常能够得到这种援助。这一事实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今天世界上大国集团之间的竞争，但它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明了世界道德心的复活。

这种世界道德心部分是被对于殖民主义的反感刺激起来的。改善了的传播条件也推动了这种道德心的复活，就像它帮助穷人

知道别国人民怎样生活一样。世界各地已出现了大量的关于新兴国家的新闻报道。高度发达国家里到国外旅行的人数大大增加。在过去的25年中，海外驻军人数也大大增加，而他们通常驻扎在偏僻的地方，这使许多年轻人能有机会看到别国人民是怎样生活的。许多先进国家已把教育工作的重点从过去转移到现在。因此，关于当今世界的报道也更加充分了。

除了这些发展之外，已经出现了一种相当普遍的感觉，即科学所赐予的福祉应当被分享。科学是一种财富，它和早先强国所有的财产颇不相同。科学家和海盗、殖民主义者也不相同。科学家自已通常总是感到他们的知识应当被分享。和土地、黄金等物不同，科学知识能够被分享而不致减少国库的财产。所有这些因素归到一起，产生了历史上可能被称之为大规模的道德心和某种观点的出现，这种观点对于过去那些经济强盗巨商们来说无疑是不可理解的。这是一种对于地球上一切穷人的经济条件的关心。

产生这种关心的另一个原因是世界上日益增长的互相依赖感。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一统天下"，但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近似乎"一统天下"。现在，保持稳定的局势不只是一两个国家就能办得到的事。很少数动乱地区可能打乱更加大得多的地区内的均势。像为了经济上的追求和提供经济机会而向西半球移民时那种大规模的人口移动，现在已经不再发生。很清楚，现在可能产生的问题必须在本地解决。联合国已给了不发达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发言权，承认了它们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并且为它们提供了在国际上陈述它们的问题和建立友好联盟关系的机会。在现代世界中，没有一个国家在商业上是自给自足的。因此，资源和产品流入和流出不发达国家本身就是一种相互依赖的重要因素。由于所有这些理由，想要闭关自守地解决穷国的经济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世界上强国对于在亚洲、非洲、中东地区的新

国家以及这些地区和拉美地区中多少有点古老而且不发达的国家所发生的事都十分关心，就是因为这种微妙的均衡关系和广泛的互相依赖关系的缘故。

然而，除了这些因素之外，世界上还产生了一种新的能力感——感到我们有工具也有技巧，可以做一些事来对付贫困、疾病、文盲以及原始的生活条件等灾难。这部分是由于生物、化学和物理学的巨大成就及其在医学和工程学中的应用。现在，对于一些在非特权社会中一直成为人们的灾难的许多疾病和瘟疫，已经比较容易根除了。而且可以得到能源以及用机械来延伸人的体力劳动的新方法。人们不仅对科学的信心越来越大，而且对工业技巧和经验也产生了信心。过去，工业曾经是一种赌博，只有很少的人才能获得成功。现在工业已超越了这个阶段。在工业化的国家中，组织生产和分配的办法已为人所熟知，并取得了广泛的试验。很多人已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人们对于人类变革社会的能力的信心也比过去更大了。这部分是由于近年来在许多国家和体系中进行的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产生了经济效益，部分是由于人们对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组织的了解越来越多，部分是由于不断发展的传播技巧和不断改进的传播工具促使人们能向大量的人进行有效的传播。换言之，管理社会已不再完全是一种神秘莫测的事了。如果说，存在于非特权社会中的问题是巨大的。那末，现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工具、技巧和知识也是很多的。因此，现在人们都认为，普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这种工作虽是艰难的，花费大的，但已不再是不可能的了。

所有这些环境形成了一种使命感，促使人们考虑国家发展的问题。难道人类的命运注定是战争、疾病和无知吗？难道靠人的力量最终不能实现只有在幻想小说中才出现过的世界和平、福利、健康、教育和获得信息的愿望吗？难道看到这种假设的乌托

邦景象成为现实不应该是现在活着的这几代人命中注定的吗？

这些就是为什么现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十分关注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原因。

人的问题

当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谈到不发达意味着什么，解释他们的国家为什么如此艰苦地工作以求得经济发展的时候，他们几乎总要用关系到人的说法来加以表述。如人均国民收入相差100美元，人均能源使用上的差距相当于一吨煤，能读报或听广播的成人人数相差10%等等——这些差别不仅仅用生产力和收支平衡表来反映，而且也从人类的生活中得到反映。

福雷斯特·D·默登在谈到不发达地区时说，"这些地区的人民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有着很多相同的问题和悲惨的历史。他们贫穷、患病、饥饿；他们居住条件很糟；他们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他们死得早、生育多，差不多一个月要增加一百万人口。"③

这是今天人类不发达问题的一个方面，艾非家和巴尼家的情况已说明了这一点。他们每天摄取1800卡罗里的热量，如果他们生活在北欧，他们可摄取3000卡罗里。艾非家所在的地区平均3500人有一个医生，而在捷克和苏联，医生的人数按人口比例来说相当于艾非家所在地区的60倍。艾非家和巴尼家只能指望他们的孩子平均活到35岁左右。如果他们生活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他们的孩子们可以活到70岁左右。在读书、识字和参与公众事务等等方面，艾非家、巴尼家和经济发达国家中的人民相比，都处于不利地位。不发达所意味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但是，这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当前不发达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变革正在发生。世界上像艾非和巴尼那样的家庭正在被引进

现代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接受这种变革是不易的。由于文盲和无知，他们迄今为止对于参加这种变革在思想上还缺乏准备。对他们来说，不参加争取国家发展的斗争或不参加向现代生活进军的行列，可能会更加愉快。但这是不现实的，不发达国家的人民没有一个可以躲避现代生活的洞穴。即使他们想躲避，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去躲避，而现代生活将以某种别人已发明出来的办法把他们寻找出来。

J·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承认某些工业化的弊病和昔日某些生活方式的吸引力。但他自己却仍致力于"创新和变革的活动"。他说，"我们的思想将变得生气勃勃和富有进取精神，新的局面将产生新的经验。"④这就是时代向不发达国家的人民提出的挑战——把他们呆滞的传统社会改变得"富有活力，富有进取性和朝气蓬勃"。

今天，不发达地区还存在着人的另一方面的问题，这是由于不发达国家存在着比艾非和巴尼家更大的问题。每个国家都急需动员他们的人力资源。这些人力资源就是艾非和巴尼家那样的人。他们对自己村庄以外的事知道得很少，对于科学、现代农业，对于他们国家为经济发展所作的努力以及国家的责任都知道得很少。尽管他们有天生的能力、优良的品质和可以发挥的领导能力。要在他们中建立一个现代社会，人力的基础是薄弱的，除非他们改变，否则，他们将成为技术进步的旁观者。社会变革将在他们中降临，而不是由他们起积极作用来实现。他们将成为较少活力不起作用的一部分群众，而他们国内领导国家开发的人正在设法把他们中的一些人塑造成"生气勃勃的人"。

一些百废待兴的国家是享受不起这样一批无活力的群众的。他们需要得到村里人和城里人积极和明智的合作。人力资源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们将不得不加速信息的流通，向那些从

来没有得到教育机会的地方提供教育。广泛地传授文化和技艺知识，这是他们能够唤醒和准备他们的民众去攀登经济高峰的唯一办法。使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并能按他们的设想如期实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是充分利用现代的传播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

注　释

1. C·D·德施穆克："东南亚的经济紧张和社会发展"，世界紧张委员会编《动乱的国家》第126页，伦敦，1962年。
2. 例如，M·韦伯在《新教伦理学和资本主义精神》(纽约，1930年)中，从社会规范的角度对西欧的发展做了许多解释，这种规范较之行乐更加重视努力工作和取得成就。
3. F·D·默登：《新闻摘要丛书》第6页，纽约，1956年。
4. J·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414页，伦敦，1946年。

第一章　信息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发展的过程

现代传播方法进入传统村落后所能够产生的力量，是所有见到过的人都不会怀疑的。一次，我在中东的一个与四周隔绝的村庄里，看到一台无线电收音机在头人家里播放。这台收音机村里人是第一次见到它显示出“知识就是力量”。它表明了它的拥有者的身份。头人第一个从它那里得到消息，并控制着是否让别人听。对于他和所有听广播的人，这台小小的收音机成了带着他们飞到另一个天地去的“魔毯”。但是，显示这台收音机效果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情景，是那些以前主要通过收税人或兵士了解上级政府的村民。他们第一次听到领导者的发言人邀请他们参与管理国家大事，他们面部流露出来的惊奇、怀疑和有点迷茫的表情，构成一幅令人难忘的图画。

一辆电影放映车在一个非洲村落招来的欢呼声，是凡听到过的人都不会忘记的。传播的影响虽不那么迅速和带有戏剧性，但也可以在一条通往一个村庄的新路开通时看到。陌生人来到村里出售商品、交换思想和新闻。村民们到附近的城市去，带回来新的生活标准和风俗习惯。于是变革开始了。

现代传播对发展中的文化能够产生影响，这是无疑的。为了了解现代传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对发展过程本身作一简单的研究。

基本动力

经济发展的实质，是社会经济生产力的迅速增长。所有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都同意这一点。这里我们将集中谈谈各种理论的某些共同点，而不是它们的不同点。生产力是关键。现代社会中最富有生产力的部门是工业部门。工业已成为一部用越来越少的工人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的大机器。利用越来越细的劳动分工和技能的专门化，工业已将分散的劳动动作组织成为一种合作的积累的过程，使人的有限的力量通过水力、燃烧、电力或核能所产生的巨大能量而成倍地增长起来，通过使尽可能多的工作实现机械化——在我们的时代，主要是自动化——的办法，将人有限的注意力和管理能力得到延伸。同样的人数，在被组织到工业中去之后，能生产出比他们用手工生产多得不计其数的产品。

因此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一直放在如何节约地把资源投入到社会生产力最强的部门。资本必须用于投资，以产生更大的资本。除非有某些极丰富的资源可以被利用，或者能够从较富有的国家寻求特别的帮助，否则，用于投资的资本就只能从节约中积累。因此，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节约并用以进行生产力的投资。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的“铁的规律”是：国家的投资、投资引起的生产力的增长和人口的增长，三者的相互作用构成经济增长。举例说，就是一个国家能够把它收入的7%节约下来用以投资。这个数字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是相当普遍的。假如这种投资的平均增长率为25%，即每一美元的投资能赚取0.25美元，那末经济增长率就是每年1.75%(投资×资本增长率)。假如人口的增长率也是每年1.75%(世界平均人口增长率差不多是这个数字)，那末，经济的增长只是刚刚赶上人口的增长。但如果人口的每年

增长率高于1.75%，那末，这个国家尽管在经济发展方面作了种种的努力，仍将比以前相对说来更加穷困些。而如果人口增长率低于1.75%，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在经济上得到发展。

如果一个国家能节约收入的20%用于投资，并得到平均生产增长率为30%的回报，那末，它的年经济增长率将为6%。如果它能控制人口增长，比如使之不超过平均年增长率1.75%，那么它的人均国民收入将增加到例如像巴西曾有过的那种速度。

这里，我们把发展过程简单化了。关于怎样节约和投资，有许多微妙之处，我们在此不能多加考虑了。但我们会看到，工业投资必然与社会其他部门的投资和发展有关。基本的问题是我们谈到过的：一个国家能给社会上生产力最强的部门投入多少资本；这种投资的增长率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过人口的增长率。

其他部门

但是，不论工业生产力有多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能将所有投资的收入都用于工业。计划的目标是使社会各部门得到均衡和互相关联的发展。①

因此，举例来说，农业(第一部门)必须现代化，使更少的耕种者能生产更多的食物，使一些农业人口能转移到工业(第二部门)中去工作。在许多高度发达的国家，10%—20%的劳动力可以供养人口的其余部分；但是，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里，可能有90%的劳动力在农场工作，却仍不能有足够的食物供养她的人民（见表二)。农业在许多不发达国家中的生产力的低下是显而易见的(如表三所示)。生产力低下的原因是古老的耕作方法，缺少肥料和农药，缺少农业机械，大部分农民从事自给自足的耕种，以及他们的不利于变革的态度。然而，通过农业的现代化，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得到很大的好处，并从而提高其生产力。因为这不仅

表2 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从事农业人口的比例

人均国民收入(%) 300或不到300美元		人均国民收入 301至600美元(%)		人均国民收入 600美元以上(%)	
巴西	58(1950)	阿根廷	25(1947)	英国	5(1951)
墨西哥	58(1958)	意大利	28(1961)	比利时	12(1947)
阿联	64(1947)	匈牙利	38(1960)	美国	12(1950)
巴基斯坦	65(1954/56)			加拿大	12(1961)
印度	71(1951)			西德	14(1960)
土耳其	77(1955)			瑞典	17(1960)
泰国	82(1960)			荷兰	19(1947)
				法国	26(1957)

材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1962年生产年鉴(1963, 罗马)

会把农民释放到工业中去，而且会增进国家的健康和活力。在许多以食品、水果或纤维为主要出口商品的国家，② 这还将有助于积累投资所需的资金。③

为了支持农业和工业，一个国家必须建立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基础设施"的社会部门，这些部门包括基本的运输，水利电力设备和传播事业。表四表明电力消费(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和发展阶段的密切关系。所有这些发展必须要动员人力资源。动员人力资源的主要活动——教育，有时被视为是第三产业的一部分；有时它自认为是人类动员任务的一部分，这种任务显然是牵涉到所有社会部门的。把教育归到哪个部门是小事。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国家要充分地使用它的人力资源，教育、识字训练、机器技能训练、

表3　1961/62年度不同国家每公顷土地的大米产量(单位：100公斤)

国家	产量	国家	产量
澳大利亚	66.3	印尼	18.4
意大利	54.6	缅甸	16.8
日本	47.0	印度	15.1
法国	40.6	危地马拉	14.0
美国	38.2	泰国	13.9
阿根廷	34.4	尼日利亚	12.6
中国(台湾)	32.1	伊拉克	10.7
罗马尼亚	29.2	柬埔寨	10.5
墨西哥	25.6	塞拉勒窝内	9.3
马来西亚	23.8		

材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1962年生产年鉴(1963，罗马)

健康状况的改善和足够的生活设备等等，都必须是发展计划中的一个部分。表五用识字率来表明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

我们所要说明的论点是，一个国家的农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必须开发到某种水平，才能准备向工业化作“大推进”。[④] 没有必要考虑哪一个是主要的推动者，例如是农业现代化影响工业发展，还是工业发展影响农业发展等。它们之间相互都有影响，这是无疑的。同样的相互影响关系也存在于工业和基础设施以及人力资源的开发之间。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同步发展。

因此，一个发展计划通常是不同部门的基本需要的妥协。例

表4　处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国家的商业性能耗　(人均1000千瓦/小时)

人均国民收入 300或不到300美元		人均国民收入 301至600美元		人均国民收入 600美元以上	
泰国	0.3	阿根廷	7.1	荷兰	17.8
巴基斯坦	0.6	意大利	8.4	法国	19.5
印度	1.0	匈牙利	11.0	西德	26.8
土耳其	1.8			比利时	32.8
埃及	2.1			瑞典	33.2
巴西	2.9			英国	39.8
墨西哥	5.7			美国	66.0

材料来源:N.金斯伯格编制的《经济发展图表集》(芝加哥大学学报1961年,P80)

表5　两大类成人识字率不同的国家

	国家的数目	识字人数百分比 0—25	26—50	51—75	76—100
三个主要的不发达地区——占有世界2/3人口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104	56	20	15	9
四个主要的发达地区——北美、欧洲、苏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33	0	0	15	85

材料来源：根据《50年代的文盲》中的数字推算(巴黎：教科文组织，1957)

如，处于相对早期发展阶段的尼日利亚，目前正在农业和工业中投入同样的投资——约各占计划投资总额的14%。它计划在基础设施中投入很大量的投资：将计划投资总额的21%用于交通运输，将15%用于电力，还有相当多的投资用于第三产业部门，包括10%用于教育，3%用于卫生保健，6%用于城乡计划。总起来说，目前的计划要求将15%的收入用于投资，预计其中8%将来自节约，其余部分将来自外援或外国投资。⑤

如尼日利亚的计划所示，发展必须在广阔的战线上向前推进。发展的过程的确是社会的大转变。只建立工厂生产机床是不够的，因为工业不能超越支持它的部门而很快发展。在支持工业发展的部门中，农业的根本改观、基础设施的建立、人力资源的动员和选拔等等，全都是发展很慢的。它们不能很快完成，不仅因为它们是花费昂贵的和困难的，而且也因为它们都需要人的很大程度的改变。

使传统的农业现代化，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这是因为它需要教给农民新技术和新态度，劝说他们放弃老的耕作方法和牢固持有的信念。提供现代交通、运输、电力和其他基础设施需要很长时间。因为它花费大，需要许多高度熟练的技术工人和经理人员。这类人才缺乏，必须加以训练。教育是缓慢的，这不仅因为训练人员、支付教师工资和建立学校是很费钱的事，而且也因为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法文将训练叫做"形成"。教育的目的是一个有新的见地、新技术和新目标的新人的形成。它的确需要很长的时间。经济发展所需的人类的各种改变需要很长时间，而且花费大、困难多。然而，米利肯和布莱克默雄辩地说："任何社会变革的最重要的条件是人本身必须改变。"⑥

在我们看来，这正是现代传播对于经济发展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因为信息的大众媒介作用和教育作为一种"新媒介"的

任务，是加速经济发展所需的社会转变，使这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变得容易些、特别是加速和顺利进行全国人力资源的动员。

动员人力资源

在某种意义上说，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动员了他们的人力资源。他们正在使用这些人力来搬运重物，开垦土地或从事其他工作。而这些工作在经济较先进的地方是用机器干的。一大群男人用手工工具刮平一个新的机场或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排着长队的妇女头顶着装有泥土或石头的篮子等情景，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是常见的事。在一些机器稀少人口众多的国家里，人的体力是最便宜也是最易于得到的能源。但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为昨天的需要而动员，而不是为明天的需要而动员。这不是攀登经济高峰所需要的那种动员。当机器不可避免地来到时，就将代替体力。正是为了这个新的世纪——人操纵机器而不是干机器所做的工作的世纪——发展中国家必须准备他们的人力。

F·哈比森最近研究了75个国家的人力问题，得到如下结论：

> 一个国家的进步首先而且最主要的是依靠它的人民的进步。除非它开发他们的精神和人的潜力，否则，它就不可能开发物质、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他方面。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基本问题不是自然资源的缺乏，而是人的资源的不发达。因此，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用更普通的话来说，即改善他们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的教育、技能，增进他们的抱负以及身心健康。⑦

教育、技能、希望：用另一句话来说，就是他们知道什么，能够做什么，以及对国家发达的总的态度是什么。这就是在国家能

够改变之前人必须要改变的方面。

例如，像马拉维那样的国家，它在某些新兴国家中不算好也不算坏。它有300万人口，直到1960年前后，中学毕业生仅800人，其中只有很少的人进了大学。虽然马拉维有它自己的政府和立法，但这意味着10个政府的高级职位中，有9个必须由外国人来担任，在大多数需要受过中等教育的职工的私营工业中，情况也是如此。马拉维全国大约只有6名医生、一名律师、一名工程师是非洲人。而非洲人的科学家一个也没有。没有一名受过从事秘书工作训练的本国男女。[8]显然，马拉维和像它那样的国家在发展技术和工业经济之前必须进行巨大的投资以提高人的素质。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人力资源方面存在着完全不同的问题。它现有的受过某种高等训练的人员是过剩的。它有那么多的大学毕业生，政府在国内不能为他们找到合适的工作，因而鼓励他们到大学毕业生少的国家去教书和工作。按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阿联的大学生比英国多，为西德的两倍。另一方面，中小学生的比例却相当低，人民的识字率也低。尽管大学毕业生过剩，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却严重缺乏。[9] 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它的大学有人满之患，其中很多人学习文科和法律(但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想从事法律工作)。同时、印度却缺少技术人员和熟练劳动力。它的全国识字率只有约25%。阿联和印度代表着那种可能必须重新制订教育和训练计划的国家。

任何渴望发展的新兴国家都必须进行大量的技术训练和教育工作，从识字训练到科研人员的培养。这包括科学种田、机床操作、修理无线电和摩托车、建筑、会计、秘书、工厂和办公室的经营管理、护理、医药和公共健康、土木工程、销售和新闻。要支持这些事业就必须有广泛的教育基础：即人口的相当大部分要能读、写、算，并能在政府中起积极作用。

P·库姆把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称为“一项重要的投资工业”。[10]现在，在经济学家中间，对于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动者水平的需要、以及为此而将大量资金投入教育事业的必要性，已不再有很多怀疑了。毋需进一步说明，我们就可以指出大众传播在这方面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它能做些什么来加速这个过程，并使这种投资继续进行下去？例如，它能在哪些方面代替尚未培训出来的教师，或帮助那些训练得不够好的教师？它在哪些方面能把最好的教育扩散到比一个教师通常所能覆盖的更广大的范围内去？它怎样能在学校之外把学习的机会扩大到家庭和社区里？

这类必须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训练是不同于经济上先进的国家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涉及到创造新的工作角色，如经营管理的角色。欠发达国家一向习惯于个体工作——个体耕种者、个体手工业者和家庭工业。工业和大规模建设的出现产生了使用多种机具的复杂的工作群体的问题。这些群体需要精密的管理，而发展中国家的管理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因为它处于经常不断的飞速变革之中。有人把这描写为如同骑在一匹正在变为大象的马上奔跑一样。工业生活中那些不断变化的部分必须一面成长，一面又能协调适应。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里，工业化的要素并不是按部就班地产生的。一个人不能先建工厂，然后再训练劳动力，再在工人中培养所需要的劳动态度，再购置机器和建造房屋。这些以及许多其他有关的工作都是同时进行的。因此，管理工作的课题之一就是使它们尽可能地协调一致。在工厂建好时而不是在建好前太久，原料、机器和工人必须准备好。人们必须读书、进学校，但只是在有机会将他们的新技能用于生产性活动之时才这样做。运输计划必须和工业计划紧密配合，两者又都应和开发自然资源的计划相配合。储蓄和长期投资必须受到鼓励，但奖金，至少是部分奖金不能太长久地扣住不发，这些以及其他微妙的关

系都是经营管理的问题。从全国的计划工作者到领班的各级管理工作越是熟练精明，各部门之间就会越有效地相互配合，各部门的参加者也就越满意。无需指出，在这些部门中的有效管理需要高效率的双向传播。工作任务越复杂，传播情况也必然越复杂。

国家发展计划的管理与某些其他管理工作也是不同的，因为它的中心部分是管理发明创造。开发者经常在设法革新。他是在和那些他头一次需要在一起共事的人打交道；在同那些不熟悉工作的工人打交道；他要一些农民改变他们的基本耕作方法，要另一些农民离开农田；他在和那些只懂得民间知识的人打交道，而他想让他们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他是在同一个习惯于生活在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打交道，虽然它的政策是为了未来。因此，创新发明要求人们起很多"经纪人"的作用。他们要既能按传统文化，也能按现代文化进行工作，要能将现代文化和技术传授给在传统的价值观和信仰中成长的人，他们应当是国家发展的宣传家和鼓动家，诸如此类。[11]不必说，许多发展中国家里能够熟练执行这些任务的人是不多的。

在为国家发展动员人力资源中，技巧的训练和改变劳动者的态度通常是齐头并进的。例子之一是公共卫生问题。一个工厂，如有一半的工人可能在某一天因为霍乱而缺席，或因患有肠道寄生虫病而没有力气，工作不专心，就不会有很高的生产力。在一个平均寿命为35岁的国家里训练一个技术工人，比在一个平均寿命为65岁的国家里要不合算得多。在前一种情况下，训练的费用只能买到15年的服务，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可以买到40年的服务。为改善健康、增强体力和延长人民的寿命，不仅需要提供医药服务，而且需要教给他们新的卫生习惯。在许多情况下，这又反过来需要人们采取新的态度。例如，在传统文化中，对人们有着广泛影响的反对杀生的宗教和哲学观点，有时是禁止杀某种具体的

动物，有时是禁止杀一切动物，有时甚至是禁止杀死危及健康或妨碍农业耕作和改善生活的昆虫和寄生虫。

因此，动员人力资源需要把很大注意力用于全体人民对国家发展所知和所想的事上，特别是注意鼓励新的态度和社会风俗，并提供有利于发展的知识。

以国民储蓄这件事为例，我们已经说过，它是积累资本的关键。但正如M·津金所说，在许多这类国家里，"节约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罪恶，只适用于商人"。[12] 传统的社会模式和结构是不创造资本的。农村居民宁愿保持只能勉强维持的生活水平，也不愿生活在货币经济中。他宁愿养育一大家人来得到"老年保险"。如果有一点钱，他宁愿用来作为女儿的嫁妆或请客，或用于其他比开设银行账户或保险等更能立即得到报偿的用途。

事实上，大多数传统文化总是倾向于敌视变革并缺乏经济上的动力。K·奈尔在对印度农村人口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说：

> 在这样的环境中，从外部引进新技术将只能提供有限的帮助，除非对变革与对更高生活水平的期望在农业社会中扎了根。这些技术将常常不被采纳或是不被充分利用，例如引进日本的水稻栽培方法就是如此。这种技术在大约10年前被引进到水稻种植区域，而在其他地区则很少为人们所接受。[13]

J·康迪利夫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 燃起期望的革命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力量之前，将需要大量地转换成为经济动因。动因意味着价值的转变。除非发展中国家的普通男女愿意为使孩子受到足够的教育而承担牺牲，否则将不会有很多发展。人们必须为渴望得到教

育与富足而甘愿放弃闲暇和破掉铺张的婚礼等旧习。远见和计划必须深入人心。[14]

巴尼们的邻居的行动说明了传统社会对于革新的恐惧和不信任，他是村子里第一个试验一种新的耕作方法的人。这种态度部分是出于宿命论——认为人类不能使自身的命运发生任何变化或成为环境的主人。与此相关连的观念是，人们应当忍耐和顺从，而不是斗争。部分原因也是由于可以允许进行试验的余地很小：在一个用现有手段几乎无力种出足够粮食的家庭中，一项不成功的试验就意味着挨饿。因此，人们总是死守着几百年来的老办法，尽管它们效率很低。这种情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传统社会中很少出现革新家以及为什么新的思想和行为常常不受欢迎。

同这种与生产发展背道而驰的态度相联系的，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习俗与社会模式，其中最常见的是使家庭深陷债务的结婚财礼，丧葬以及为数过多的节假日，它们很难与国家发展经济的目标相协调。另一个例证是种姓制度，它极大地限制了一个人所能从事的职业和他与其他人进行交往与合作的范围。印度已经采取行动在道义上反对这种制度。然而，在许多并不存在复杂的种姓制度的国家中，却普遍存在着对于体力劳动的厌恶。远非信仰“劳工神圣”，这些国家中的人们普遍认为艰苦的工作下贱，无人愿干，避之唯恐不及。特别是受过教育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们觉得，任何形式的体力劳动都是他们所瞧不起的。

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可能，动员人力资源都要去掉上述这些不利于发展生产的态度和行为，代之以促进生产发展的思想和言行。所谓促进生产的态度，指的是那些有利于合作、特别是通过长期的全国性的努力进行合作的态度，使合作与动员易于实行的社会模式，以及有利于革新、生产、保健、储蓄，有利于延期

支付而不是立即给予奖励的态度。

可能是最令人鼓舞的、支持国家发展态度的论述来自D·麦克莱伦德的《成功的社会》一书。⑮ 这本书报告了对于一种态度星宿所作的一系列研究，这种态度被他称之为"需求完成"。"需求完成"率高的人看来是雄心勃勃的、工作勤奋的和上进的。他们珍视革新，愿意冒险和承担责任。与不发达国家那些急功好利的商人不同，他们为了在以后获得更大的报偿，宁愿延迟获得到手的利益。这些价值观念明显地同经济的发展有关。通过对于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研究和当今情况的调查，麦克莱伦德对它们进行了检验。他发现，这种态度存在于许多正在迅速发展的文化之中，并同我们时代的工业发展密切相关。

然而，怎样才能使"需求完成"的价值观念在人民中间生根呢？麦克莱伦德认为，这种价值观念通常是在一个人的幼年时代学到，在较少父道尊严，取得很高成就的家庭中繁衍生长的。他还指出，这些观念是典型的欧洲和北美中产阶级的态度，它们同M·韦伯称之为新教伦理的一套看法十分相像。⑯ 显然，它们是最近才在一些文化中得到发展的。而一旦发展了，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它们可以再次得到发展。

因此，在动员人力资源的全面任务中，信息还有额外的任务。为了对我们提到过的这些关于观念和行为的基本问题做出定夺，必须向人民传授知识。必须有进行领导的适当渠道，有进行公开辩论的机会。必须提供信息、鼓励生产性的态度、社会模式和风俗习惯。这就提出了一个关于道德和责任的问题。

一个道德和责任的问题

让我们回忆一下巴尼们与艾非们，我们可以看到，用许多

方式能够使社会变革更充分地满足他们的愿望，更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天分与潜力，改善他们的健康，扩大他们的知识面。总而言之，使他们成为更讲效率的而且——我们希望——也是更幸福的公民。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的社会制度已经在他们身上注入防御因素，即变化很可能是艰难的，不无痛苦的。

因此，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这类行动的道德原则？运用我们所掌握的关于现代传播的知识来支持社会的和经济的变革，尽管明知在任何国家中都有一些人反对需要进行的某种变革。我们这样做所依据的道德原则是什么？运用现代传播去从事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任务，即鼓励生产性的态度，即使可能有人仍然强烈地坚持反生产性的态度；鼓励不同的耕作方法，即使农民不信任革新；鼓励更良好的健康习惯，不顾宿命论和不愿杀生的人们的反对；鼓励人们努力工作和储蓄，尽管他们看来并不愿意这样做；我们这样做所遵奉的道德原则又是什么？

让我们以最可憎的方式提出问题：我们是在提倡，在发展中国家里用大众传播去操纵人民吗？对于一些国家的读者来说，这可能象是一个"稻草人"，不必花气力去予以摧毁。当我们向其他读者澄清我们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时，希望这些读者能对我们表示容忍。

首先，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决心变革。他们已经认识到，为着自己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命运，他们必须使自己的社会现代化。每个国家的负责任的领导人都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多数国家的领导人已经向国际组织和更有经验的国家寻求援助与指点，变革正在来到这些发展中国家。问题不是是否要变革，而是变革的步伐要有多快，用什么方式和准确地向着什么方向。

如果其他情况都一样，那末要对在下述假定的基础上进行的变革进行争论是很困难的：

——有知识要比愚昧好；

——健康比患有疾病好；

——有饭吃比挨饿好；

——生活舒适比贫困好；

——积极参予国家事务比被孤立于国事之外好。

人们可以继续开出一长串构成了国家发展的社会基础的这类陈述，同时，像我们说过的，你会发现没有多少人，至少是在高度发达国家中，愿意表示反对这样的原则。

在我们看来，很明显，上述决策要由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自已去做。甚至在诸如健康、食品、享受与知识一类的问题上，一个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决定它想要做些什么，多快、走多远，以及它究竟是否想做点什么事。然而，我们认为，没有适当的信息，上述决定就注定不能成为全民族的决策，因为它的基础既不是公众的意愿，也不是充分的论证。

当然，只在某种界限之内进行抉择是可能的。一旦一个国家决心使自己的社会现代化并使它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求得发展，某种抉择就是不可避免的。举例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就像斯特利所说的，如果不同时选择达到更强大生产力的途径，就不能选择“优质的高速公路、民用住宅以及一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险制度”。[17]它不能选择进口代表现代文明的机械，同时又保留着与工业不相一致的老的社会机构。但是在一定限度内，人民仍然可能决定他们的生活方向，必要的社会改革将采取什么形式，改革应当在什么时候进行，走得多快。不过如果他们要做出某种当地的抉择，他们需要知道什么样的抉择是可能的，这些抉择受到哪些限制，以及在实现某个特定的抉择的时候，有着哪些机会。

在"操纵"人民与传播事实、进行讨论、劝导和争论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是在任何自由社会中达到意见一致的过程的组成部分。很明显，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用于操纵，如果传播渠道的拥有者为此目的而选择使用它们的话。但是同样明显的是，信息越是更大量更自由地流动，操纵性的传播也就将越少有可能产生影响。自由信息的基本的社会影响是要解放而不是操纵人类。它的目的在于把人们从愚昧和单方面的操纵下解放出来。这就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把信息称为基本权利之一的缘故，国家发展的进程极好地解释了这一点。为着使得在某一问题上知之较多与知之不多的人之间能够分享知识，需要有信息的适度流动。如果一个国家的普通公民，如艾非们和巴尼们要被引入决策过程，适度流动的信息就是必需的。

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里，一种适度的信息流动，比从政治统治集团的上层向社会底层的艾非们与巴尼们的信息流动更为必要。它必须向艾非们和巴尼们传递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使他们得以在现代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是对的。但是它必须同时向这些人提供使他们能够用以与本村和别村人讨论将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实践的渠道，它必须提供可以把村民们的需要和意愿向上传送给政治集团，使之成为更高层次的决策的组成部分的渠道。这样，我们就远非在主张"操纵"发展中国家的巴尼们和艾非们，而是主张积极地引导他们进入决策，并使他们有机会全面而有效地参与社会现代化过程，建设他们的国家，改善他们人民的命运。

所有的社会变革都伴随着紧张。然而变革一经完成，紧张常常就得到缓解。这是拉奥从对两个印度村庄的研究中观察到的。在这两个村庄中，一个已经开始现代化，另一个刚刚起步。[13] 正在接近改革的村庄中充满了紧张和矛盾，另一个则显得更平静、更忙碌、更满足和更有目的性。而且，迅速的变革通常比缓慢和渐

进的变革更少痛苦。玛格丽特·米德在对曼纽斯村进行了25年的重新研究之后，提出了一个假设，即如果变革是普遍需要的，如果它单刀直入触动整个文化，并且包括这个文化的各个方面，那么"比起在一个长时期中零敲碎打地进行改革，可能较少地发生社会解体与个人的失调"。[19]

在调整社会的紧张程度时，信息的流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传播是一种温度控制器。例如，当发展中的经济还不可能满足人民的要求时，提高人们的期望可以使社会温度上升。它也可以通过提供解释、给予奖励、加速发展，通过允许变革、用米德博士的话来说，"单刀直入触动整个文化"，首先，让人民和领导者都能听到，从而使社会温度下降。

不言而喻，一种有效的传播体系可以被用来"操纵"人民，如果这种体系是在想用它来达到这种目的的人控制之下的话。它也能够——而且应当——被用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目的，即把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引导进发展的决策，给予他们一个有效地参与的基础，以加速已经决定实施的改革并使之顺利进行。关键在于，国家的发展也是人民在改变他们自身。这并非完全是一个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不可变通的过程。如果允许传播流动的话，在确定目标、决定何时与应当怎样进行变革以及希望他们的社会变成什么模样方面，人们就能有很多事情可做。因为，就像凯恩斯于1945年在皇家经济协会著名的祝酒词中所说的，经济学家"不是文明的受托管理人，而是文明的可能性的受托管理人"。

信息的功用

当人类社会还处于躲在山洞里避御寒冷和到处都有危险的原始部落时，甚至这样的社会，除了在求爱，家庭生活，儿童游戏或

偶尔的交谈中交换各种日常信息外，也有着某种基本的传播需要。部落必须布置一个看守人去瞭望地平线，并报告危险和机会，比如说，发现一个敌对部落到来，或看到在可以狩猎的距离内出现一群动物。诸如此类的信息回到部落，就得做出决定怎么办的安排。一个领袖，或是头人会议，将必须做出决定(时常在经过辩论或讨论之后)，解释形势，发布命令并分派任务。当然，对付一种未曾预料到的紧急情况，并不是所有的部落决策都是由头人会议决定的，许多是由一整套信仰、风俗和法律方面形成的规定来决定的，其中有许多比部落中最年长的人还要古老。因此，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是把这些信仰、习俗、法律以及部落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技能，传授给家族的新成员：父母教育子女，祭司和长老教育年轻人。所以，在初期的人类社会中，信息的三重角色可以看得很清楚：看守人的角色(瞭望地平线并发回报告)；决策的角色(决定政策、领导、立法)和教师的角色(使部落新成员"社会化"，我们的意思是让他们带着社会所尊重的技术和信仰步入社会)。像我们已经说过的，强调这类比较正式的职能，表现为一种日常的传播活动，没有这些活动，部落就不能生存——如表达友谊与爱情、挑战、争论与讨论；物物交换和贸易；跳舞、唱歌、讲故事和使社会具有色彩和内聚力的其他非正式的传播。

今天，当社会变得更大和更复杂，达到了我们称之为"文明"的阶段之后，信息的这些作用发生了哪些变化？基本的作用依然保留着。信息的交流变得不那么简单了：某些非正式的和偶然的活动被正式化了；有些曾由个人去完成的事情现在由社会机构来做了；机器被引进传播过程代替人去看，去听，去说，去写，围绕这些机器，一些最大的信息机构成长了起来，这就是大众媒介。然而，信息的作用仍然基本上不变。看守地平线的工作现在大部分由大众媒介来承担，使用它们所有的记者、通讯社、电传设备、印

刷机和广播器材，使社会舆论达到一致。制订政策和指导行动的工作主要交给了政府，但是像政党和大众媒介这样的组织强有力地参予了舆论和公众行动的形成过程。过去通常由少数人用简单对话解决的问题现在可能要经过几个月的讨论，把成百万人卷入其中，也许还要开展全国性的运动；然而其任务依然同部落时代并无二致——决策与领导。使社会的新成员社会化的任务，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学校和诸如教科书、教学广播与电视、教学影片和百科全书这类教育媒介上。对知识和训练的需要不再限于人的童年时代。已经必须建立成人教育与专业指导机构(诸如农业的延伸)。也许还会向更复杂、更尖端的方向发展。但在社会需要信息服务这一点上，却是同样的。

在这些服务下面，社会传播的底层基本上还是同部落时代一样。尽管在这里，同样，传播的某些部分已经扩大、复杂化与正式化了。男男女女仍然在街上问候朋友，但用书信、电报或电话向不能相见的朋友问候。一位国家领导人通过广播向全体人民问候也已成为常事。人们仍然互相打交道、做买卖，但是，围绕着讨价还价的旧体系，已经产生了为购买、出售、借贷、推销和刊登价格报告服务的一个巨大的传播网。同样，通常被用民歌、民谣、传说与部落舞蹈等方式进行的公众娱乐已经交给了媒介或诸如戏剧、杂技和有大批观众的体育运动这类形式化了的手段。

因此，在部落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的那些世纪中，信息的作用并没有发生变化，而且毋宁说，通过扩大和延伸这些作用而发展了手段和结构。写作得到了发展，因而社会的知识储备不必依赖于个人的接触或老人们的回忆。印刷术得到了发展，因而机器能够比人更廉价也更迅速地复制出人所写的东西。围绕着机器，产生出一整套印刷出版机构和公共学校。后来，机器被发展了，使得人们的眼界不再受到时空的限制。首先出现的是照相机、胶

片与放映机，以后有了照相制版，再接着是电影制片厂和剧院。发明了使人们在远距离可以互相听到声音的机器，围绕着它们，发展起了电话、留声机与广播行业。把视的机器与听的机器结合起来，就具备了产生有声电影与电视的条件。换言之，在部落时代与现代文明时代之间，社会已经找到了超越时空地分享与储存信息的方法，以便保存历史，使之不致被遗忘，并把一个有效率的社会从少数人扩大为千百万人。

原始部落存在现代社会的信息交流方式是不可想象的，现代社会存在原始部落的信息交流方式是更不可想象的。社会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着与其相适应的传播方式。原始部落时，父母教育子女于膝下。但是，当课程变得长了，内容复杂了，学生人数也多了时，这种方法就不够了。没有活字印刷，封建社会也能存在，但是当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对政治感兴趣时，他们就需要得到供他们阅读的印刷品和教他们读书的学校了。换句话说，在许许多多的人能够阅读，并有适当的材料可读之前，人们是很少有可能广泛参政的。争论是信息创造了某些社会组织和社会形式还是一些社会组织与形式创造了传播发展的某个阶段是徒劳的。这二者之间无疑地存在着有力的相互作用：传播的新发展影响着社会，而社会在别的方面的新发展也影响着传播。重要的是，在一般情况下，传播发展的某种水平与阶段必须伴随着社会发展的某一水平和阶段。没有传播事业的高度和有力的发展，现代工业社会所必需的人口、合作、工业化、教育与技能的基础就不可能建立。当然，不发达国家的传播系统一定也是不发达的。

信息在发展中国家

当一个新兴国家决定要发展时，与之相伴随的是一种介乎部落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传播体系。很典型的是，它的乡村还在传统

的生活方式下昏睡，而城市却已经开始与大众媒介和喷气式飞机打上交道了。但是，这个新兴国家有着一种部落和现代文明社会都有的需要，即迅速地、大胆地、尽可能没有痛苦地进行变革的迫切需要。它可以利用部落社会绝对想象不到的资源——世界上许多地方已使用的现代传播技术。

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传播的作用没有发生变化，而传播的数量则发生了变化。例如：

看门人作用 当发展开始时，要求看门人去进行广泛的考察。城市中的上层权贵和居住在传统农村的农民，忽然发现他们相互之间非常感兴趣。城市认识到，在国家工业得到大发展之前，农村和农村中的工作必须先实现现代化。农民们则认识到，城市中有着他们所需要的某种东西，同样，过去主要由征税者将之联系起来的农村和国家政府，也从新的角度互相认识了对方。在那些连国家领导人的名字都可能不知道的农村中，人们开始涉足政治，为实现现代化而寻求帮助。征税者已经消失的地方，现在政府派去了传播知识的教师和技术专家。15年前，绝大多数新兴国家很少关心对外关系，如果有，也许只是同殖民主义国家的关系。今天，它们发现有必要投身于世界政治舞台，并向技术更先进的国家寻求知识和帮助。换句话说，眼界开阔了，发展中国家需要从广阔的范围内获取更大量的信息。

政策作用 一个发展中国家发现，它必须使它的基本决策铺得更开。首先，它需要人民的积极参与。此外，它也要求人民在最困难和重大的问题上，做出自己的决策。实际上，这是在要求人民对国家的现代化做出决策，并要求人民相应地改变他们的生活与信仰，接受新的目标、新的态度、新的习惯和新的责任。这既需要信息，也需要引导。而且，信息必须流动，变革必须经过讨论，不仅通过从领袖到农民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渠道，而且还

要通过由下而上与横向的渠道，这样人民才能够讨论问题并实现集体决策。更多的人们需要相互交谈。本地的需要与本地的声音更有必要得到倾听。换句话说，重要决策的基础必须加宽。

教育作用　当发展正在顺利进行时，国家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学习。[20] 几乎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在试图迅速地增加学生人数和教育内容，延伸服务与信息媒介。社会的每一个部门都有需要学习的新技能——农业、机械、电器、保健、阅读与写作能力。国家运用信息去刺激对更多信息的需求：鼓励人们从农村工作者或是技术专家那里得到建议，鼓励他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去读书。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读写训练是一个主战场。有时很难理解人的读写能力怎么会对发展的进度和趋向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学会阅读的人获得了远比使用印刷媒介要大得多的能力。对于他来说，就像D·勒纳在一次雄辩的发言中所说的，读写能力"成了使生活各个方面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潜藏着全部现代化序列的基本的个人技能[21]。"他获得了通向更广阔的世界的桥梁。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中东发展调查中，被调查的文盲在谈到他们的识字同胞时说，"他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22] 所以，当一个国家开始发展时，全国传播的教育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是为全体人民打开通往更宽广的世界的大门，使他们得以了解现代技术知识与公共事务。

描绘一个发展中国家里信息流量的巨大增长，最通常的方式可能是说，它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气候。它使得专家的知识有用武之地，并为讨论、领导和决策提供了讲坛。它有助于提高抱负的普遍水平。当由于某种刺激，使得农民希望成为一个自由拥有地产的农户，使他的儿子希望读书以便在城里找到一份工作，使他的妻子不再只是生儿育女，他的女儿希望梳妆打扮时，现代化的进程就开始了。[23] 除非人民要求变革，否则变革是不会顺利

地或卓有成效地进行的。通常是信息流的增长播下了变革的种子，也是信息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从而孕育了"全国性"的气候。通过使国家的一部分了解这个国家的其他部分，了解它们的人民、艺术、风俗和政治；通过允许国家领导人同人民、人民与领导者和人们相互间对话；通过使关于国家政策的全国性对话成为可能；通过使公众经常了解国家的目标和所取得的成就，被广泛使用着的现代传播就能把孤立的社区、全然不同的亚文化群、自我中心的个人和集团与分散的发展，融铸成为一种真正的全国性的发展。

几个实例的研究

看看关于传播在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所起作用的几个实例研究，可能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可惜这方面的大型研究只有几个。这部分是由于在有关发展问题的研究中盛行经济决定论，部分是由于认为信息只不过是随手拈来的。信息对于一切社会过程都是基本的，它是社会的真正的相互作用。因此，信息被典型地当作其他某种事情的一部分来对待——比方说，当作商业的一部分，或教育的一部分，或政治的一部分。只是在近几年，人们才觉得信息在国家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值得研究的。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期望出现一些我们如此迫切需要的严谨的实例研究。㉔

一个中东的实例

在现存的实例研究中，最著名的是D·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㉕

1950年和1951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研究所在中东的6个国家做了一次总数为1600人的长期调查。这6个国家是：伊朗、

埃及、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采访目的是尽可能多地了解每个人接触传播媒介的程度以及他的许多态度，特别是那些与他的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发展有关的态度。勒纳博士是这个所的成员之一，他负责主持这项在中东的现状调查。1954年，在他离开哥伦比亚大学之后，他应邀对从采访中获得的资料进行重新分析，并准备就整个研究写一部书。他重新访问了中东，同许多人面谈，有的就是他几年前访问过的，并写出了《传统社会的消逝》这部书。

他观察中东的事件，并试图将它们与他的1600次访问联系起来。他说，这时候他回想起，"在西欧，经过整个世纪的艰巨斗争，中世纪的生活方式才被现代社会所取代"。[26] 因此，他把研究集中于他称为"现代化"的进程，虽然他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相对的词语，今天是现代的，明天就不再是现代的了。

一些年前，中东社会的上层开始出现欧化现象，主要影响的，是有闲阶级的时尚。今天，现代化涉及远为广大的人口，触及了公众与个人的思想。"这种变革的中心"，勒纳说，"是传播中的思想和态度的模式的改变——在广大公众中传播新方式的生动形象，是现代化所需要的。欧化使用阶级媒介，现代化使用大众媒介。他说，大众媒介是使得这两种社会运动发生不同影响的主要缘由。[27]

勒纳在分析他所提到的国家的现代化历史时，认为这一进程分为3个阶段：

"先是出现城市化，因为城市本身是发展了技艺与资源的复合体，这是现代工业经济的特征。在这个城市的母体之内，发展了区分以下两个阶段的两个标志——读写能力与媒介的成长。它们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能读能写的人发展了媒介，后者反过来又推广读和写。然而，在历史上，在第二个阶段，读写

能力起着关键的作用。阅读的能力开始时只有相对少数的人具有，但这装备了他们，使他们能用以完成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各项任务。只有到了第三阶段，当工业发展的精密技术相当先进了，一个社会才开始生产报纸、广播网和电影。这反过来又加速了读写能力的扩散。由于这种相互作用，参与的各种机构发展起来了……这是我们在所有先进的现代社会中都可以看到的。"[28]

根据人口统计学的数据，他认为，10%可能是都市化的"最小临界量"，只有在都市化到达了这一点之后，能读会写的人的比率才开始显著提高。此后，能读会写者与都市化一起增长，直到到达约25%。此后，能读写者的人数独立于都市的增长而继续上升，把这些百分比用于中东以外的地区，可能适用，也可能不适用，但是它们指出了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序。

在这种历史模式背后，勒纳看到了一种心理模式。他认为，一个发展中社会变化着的人通常是一个"能动的人"。这个说法的意思是一个人具有适应他周围环境中新事物的很强的能力，能够接受向他提出的超出他的习惯经验的新要求。"能动的人"是具有高度感应能力的，他能"从别人的处境中"看到自己。这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他成为用"现金买东西的顾客，听广播的人，投票的人"，他们接受并倡导变革。而且，勒纳说，这是"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才占优势的人的风格，它的特点是工业化的、都市的、能读会写的和热衷于参与的"。[29]

因此，在勒纳看来，在发展的社会动力中，第一要素是灌输一种现代的或是"能动"的人格。第二要素被他称之为"能动性的倍增器，即大众传播媒介"。确实，美国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大批移民进入一个新的充满了挑战的环境。但是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早期通过运输获得的体力经验的增长，已经由于通过大众传播获得的中间经验的扩散而成倍地增殖了"。[30] 他说，媒介已经"用

拼缀现代化的那些感应术训练了西方人。他们也描绘出了它可能要扮演的角色，并阐明了它可能需要的意见。”在我们的时代，它们正“在世界规模上执行着同样的使命。”㉛

勒纳认为，下面这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能动的、接受变革的人组成的一个核心；㉜扩散关于社会能动性和变革的观点和态度的、一个成长中的大众媒介体系；然后是使现代的社会成为现实的都市化，提高文化水平，工业化和媒介参与的相互作用。因此，他的结论是，大众传播在发展中充当了“伟大的倍增器”的作用，是能够把所需要的知识和态度传播得更快更广的一种工具。㉝

一个亚洲的实例

勒纳和实际上曾经调查过这件事的每一个人都发现，在经济增长措施与传播增长措施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这就是，当人均国民收入、都市化和工业化增长时，能读会写的人与伴随着的报纸发行也增加了。广播设备和收音机的数量以及媒介参与的所有其他措施也都增加了。

年轻的印度学者Y·V·L·拉奥㉞决定对于上述相互关联进行一次更艰苦的观察。他问道，什么是主要的原动力？什么推动了什么？是经济发展使得传播的发展成为可能，还是改进了的传播设备(以及由此而来的信息流量的增加)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成为可能？

为着就这一问题收集证据，他研究了两个印度村庄。当他在1962年从事这次实地调查时，村庄A已经走出传统的模式，正在发展。它建立了多种多样的小工厂，为一些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收入。没有它们，这些人就除了把自已束缚在土地上而外别无选择。另一方面，村庄B仍然处在传统的文化阶段，严重地依赖易货贸

易的体系，遵从由种姓制度强加的职业限制，并且在地主的庄园里劳作。正如他所指出的，村庄B并非完全没有发展的迹象，然而在这方面，两个村庄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但是在村庄大小、地理位置、社会构成等方面，它们之间又很少差别。因此，拉奥感到，有可能把传统的村庄和正在走向现代化的村庄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拉奥尽可能按事实真相来重新描绘那里发生的事情。他说，差别的关键在于一条接通村庄 A 和附近一座小城市的道路。[55] 通过这条路，来了陌生人、出版物和电影，村民们外出旅行，第一次见到城市生活。当在村里开办一个小工厂时，人们对它已有所准备。

当信息从外界来到一个孤立的社会，它激发了变革，拉奥说。这种信息和由它获得的经济利益，首先为有钱有势的人所利用。然而，渐渐地，"公众注意到了这种变化，提出了问题。在信息渠道可以通达的地方，这些问题得到了解答，其他人开始利用可得到的机会……哪里的信息渠道多样、且基础宽广（报纸、收音机等），由经济、社会与政治思想所引起的变革就顺利地潜入社会。哪里的信息渠道不通畅并为少数人所控制，变革就难于进行并常常导致派系斗争的加剧"。[56]

可得到的信息量及其传播广度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拉奥说，如果它是可以自由得到的，那么为获得新职业和新机会所进行的竞争，就会在实际的了解而不是怀疑和嫉妒的气氛中进行。"如果所有有关的信息都能随手得到，那末由于新知识与新机会的开拓而引起的压力和紧张，就会成为行动的刺激，而不是无聊的闲谈。"[57] 平行信息源的存在也是重要的，因为这些渠道起着相互校核的作用。缺少这种起互相校核作用的信息源与机会，使得农民不信任他的领导者，以至从事破坏性的谈论或行动。拉奥发现，

在传统的村庄中，有着比在发展中的村庄里更多这样的谈话和紧张情势，而信息则更少。

但是，如果可以得到足够的信息，那么，它就会起到不断促进发展活动的作用。它帮助农民们改进耕作方法，提高产量。它也帮助农业上的过剩人力转移到其他更具有生产性的工作上去。更多的生产力导致增加收入、扩大消费习惯、增加村庄里的经济活动(诸如商店和餐馆)以及对消费品的新的口味、寻求新的机会等等与发展有关的事情。

同样，这一进程刺激教育。如拉奥所说，"受过教育的人有能力阅读，找工作，谈论很多事情。阅读是权威的一种标志"。[⑳] 受过教育的人需要一个图书馆。这是发展不断加速的另一个例证：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使教育更具有吸引力；教育则为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

勒纳把传播看作是关于国家发展的思想与信息的伟大倍增器，是转变的伟大的校平器。他指出，当足够的信息能够得到时，劳力的分配就容易顺利地进行。当新的工业角色被创造了出来，但还没有经典的或传统的规范时，媒介就用新的规范和新的思想填补了这一空缺。渐渐地，信息的流动导致了视野的扩大，同时如果信息是足够的，这种情况就将易于出现，而不经过传统的孤立主义和新的国家与国际观点之间的激烈冲突。

像勒纳一样，拉奥认为，感应与能动的人格的发展是导致变革的关键心理变量，但是他指出，信息对这些态度所起的作用，同这些态度引起的刺激一样大。他还指出，抽象思维的能力，对未来的普遍信任，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标志，它有助于信息流动的增加和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并反过来被它们所促进。

那么，什么是主要的原动力？实际上并不存在。每一个因素都作用于其它因素。他说，"当经济发展使人民有了更强的购买力，

从而订阅报刊、杂志、拥有收音机以及旅行，并由此导致了信息流动量的增加时，那是确实的；信息的增加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那也是确实的。企图把传播与经济发展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看作是一种偶然的关系，把小鸡同鸡蛋分开，那是无益的。相互作用是经常存在而且逐渐积累的。"[39]

一个非洲的实例

至于非洲，没有我们刚才报告过的那样两种类型的研究。在这两个例子中，对传播与经济因素的关系做了直接的研究。不过，有一项关于大众传播在非洲诞生的条件，和在发展的那个阶段上，与对传播的理解及应用有关的变数的引人注目的研究。这项研究是耶鲁大学心理学家伦纳德·杜布所作的。[40]

当勒纳研究中东时，从口头传播到大众媒介传播的转变已在进行。而当杜布研究非洲时，这种转变刚刚开始。

杜布说，"非洲人生活在一个很不相同的社会中，已经演化出了他们自己的传播方式，这种方式在某一个时期对于他们是适用的（除了可能完全缺少由书写所提供的持久的、灵活的记录之外）"，"随着他们接受了越来越多的西方的实践和价值观念，他们逐渐从内心里依赖于他们所吸收的文化的延展，特别是传播这一文化的大众媒介。当代非洲容纳了一种传统的与新的传播体系的混合物，因为那些体制如此敏感地反映并影响着进行中的变革。"[41]

杜布的观察趋向于证实勒纳和拉奥的那些观点——在文化变革时期信息的极大重要性，传播的发展既影响着又受影响于其他社会的和经济的发展这样一个相互作用的模式。

杜布的大量详尽而敏感的研究，涉及到需要了解新老传播体系间的对抗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一方面，是新的媒介无可置疑的

潜力和它们所受到的压倒一切的欢迎。"作家像任何有过这种经验的人一样，"杜布说，"能够证实，当一辆流动电影车来到时，村庄里升起一片欢乐的叫喊"。[42] 另一方面，在使用媒介方面，又存在着一种使之"地方化"的基本需要—— 即注意本地的文化和记号体系。杜布写道：

> 据报道，电影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因为它们不适合于当地的观众。一部在尼日利亚拍摄的指导母亲如何给婴儿洗澡的教育片，冒犯了乌干达的妇女。她们说，一个孩子不能光着身子让人瞧，而且他的头必须先洗，而不是在最后。甚至看来被全世界接受的卡通片也会引起麻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刚果士兵第一次看到唐老鸭时，向银幕上扔石头，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正在被人取笑。"动物不会讲话，"他们喊道，"谁见过一只穿军服的鸭子？"[43]

然而，他指出，有可能使新的媒介采用熟悉的传播方式。比如，当无线电广播被引进到当时的黄金海岸时，引进人"有意识地设法使之适应于非洲的结构。他们相信，它最初的威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使用的转化方式，因为人们据认为只相信'最地道的方言……一种高度形象化的、暗喻形式的语言，其中包括了神的行为、传统、民间故事、寓言和一代代口头传下来的粗俗的幽默。'也就是说，要使用一种同语言学家在头人和他的人民之间传送信息的方式类似的形式……以一面'信号鼓'宣布播音的开始，在村庄中人们以这种方式召集村民；然后象语言学家召开一次会议一样，节目以向权贵人物(诸如大酋长和村里的头人)致意及对作物的播种和保护给予良好的祝愿开始"。[44]

只要按照对于文化环境的正确理解来运用媒介，就能看到它们的效力。然而，杜布告诫说，不要有任何不适当的自信，以为

媒介将立即带来它们所要进行的文化变革。他举了一个例子：居住在尼日利亚北部的穆斯林经过传播，相信"应当饮用烧开和经过过滤的水。然而在他们家中，可能继续饮用未经烧开和过滤的水。因为厨房不是他们的领域，而他们的妻子，则是那些生活于深闺之中、成人教育官员不容易见到的人"。[45]他引用一些例子来说明，有用的信息能够为人们所吸收，却并不改变价值观念和行为。他还引用其他的例子，来说明人们没有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念，但仍然能够决定接受注射疫苗。[46]他讲到在一个大众传播刚刚开始的国家里，农村地区微小的信息流动。然而，甚至这样的渠道也可能是意义重大的。他用尼日利亚村庄中的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在那里，一群成年男人被召集拢来商量公共事务。"只有一个老人，"他说，"可以被认为有关于世界事务的知识，包括原子战争方面的一些最近进展。对于所有其他人来说，好像大众媒介在传播这类信息方面是失败的。但对于这位老人来说，它们是成功的。毫无疑问，这是由于他是这个村庄中唯一有收音机的人。在某种情况下，比如说在危机中，这种有限的成功可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人可以传递信息，而且，如果他身居高位……他就能够成为一位有影响的接受者和传播者。"[47]

引进大众媒介，不仅有内容方面的问题，销售方面也存在着同样严重的问题。杜布重复非洲一位政府出版人的话说，道路是否被洪水隔断，以致卡车无法运递报纸，这对于报纸社论效果的影响，比编辑写作方式的影响还要大。他也指出，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大众媒介的每一个小零件都必须从国外进口。

在描写了大众传播在诞生时的某些阵痛之后，他转而谈论这个新生婴儿的潜力和活力。"谈到传播，就不能不涉及几乎所有的行为，"他说，"只有提到非洲社会中绝大多数意义重大的方面，传播在非洲才会受到赞扬，"当非洲开始走出传统而向现代社会迈进

的时候，"传播是位于生存的正中心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40]

一个拉丁美洲的例子

关于拉丁美洲的研究，没有把经济与传播的发展作为主要变量的重要研究。然而，在社会变革方面，对于一项引人注目的实验进行了研究。在这一实验中，传播显然是重要的。主要的实验者阿伦·R·霍姆伯格博士在有关发展过程中传播的作用和重要性方面做出了他的结论。[41]

实验在秘鲁安第斯高山上一个约有3.5万英亩的种植园中进行。如霍姆伯格所说，[42]依附于土地但没有土地所有权的，是1850个讲奇楚亚语的印第安人。他们生活在可以被称之为封建主义的制度之下。种植园属于国家，出租给出价最高的投标者，租期10年。因而，租赁人，或是老板，可以表现得象封建贵族一样，几乎集经济、政治司法权力于一身。他有权使每个家庭中的一个成年人每周从事3天的种植园劳动。作为报酬，农民家庭有权在山边占有一块极小的用以维持生计的耕地。他还有权占有农民和他们的家庭相当数量的无偿服务，诸如让他们担当马夫、厨师、牧人、家佣以及看门人等。他们生活水平是最低限度的，健康和营养状况很差，几乎全然缺乏教育，社会互助也几乎等于零。

这就是康奈尔大学在1949年租得这个种植园做实验点时那里的情况。问题是要看看在没有大笔资金的情况下，能否帮助印第安人从经济上和社会上得到发展。而且，这个问题还必须在没有大批人员的情况下加以解决。除开在那个地区行使正常职权的秘鲁政府机构以外，只有两个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生和两个秘鲁人为了进行实验被临时派到这个种植园去。

改革的计划集中于3个主要领域：经济和技术、营养和保健，以及教育。在这些领域发展的进程中，也有必要使社会的结构发

生变化。种植园生活中一些最令人厌恶的事情，如要农民提供无偿侍奉当厨师和仆人等，这是可以立即加以消除的。引进了一个诊所和现代的保健工作。学校办得有吸引力，因此绝大多数儿童而不仅仅是少数人都来上学。农田生产几乎翻番，这样，就有了更多的钱可用于其他方面的改革。控制权渐渐地转移到由种植园居民选出的人们手中。谈论这些变化的细节是很诱人的，但是，让我们仅仅说，成功相当引人注目。在此之前的400年中，这个种植园在任何方面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化。而在1949年之后的8年中取得了这样多的进展，因此在1957年，康奈尔大学能够把租赁权转交给种植园里选举出来的官员。在经历了4个世纪的封建劳役偿债制后，居民们终于成了他们自己土地的主人，他们自己政府的主人和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

然而，以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一研究的最有意义的结论，必须考虑种植园今后向着现代方向发展时还需要什么。显然，如果这个种植园要继续取得进步，某些严重的传播问题就必须得到解决。霍姆伯格认为，最迫切的需要之一是社区团结的发展。要满足这种需要，兴趣、活动以及传播都必须超越家族和邻居集团的界限而得到发展。此外，为了了解它自己的问题，这个小山村还必须更多地了解本地区的城镇与村庄，以便仿效他们已经做到了的好事情。从长远来说，最重要的事是与外部世界建立更好的传播关系。霍姆伯格说，山村的物质供给正在得到迅速的改善，“但是信息仍然受到严重的限制。区里和省里的命令或信息送到了种植园，却经常没有什么效果。官员们也难得到村子里来进行解释。同相邻城镇的贸易或节日里的交往并没有使人们打开多少眼界，因为印第安人被这些城镇中的混血儿视为社会下层。”所以，真正的问题是要把山村引进国家的生活、态度和知识储备中去。

扩展这些信息渠道的最好的办法之一，是更多地运用大众媒

介。但是，如霍姆伯格所说，

"传播媒介的改进，所包含的并非仅仅是教给人们读书和写字，或是通过书写的文字来传递信息。山区的很多与外界隔绝的村民们还没有学会用抓住其全部含义的方法去看照片。举例来说，在维科斯放映的关于公共卫生的电影，表明它的画面没有能把它想传达的信息传递出去，因为每一幕都被看作是互不相关的偶然事件。观众全然没有能力看到电影和他们自己的生活之间的任何联系，并错误地理解了那些不完全写实的特写镜头。当虱子被拍得比生活中常见到的要大时，人们的结论是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一类动物。除开宗教节日外，村里很少有人见过任何一种戏剧，广播的作用和目的只有少数人知道。尽管广播、报纸和电影在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中会起到主导作用——建立地区报纸和广播电台则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在初期阶段，只有耐心的、面对面的解释和示范，才能提供传播的有效渠道。"[51]

因此，像杜布一样，霍姆伯格警告他的读者，引入大众媒介虽然重要，但并不是轻而易举或是能自动办成的。他的结论是，那是值得去做的。他说，在受到诱导的社会变革的任何计划中，都可以触及到社区发展的许多其他方面，请特别注意3个关键的领域——即经济生活、领导和传播——因为这三者能够导致其他变革。农村与外部世界间增加经济接触，将增长对外面市场的知识，得到更有效的技术，利用得到的资源，可得到把专门技能用于工作的机会。拓宽与外界相联系的传播渠道，将使得乡村的农民们更好地了解他们所能得到的政府服务，这些服务将鼓励他们在同本地、本省和全国的政府打交道时，扮演一个更为活跃的角色。山区生活的其他领域也可以期望得到同样的收获。

杜布关于传播是发展中的非洲的"生存的正中心"这个说法，为本书的这一部分提供了一个结论。我们的观点是，对于任何社

会来说，不论是否是发展中的，传播总是处于生存的正中心的位置。当有危险或机会需要加以报道，决定需要做出，新知识需要加以传播，或是变革已经迫在眉睫——信息就往那里流动。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些需要是特别迫切和普遍的。在那里，分配给传播媒介的任务比发展之前要广泛得多。如果信息流动和传播渠道不适应于这些任务，它们就必须建设到所需要的水平。因此，让我们现在来考察发展中国家里信息的适度性及其渠道。

注 释

1. 关于墨西哥特波桑的几项研究，是高速公路对村庄文化作用的经典记录；例见O·刘易斯：《墨西哥一座村庄的生活：特波桑再研究》，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51年。Y·V·L·拉奥在《信息在经济和社会变化中的作用》一文中，对一条新公路进入一座印度村庄产生的效果进行了考察，见明尼苏达大学博士论文，1963年。
2. 例如，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里，主要换汇出口是水果、咖啡和糖。
3. 关于把农业人口释放到工业中进行资本积累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成为资本)，是R·纳克斯提出来的，见其著作《欠发达国家资本形成的问题》，牛津，1953年。
4. 关于这一点，参阅M·F·米利肯和D·L·M·布莱克默在《正在形成的国家(第47页及以后，波士顿，1961年)一书中，对发展过程所做的十分清楚的说明。
5. 这些数据见之于最有用的一期《科学美国人》(209，1963年9月第3期)有关经济发展的文章：W·F·斯托尔波："尼日利亚的发展"，以及P·潘特关于印度的发展、C·弗塔多关于巴西的发展的同一组文章。过去十五年，巴西农业生产以近5%的平均速率增长，但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人口的增加抵消了。现在国家储存了国民收入的17%左右，并且计划从公共和私人共同资金中拿出18%左右进行投资。印度计划到1975年把储蓄率提高到20%，而它目前的五年计划要求投资11%。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到1966年，农业生产提高27%，工业生产提高70% 国民收入提高30%。

6．前引米利肯和布莱克默《正在形成的国家》第23页。

7．F·哈比森：《发展教育学》，《科学美国人》，209，1963年第3期第104页。

8．同上。

9．同上，第144—147页。

10．Ph·H 库姆斯：《教育发展和国家增长的经济学》，《国际教育电视讨论会报告》第14—19页，珀杜大学，1961年。关于教育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参阅S·斯特鲁米林：《教育经济学在苏联》，《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4，第4期（1962年）第633—646页。对于研究经济发展中的人文资源的学生来讲，这份杂志的每一期都很有用。它包括M·德波弗埃对《人类资本概念》的讨论，W·A·刘易斯论"教育和经济发展"，以及1962年华沙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会议上的报告，同时参阅M·阿迪斯塞恩：《教育和发展》（前引世界紧张委员会编《动乱的国家》和《人类资源和发展的十年》巴黎，1962年）；T·W·舒尔茨：《教育和经济增长》（N·D·亨利编《社会力量对美国教育的影响》，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1年）；M·F·米利肯：《教育为了发明》（前引《动乱的国家》第131—147页）。

11．有关发明的一些问题，参阅关于文化变迁和经济发展的论文：B·F·霍泽利兹编《欠发达地区的进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2年；E·H·斯派塞编《技术变化中的人类问题》，纽约，1952年；G·M·福斯特著《传统文化和技术变化的影响》，纽约，1962年。L·派伊在《行政官员、鼓动家和经济人》一文中，出色地论述了中间人的作用，《舆论季刊》，22（1958年），第342—348页。

12．M·津金：《发展中国家应当怎么办》，《印度季刊》，8（1952年），第132—141页。

13．K·奈尔：《凋谢的群花》，纽约，1962年。

14．J·康德利夫，见《斯坦福研究所杂志》1963年第1期第16页。

15．D·C·麦克莱兰：《正取得成功的社会》，纽约，1961年。同时参阅E·E·哈根在《社会变化理论》中对成功价值的思想的应用，伊利诺斯州霍姆伍德，1962年。

16．前引W·韦伯《新教伦理学和资本主义精神》；J·A·舒姆皮特：《经济发展

的理论》,纽约，1941年。

17．E·斯特利：《欠发达国家的未来：经济发展的政治影响》第390—391页，纽约，1954年。

18．前引拉奥《信息在经济和社会变化中的作用》。

19．M·米德：《应用人类学》，1955年，华盛顿人类学学会编《人类学的一些应用：理论和实用》第94—108页，华盛顿，1956年。

20．来自中国大陆的报告之一是"人人学习"研究。

21．D·勒纳：《论现代化传播理论》，L·派伊编《传播和政治发展》第341页，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年。

22．同上。

23．同上，第348页。

24．关于研究人员中这种新兴趣的一个例子，见前引派伊编《传播和政治发展》。

25．D·勒纳：《传统社会的消逝》，伊利诺斯州格伦科，1958年。勒纳是马萨诸赛工程学院社会学教授。

26．同上，第42页。

27．同上，第45页。

28．同上，第60页。

29．同上，第50页。

30．同上，第52页。

31．同上，第54页。

32．勒纳认为，传统人可能说"从来没有这样过"而倾向于反对革新，灵活的现代人则可能问"它行吗？"并且要试一试。同上，第49页。

33．有关论证数据，参阅G·K·齐拉巴雅什和M·F·埃尔卡迪卜对埃及进行的研究，《舆论季刊》，22（1958年），第357—363页；以及I·奥兹迪尔对土耳其进行的研究："关于土耳其重大问题及其解决的传播学方法因果特征分析"，《论文摘要》，20（1960年），第8期。

34．拉奥现任印度新闻学院副院长。他进行实地研究时，曾是斯坦福大学传播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的研究将由明尼苏达大学发表。

35. 比较O·刘易斯报道的墨西哥村庄中新公路的效果。

36. 前引拉奥论文的"概要"，第2页。

37. 同上，第2—3页。

38. 同上，第5页。

39. 同上，第2页。请将瓦尔纳哥伦比亚论文中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同拉奥的这些结论进行比较(《论文摘要》，19(1959年)，第9期第2404—2405页)。关于亚洲内部正在发展的传播学的另一个有趣的说明，是L·派伊对缅甸新旧传播体系所做的比较(《政治、个性和民族建筑》，特别是第20页及以后，耶鲁大学出版社，1962年)。

40. L·W·杜布：《传播学在非洲：寻找疆界》，耶鲁大学出版社，1961年。

41. 同上，第372页。

42. 同上，第289页。

43. 同上，第158页。

44. 同上，第286页。

45. 同上，第327页。

46. 同上，第316—317页。

47. 同上，第330—331页。

48. 同上，第372页。

49. A·R·霍姆伯格：《秘鲁变化中的社区态度和价值观：重大事例研究》，对外关系委员会编《今日拉丁美洲的社会变迁》第63—107页，纽约，1960年。

50. 同上，第79页。

51. 同上，第105页。

第二章　信息在世界上的流动

在当今的世界上，信息的流动几乎同我们称之为风的空气的流动一样可以预言。一个或一系列事件时常打乱信息的流动，就像一场暴风雨打乱气象图那样。但是在这些扰乱下面，存在着像信风一样有规律的、可以重复的模式。我们将研究其中的某些形式，并将不幸地发现，它们并不特别有利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信息的迫切需要。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在发展中国家里，人民怎样得到信息，以及从发展中国家最需要这种信息的角度来看，有用信息属于什么层次？

信息在国家间的流动

国家间信息与信息资料的流动，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受某种基本现实所制约的。举个例子来说，信息交流的通道主要为少数国家所拥有。五家国际通讯社，或国营或私营，为四个国家所有。长途电传设备的所有权虽不像通讯社那样受到限制，但仍然掌握在相对来说是少数的国家手中。此外，世界上不到1/3的国家是现代社会所依赖的技术与技术知识的生产者和管理者。技术、财富与权力在相对少数的国家集中，使得它们的任何政策和行为都成为重要的，因而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具有新闻价值的，而保证它们将生产最大份额的有用的技术信息。最后，财富在某些国家的集中，使得它们的人民较为容易地去旅行，去支持进行传播的企业

和事业，去生产有效信息流通所需要的装备。所有这些情况都在国家间信息流动的模式中得到反映。

新闻的流动

世界范围的新闻流动的特征是什么？当然，在各个国家，报纸和新闻广播都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本国新闻上。国内新闻的比例通常要占60—90%。只有一小部分，不过是有意义的一小部分新闻来自国外。

最近作了一次关于世界新闻流通的极广泛的研究，涉及5大洲13个国家，包括高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这些国家中，每国选出3张报纸——1张"权威"报纸(如伦敦的《泰晤士报》)，1张发行量大的"大众"报纸(如伦敦的《每日快报》)，以及1张"地方"报(如爱丁堡的《苏格兰人报》)——或是在一个特定国家的报业体系中找出几张最接近于这种组合的报纸。① 每一张报纸被研究的时期都是1961年春季的同一个月份。把用来刊登各国消息的版面大小记录下来，把具有一般重要性的新闻的处理情况也记录下来。由此得到的数据，就有可能得到新闻在这些国家间和洲际流通状况的印象。其中的一些见图1。

某些方面的结果令人吃惊。在所考察的这个月中，有的国家从未在其他12个国家的新闻栏目中出现过。有的国家这个月中在其他12国报纸上得到的位置少于1栏。对于外国新闻的注意始终集中于4个国家——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阿根廷的报纸上，对上述4国中至少3国的报道超过了近在咫尺的巴西；而在巴西的报纸上，对上述4国的报道超过了近邻阿根廷；在印度报纸上，对上述4国的报道超过了对邻居巴基斯坦；而在巴基斯坦报纸上，对上述4国的报道超过了对相毗邻的印度，等等。很清楚，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国际新闻主要涉及在世界政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几个高

登载消息的报纸所属明 \ 消息来源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巴西	埃及	法国	印度	意大利	日本	巴基斯坦	波兰	英国	美国	苏联
阿根廷			6		15	3	6	2			11	43	12
澳大利亚					13	2		2			32	41	12
巴西	6			2	14	2	4	2			9	43	[illegible]
埃及			2		30	2	2	2	2		12	34	15
法国	2		3	2			12	2		2	21	49	20
印度		2		3	10		2	4	11		19	35	15
意大利					29						24	29	13
日本					16	4					12	46	23
巴基斯坦					16	13		2			17	33	13
波兰					26		3				8	26	30
英国	2	2		2	22	3	2	2	2			43	33
美国	3	3	3	2	20	8	3	3	2	3	22		25
苏联			3	3	22	3	6	6	3	8	17	33	

图1　1961年某月期间，在13个国家具有代表性的报纸上，其他12个国家的新闻所占的比例数字。不到1.5%的用空白表示。

度发达国家。

同样清楚的是，新闻是从高度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流动的。它从欧洲和北美流向其他大陆。它从美国和苏联流向所有其他国家。②

4个决定新闻流向的国家同时也就是5个世界性通讯社的家乡，这可能并非巧合。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是美国通讯社；路透社是英国的；法新社是法国的；而塔斯社是苏联的。如果我们以1961年春天它们的亚洲专线连续两天发稿取样，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些通讯社强调来自它们本国的新闻，它们大多数是这样做的。③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集中于美国，就像塔斯社集中于苏联一样。路透社强烈地代表着英国和美国。而法新社的亚洲专线突出美国、英国、苏联的程度甚于突出本国。然而，如前述报纸内容所表明的，这5家通讯社的整体影响是大致相同的。图2可与图1进行比较。

一些事件不时地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通常的大国消息来源吸引开，例如老挝内战爆发、匈牙利事件、进攻苏伊士、巴厘岛火山爆发。但是如果任何这样的事件旷日持久，或呈现出威胁性，这些大国中的一个或是几个不久就会卷入。于是，一天又一天地，高度发达的国家，特别是其中的少数国家又主宰了新闻。

仅仅指出成为新闻报道的主要对象的国家（除了像老挝和苏伊士这样的重要新闻事件而外）同时也就是拥有世界性新闻机构的国家，还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解释。这些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潜在影响，它们拥有的核武器，它们的经济实力以及它们通过贸易和金融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所发生的联系，它们在科学和工业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所有这些保证了在一个大国中发生的几乎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都有可能使全世界较小的国家感到有兴趣或是关心。从一种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说，一个部落看守人通常可以从离他居住地最近的山岗上的有利地点观望到许多危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巴西	埃及	法国	印度	意大利	日本	巴基斯坦	波兰	英国	美国	苏联
美联社	2				5			5			12	64	6
合众国际社					3	2		10			12	64	7
路透社		4		2	14	2		2			30	36	8
法新社		8		2	8	5		3			24	37	10
塔斯社						7		3			9	13	65

图2　在1961年的两天中，世界5大通讯社的亚洲专线在13个国家报纸上所占的比例。空白意味着不到1.5%。

险和机会，这些危险和机会今天也可以在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发现。因此，欠发达国家的报纸刊登大量的来自这些国家的新闻，是不足为奇的事情。而且，一个国家越是高度发达，它的新闻采集工具的组织程度就越高，因此在这样的国家中也就更容易发现和报道重要的新闻。通过国内报道的延伸，这些通讯社正在做着对它们来说是训练有素的事情，而且也是它们的外国顾客所期望于它们的事情。所以，除了民族主义的特性之外，有很多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新闻重点没有在全世界得到平均分配。

事实上，与从少数国家新闻流出之多相比，从许多国家新闻流出之少更加使人不安。在分析了一家通讯社1962年2月间所收到的来自拉美的新闻之后，《迈阿密新闻》的拉丁美洲主编H·亨德里克斯得出结论说，如果这份电讯稿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唯一消息来源的话，那么，拉丁美洲会被认为主要就是一个古巴。在这一个月中，有些国家不管什么样的新闻都没有。从玻利维亚来的只有一条，宣告菲利浦亲王到达的新闻；来自秘鲁的新闻只有关于飞机坠毁和汽车遇难的短讯；关于智利，只有一条福音传教士B·格雷厄姆正在圣地亚哥开会的简讯。《每日新闻》的新闻编辑阿尔·马伦斯研究拉美的另一个新闻机构后发现，在整整一个月中，只有一条来自巴西的新闻。这些新闻全是事实，然而据批评者说，这并不说明什么问题。马伦斯考察了对古巴的详尽而冗长的报道，并且以值得称赞的克制态度问道，这种报道能使一个北美人对于在这个国家中所发生事件的理解增加多少？④

《一周新闻》⑤的耶克斯·凯泽就17个国家的17家著名报纸对于被认为是具有国际重要性的18个新闻事件的处理提出报告。

凯泽发现，不同报纸对每一事件的报道数量和报道性质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更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在这一周中，许多报纸对很多事件全然没有加以报道。只有3件事——朝鲜战争，法

国国会下议院会议和法国内阁危机——得到所有17家报纸的报道。摩洛哥局势和贝文辞职，只有一家未报。17条新闻中，8条为不到半数的报纸所报道。一家报纸——《圣保罗州报》——只有一条未登。但是另一张报纸——《大公报》——只登了17条中的4条。平均数在10条至11条之间。换句话说，这些报纸的读者中，平均每人没有机会读到的新闻在6条以上。

这种报道的结果是什么？几年以前，国际报纸研究所请一位著名的印度记者和一位著名的美国记者研究在一个月中他们本国的新闻在另一个国家报纸上的处理，并提出报告。没有一位对于他所发现的情况感到非常满意。我们可以通过节录看到报告的基调。

美国报纸关于印度的报道：⑥

报道是草率而又杂乱的……对于来自印度的新闻，编辑们显然只对4大类型感到兴趣——异乎寻常的或是稀奇古怪的新闻，同东西方斗争和共产主义有着某种联系的新闻，与美国的经济援助有关的新闻以及关于灾害的新闻……常常是只刊登开头的几行而扔掉其余的部分……印度国内政治舞台实际上是一本没有打开的书……除了关于不可接触者、种姓制度或童婚等这类不可避免的片断消息，有关印度社会生活的报道在日报上就很少了。

印度报纸关于美国的报道：⑦

同一般美国人对于印度的印象一样不求甚解……新闻是有的，但新闻背后的事情就没有了。美国的情景描绘得既不恰当又不平衡……它因传播渠道的狭窄和在美国的印度记者的缺乏而受到损害……印度人感情上最难接受的美国生活的一些方面，却在印度报纸上被加以鼓吹，其程度与它们在美国生

活中的重要性不成比例。

我们一定会得出结论，国家间新闻的流动是稀少的，而且是不平衡的，对少数高度发达国家的报道很多，对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报道很少。至少，在某些事例中，容易忽视重要事件，并歪曲事情的实际情况。

国家间人员与人际信息的流动

其他方面也是一样，流入与流出发展中国家的人员、信件、电报、电话的数量，比起高度发达的国家来要相对少些。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先进国家中，旅游和旅行的机构和设施都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完善的商业与工业体系为因事访问一个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前提。但是，有些差别是很大的。

举例来说，根据最近(1961年)的可比数字，印度一年可接受大约10.9万游客。这就是每3,970个印度人对1名外国游客。另一方面，法国一年要接待500万稍多的访问者——大约9个法国人对1个。

下面是不同国家在旅游方面的可比数字：

乌干达	1名游客对872名乌干达人(简称1对872)
日　本	1对776
土耳其	1对219
波　兰	1对202
泰　国	1对176
阿联酋	1对126
智　利	1对106
英　国	1对38

当然，在旅游和国外旅行方面，“其他的情况”也并非总是一样

的。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对旅游者有更大的吸引力，一些国家(例如欧洲国家)位于拥有高密度外国人口的地区。有些国家的语言问题比其他国家要少。但是一般说来，人员向欠发达国家的流入显然要少些。因此，同外国人进行个人接触和传播的机会也少。

邮件和电讯的流动也一样，如表6所表明的。在这方面，同在旅游方面一样，事情并不是必然平等的。比方说，像摩洛哥和阿联酋这样的国家，它们与国外有密切的经济联系或是有政治与社会利益，所以有比人们按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预期的更多的邮件的流动。但是一般地讲，格局是：发达国家已经开发了人际接触的更广阔的天地，发展中国家则仍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

表6 在选定的国家中每年人均收到的外国邮件与电报的数量

国 家	邮件(件)	电报(封)
印度尼西亚	0.18	0.01
印度	0.37	0.02
尼日利亚	0.97	/
土耳其	1.1	0.03
智利	1.6	0.14
波兰	2.3	0.03
阿联共和国	3.5	0.003
摩洛哥	3.6	0.08
法国	8.4	0.16
英国	17.1	0.34
挪威	17.5	0.41

消息来源：联合国统计年报，1962年。

信息材料在国家间的流动

所谓信息材料，我们不仅指书籍、期刊和电影，也指信息和教育的原材料：印刷纸、未经剪辑的影片、放映和照相器材、广播和电视的接收机、零部件和播送设备、印刷设备、音响录制设备、科学仪器、模型、地图、图表和其他教学用具等等。在高度发达的国家中，所有这些的供应都充分得多，而在欠发达国家，进口这些材料总是有某些困难。

为了说明这些材料供应上的不平等状况，我们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1960年，印度尼西亚、印度和菲律宾总共生产了约35万台收音机。同年，日本、苏联和美国生产了大约3500万台收音机和约1000万台电视机。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收音机，而工业国家的生产能够满足这种需求并有能力在出口销售的要求扩大时增加生产。对于我们所提到过的各类信息材料，情况或多或少也都是如此。那么，是什么妨碍了这些材料大量地从发达国家流向欠发达国家呢？

从根本上说，是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力支付它们需要进口的东西。国际的和双边的援助在某种程度上将提高它们的购买力，但是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是振兴它们的生产力和国民收入。同时，缺乏支付能力换句话说就是缺乏外汇。

在一位进口商获准购买外汇之前，通常他必须为他所期待的进口搞到一张许可证。这就使政府有可能控制外汇的流动并确定哪些项目有权优先使用外汇。钢材、机床、能源、电器设备和工业的其他支柱经常要比启蒙材料享有更大的优先，这并不奇怪。考虑到政治现实，甚至战争和国防用品也比书籍、杂志或教化学课所需的实验设备要得到更高的优先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这些旨在充分利用不足的财源的基本外汇控制之外，很

多国家还对某些信息材料施加进口控制。他们对很多这类进口征收关税。通常采取这类手段的目的，在于增加收入或保护国内的制造业和销售业。这些材料一旦进口，通常要被课以销售税——批发或零售，或二者都征，借以增加政府的收入。当然，所有这些关税与税收的影响，是提高最终消费者的开销，从而削减进口。

一些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了一次世界范围的调查，内容是关于影响信息材料国际流动的关税和贸易规定。在这份作为手册出版，名为《对知识的贸易壁垒》的报告所论及的92个国家中，有57个位于发展中地区。它们之中大多数对于出版采取较为自由的政策，但对大众媒介所需材料的进口却实行严格的控制。

这57个国家中有 4 个对报纸和杂志征收相当于其价值 2 %—9%的关税，两个收取8%的领事费。至于书籍，两个国家征收9%—33%的关税，一个国家每公斤收税15美分。两个国家征收 8 %的领事费，其余的国家对出版物免征关税。

新闻纸和其他印刷纸张没有受到如此宽松的待遇。对于这类材料，40个国家从价征税5%—40%，或每公斤1—15美分。在某些情况下，按重量征收小额税，加上8%的从价税。

57个国家中，56个对于未曝光过的胶片征收关税，每公斤12美分—2.03美元，或是每英尺0.1—0.5美分不等。两个国家除征从价税20%—30%外，还收取领事费。54个国家对电影放映机征税14%—80%，或每公斤51美分—4.02美元。

55个国家对收音机也征收关税，税率从12%—100%，或是每公斤51美分—5.36美元。关于电视机的信息，只能从18个国家得到。所有这些国家都对它们征税12%—45%，或每公斤1.19—1.44美元再加100%的从价税。

几乎所有这57个国家都通过外汇控制或发放许可证，或是两者兼用，限制信息材料的进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强烈声明：

> 对于知识自由流动的限制，能够而且应当予以解除……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这些限制的实施乃是出于偶然，而非事先设定。控制经济的总趋势，吞食了教育、科学、文化的材料和其他的商品。然而，政府从对这类材料征收关税中所获得的收入相对来说是很少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不存在它们同国内工业进行竞争的严重威胁。在放开这方面贸易的过程中，不管会造成什么样的轻微牺牲，都会因促进教育进步和相互理解的机会而得到很大的补偿。[8]

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

国家间这些不完全的联系的效果，在于它强调并有助于维持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在信息材料方面已经富有的民族，发现自己比之于欠发达民族更易于增加这些材料的存货。已经有了最广泛、最频繁的人际接触的民族由于旅行和信息的扩散，感到它更容易增加这种接触。已经获得所能得到的绝大部分新闻的民族，也支配着新闻在世界范围的流动，以致欠发达国家的新闻相对来说鲜为人知，这些国家甚至彼此之间都知之甚少。哪里最需要信息材料、人际联系和欠发达国家的新闻，哪里就最难获得它们。

国内的流动

甚至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大城市也比农村地区更容易得到信息。大报、图书馆、杂志摊、大学、专家和学者、演讲、会议、俱乐部、美术馆、成人教育与夜校——这些都很容易在伦敦、巴

黎或莫斯科找到，但在200英里之外的山村中却并不是那样垂手可得。如果拿开罗、孟买、拉各斯和利马与距它们200英里之外的村庄相比较，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但是值得注意的重要之处在于，在一个不发达国家中，城市与乡村之间供应的差距是那么大，而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中，这种差距相对来说要小得多。

这一点可以用在西半球进行的两次民意调查的结果来说明。1953年，一个国际组织资助了一项在美国全国成年人中进行的关于读者和国外新闻知识的抽样调查。这次调查对居住在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人们在新闻知识方面的差别作了一次比较。下面是对居住在人口 5 万以上的城市里的人和居住在人口2500以下的居民区中的人提问的结果。⑨

	正确回答的比例(%)	
	人口在5万人以上	人口少于2500人
英国外交大臣最近访问了美国，他的名字是什么？	48	41
请您回答最近是什么灾难使得成千上万荷兰人无家可归？	79	82
谁现在是英国首相？	81	76

对某些问题，正确回答所占的比例可能不如报纸和广播所预期的那样高。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在美国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水平都相差甚微。

可与上述调查相比较的是1960年对巴西人进行的一次全国范

围的抽样调查。这次调查将城市人口同居住在人口2000人以下的城镇的人进行了比较。⑩

	正确回答的比例(%)	
	城市人口	农村人口
谁是巴西离任的总统？	80	50
谁是美国离任的总统？	35	5
谁是古巴和古巴革命的领导者？	35	6
巴西应当同哪些国家合作？	49	17

因此在巴西，城市和乡村在时事知识的掌握上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甚至在诸如谁是巴西总统这样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里，信息水平随着与城市距离的增加而迅速下降，这一现象为戴梅尔所证明。当时，他在与印度城市浦那距离不等的村庄中研究不同类型的信息的影响范围。⑪最近的村庄就在市郊，最远的离城80英里。其他的距浦那依次为11英里、20英里、24英里、26英里和72英里。直线距离不能完全与信息的数量相对应，因为通过道路，有些村庄比其他村庄更容易到达，有些村庄的社会结构要比其他村庄更适宜于寻找和传播信息。但是分布在浦那附近距浦那中等距离与远离浦那的村庄之间，差别之大是戏剧性的。一个距浦那72英里的名叫帕坦的村子，几乎与外部世界毫无联系。村子里没有识字的人，过去曾经有过一个，但他到城里找工作去了。只有4个人见过火车，村民中没有人到过像浦那那样远的地方。进行调查时，只有头人知道尼赫鲁是印度的政治

领袖，这也是头人所知道的国内政治的全部内容。而对于世界政治和印度的对外政策的知识等于零。至于有关种姓制度和宗教的现代观念则一点也不知道。没有报纸、杂志或收音机进入过该村庄。

距城市较近些，信息就较容易得到。在距浦那最近的两个村庄中，尼赫鲁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为许多人所知，而在距浦那较远的两个村庄中，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印度已经独立。有关外国、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外国领导人以及印度的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的知识——在任何地方都少得可怜（除最近的两个村庄外），这类知识实际上等于零。在任何地方，都很少有人知道五年计划和村庄发展计划的细节。但是这种知识已经到达在距离上位于中间层次的集团——距浦那20英里的村庄里的一些人。关于种姓制度，宗教和平等的现代意识在浦那附近的村庄中广为人知，在中间距离的村庄中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在遥远的村庄中完全不为人所知。因此，随着一个人一步步远离城市生活，现代世界与现代生活的帷幕就渐渐落下，直到你发现遥远的村庄几乎全然没有被现代社会所触动和通报信息。

戴梅尔教授是在50年代中期进行的这项研究。如果今天他回去看一看这同一块地方，他无疑将发现，现代世界已经进一步向农村渗透，关于国家发展和政治，人们已经比过去知道的多得多。然而，这种模式的一般性质却依然如故：在高度发达的国家中，信息相对均匀地在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中扩散，而在欠发达国家中，城市和乡村之间，信息的供应和数量明显下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

两种传播制度

L·派伊在对非西方社会中的传播模式和政府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指出，大部分非西方社会有两种分得很清楚的传播层次

——都市或权贵的层次与农村或大众的层次。他说道：

> 大众传播媒介位于都市的中心，它立足于西方技术的基础之上，服务于社会中最西方化的成份，并与居统治地位的或全国范围内的政治有着最密切的联系。除这些中心之外，传播的进程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传统的技术。它的运行主要服务于较少西方化的人的需要和定型化了的政治过程。
>
> 这种基本分歧的结果是，在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传播中占支配地位的思想与话题，在人口的其他集团中可能并不能得到反映。一件戏剧性事件的新闻可能在社会中传播得非常迅速——绝大多数印度村民得知甘地逝世消息的迅速，经常被作例子来证明口头传播过程的效率——但是对于这类事件的意义的解释，却远没有得到有效的传播。确实，在农村这一层，常常有人因为得到了一张都市的报纸而成为重要的信息源。然而，不识字的障碍是很大的，而且报纸在对都市化的受众进行传播时采用的参考结构对于那些在农村里的受众常常是无意义的。更重要的可能是，城市的传播过程常常对于在各种农村体制下发生的事反应不敏感。大众传播媒介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反应常常要更敏感些。这可能不是一个令人奇怪的事实，因为西方化了的集团是这些媒介的主要受众，但是对于理解这些国家的特性来说却是很重要的。不像西方极端的民族主义者通常所做的那样，求助于民间文化的活力与价值并抵制外来者的价值，这些集团常常以根据其自身的价值观念对外部世界做出判断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愿望。
>
> 除了这种基本的区别之外，传播方式还经常由于乡村这一层的传播主要依赖于口头传播而进一步复杂化了。这种口

头传播过程造成了数不清的分支系统，每一个分支系统都只被局限为在它的参与者之间进行个人接触的环节。[12]

派伊教授的评论，与其他试图描绘发展中国家信息体系的人的观察是相符的。在所有这类国家中，传播媒介在城市以外很难得到。例如戴梅尔发现，除了在距城市最近的村庄，无论是报纸还是广播显然都不能对知识的积蓄做出很大贡献。这是可以料想到的，因为文盲使得印刷媒介的市场在城外迅速减少，缺电使人们难以使用电子媒介，一个破破烂烂的运输系统难以传递任何东西。但是即便大众媒介确实来到了乡村，它们通常也不是属于农村或是为农村服务的。在发展中国家里，农村和小城镇报纸及地方广播并不常见。因此，来到农村的是都市报纸和城市或全国性的广播。如派伊所说，农村和城市并不能平等地接近同一个传播体系，而是毋宁说有两个传播体系永久存在着——一个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大众媒介，它是有效率而且迅速的，但只涉及都市里的事情；另一个是农村中的人际传播体系，它是缓慢的，传播范围有限，使农村显得更孤立，然而涉及到农民们最关心的那些问题。

表7　埃及男性村民区分公民投票与选举的能力，与报纸和广播对于它们的覆盖程度有关

	正确的回答(%)	不正确的回答(%)
读报	13.9	27.7
不读报	4.6	53.8
听广播	15.5	60.0
不听广播	3.0	21.5

材料来源：G·K·Hirabayashi和M·F·EL Khatib
《在埃及农村中的传播与政治意识》——《公众意见季刊》1958年第22期 P357—363。

但是，所有可以获得的证据都指出，一旦大众媒介进入，信息的层次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勒纳曾写到一个村庄中第一台收音机的重要性。更近些时候，我联系大众媒介覆盖程度，在埃及的一个村庄中做了一次政治知识测验。平林与埃尔·卡蒂伯[13]研究了开罗以北约50英里的5个小村庄。他们找到读报和听广播的人，然后就一些政治人物和政治问题提出询问。他们要求回答者解释选举与公民投票有何不同。这种解释需要有相当的政治世故，因此通过它可以有趣地观察到对媒介的使用同回答问题的能力之间的联系。表7给出了他们报告的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到，在能够区分公民投票和选举的村民中，读报者是不读报者的3倍，听广播者是不听广播者的5倍。报纸的读者中约有一半的人能够回答这一问题，而在不读报的人中，这个比例只占1/12。大约1/4的听广播者能够回答，在不听广播者中，是1/7。为什么两者间的差距不更大些？报告作者提出的解释是："埃及的报纸主要是为城市读者办的……因此未用农民能够理解的方法解释什么是公民投票。至于收音机听众，他们大多数爱听念诵可兰经和流行音乐，而不是其他节目。"[14] 因此，能否获得媒介产生了差别，而从媒介得到什么所产生的差别更大

多伊奇曼曾就在哥伦比亚的一个山村中媒介覆盖的影响提出报告。[15] 他将人们与媒介接触的程度划分为等级，使得使用几种媒介或经常使用它们的人能够在数量上与那些很少接触媒介的人区分开来。表8给出了他对同媒介接触多的人和同媒介接触少的人所进行的一些比较。

表8　在安迪恩的一个村庄中，同媒介接触多的人和同媒介接触少的人在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上的知识、态度与行为的比较

	同媒介接触多的 (N=24)(%)	同媒介接触低的 (N=26)(%)
在医院接生	72	35
请助产士接生	25	27
不适用上述分类	/	38
希望子女从事与农业不同的职业	59	19
希望子女务农	33	39
不适用于上述分类	8	42
有丰富的政治知识	62	4
有一些政治知识	25	19
没有政治知识	13	77
初步了解6 种早期农业发明的	54	44
a)给小鸡接种霍乱疫苗	17	11
b)留种土豆的新品种	37	33
c)杀真菌剂	63	28
d)对牲畜和家禽的饲料供应	66	44
e)喷水枪	60	44
f)化肥	69	44
采用上述措施的平均数	4.26	3.69

材料来源：P·J·多伊奇曼：《在一个欠发达村庄中的大众传播》《新闻季刊》1963年第40期P27—35。

当然，我们不是在争论说，媒介接触肯定是一些农民比另一些农民了解更多信息的唯一原因。教育很可能是造成这种差别的一个原因。人们"学会学习"，并且因此而找到媒介。已经有所成就的人更迫切地要求学习，看来可能也因此更能接近媒介，并因此而造成人品与标准的不同。但是，多伊奇曼做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来试图确定大众媒介可以施加什么影响，教育或其他又有什么影响。他从他的试样中排除了所有识字的与受过教育的人，然后，把其余的人按媒介覆盖程度的高低分成两组。当然，这些人能听广播和看电影，有时，还有人给他们读报刊。当他以他们采用了多少农业新技术为基础，把这两组人加以比较时，他得到了表9所报告的结果。

表9 在安迪恩的一个村庄未受过教育者或文盲中，联系接触大众媒介情况进行的采用新技术情况调查

	与媒介接触多的（%）	与媒介接触少的（%）
采纳得多的（4种或更多的新技术）	71	38
采纳得少的（3种或更少的新技术）	29	62

材料来源：P·J·多伊奇曼，《在一个欠发达村庄中的大众传播》《新闻季刊》1963年第40期P27—35。

由此看来，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里，大众媒介在消除信息鸿沟中确实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扩展人际传播的手段

在不发达国家的城市以外的地方，不仅缺少大众媒介，而且

缺少使人能同自己身边以外的人交谈的设施。比起高度发达的国家来，旅行的困难更多。在亚洲和非洲的很多村庄，没有道路把它们与其他居民区连结起来，尽管有些村庄偶尔有大轿车或经得起颠簸的小轿车经过。但因此，开辟一条从农村通向城市的道路是一件大事。然而不管有路没路，传统社会中的村民都很少远离家园，也很少见到采访者。

农村中缺乏很有效率的邮政服务，也没有很多电报，电话更没有。表10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内的邮政、电报、电话同一些进一步发展了的国家的相应设施进行了比较。

这个表格应当同表7加以对照。你将会看到在国内和国外邮政和电报方面存在同样程度的不发达。

表10　在下列国家中，每年人均得到国内邮件与国内电报的数量以及每1000人接到的电话数量

国　家	邮　件	电　报	电　话
印度	8.1	0.07	1
尼日利亚	2.6	/	1
印度尼西亚	2.1	0.07	1
泰国	/	0.09	3
埃及	8.7	0.14	9
土耳其	7.9	0.32	9
摩洛哥	2.6	0.03	11
乍得	13.0	0.88	26
波兰	29.8	0.32	32
法国	166.7	0.26	101
英国	190.6	0.25	161
挪威	109.0	0.93	214

材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年报，1962。

人们可能以为，在缺少适当的大众传播时，比较传统的传播方式会担负起消除城市与乡村的信息差距的任务。在可能的范围内，事实确实如此。会议由政府官员和政治发言人召开。民间戏剧、木偶与歌手总是受到大众欢迎的。集市和市场仍然为伴随着货币或商品交换的信息交流提供场所。"小道消息"历久不衰。但这些绝大部分是速度慢容量有限的渠道。"小道消息"有时是非常快的。但是，正如派伊所说，它能传播的东西有限。一件大事的口信——甘地之死、喜马拉雅山上的武装冲突——这类新闻能被小道消息有效地加以传播，但是解释性的材料，说明性和技术性的材料以及劝说性的材料，如果用小道消息的方式来传播，就会被歪曲得不像样子。

传统的传播方法甚至使一个村庄要同它的邻村进行对话都很困难。在某些情况下，政府的与政治的联系、在农村与政府的权力之间所铸造的传播环节，比乡村间的传播环节更为牢固。但是通向中央的环节充其量也不过是脆弱的。因此，如果农村的传播是传统的传播，如果没有道路、电话、良好的邮政服务和其他延伸物，那么，国家就很难使它的农村从它们的孤立主义中走出来。

发展信息的传播

国家发展中的绝大部分信息项目是一种大众媒介和个人建议与主张的综合物。离城市越远，大众媒介的影响就不可能避免地要越降低；因为大众媒介就变得更难于被接触到。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大众传播的特殊运用方式来补偿这种传播的递减，例如印制通告、墙报以及登满发展信息的这类文件，此外还可以有计划地制订供农村听众讨论或是针对当地问题而播发的无线电广播节目。还可以通过为流动的电影放映车以及其他电影放映者制作的关于发展题材的影片来进行补偿。更为重要的是，他

们试图在诸如保健、农业和社区发展这一类领域中雇用和培训熟练的工作人员，通过他们直接与公众进行交谈。在这方面，很多国家已经作了这类引人注目的工作。但是，相对于必须与之交谈的农村人口的数量，工作人员的数量几乎总是显得太少，而且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没有受到过良好的训练。大众传播的特殊运用总是太有限和太分散。传播的链条常常很长，因此媒介的通报难以超越地域的限制，或是数量不够让所有人看到，或是某个村庄对某种特殊信息的需要不能从一般的通告得到满足。电影放映车不能常到较遥远的地方去。很多村子没有收音机。因此，尽管一个开发部或开发委员会做了最大的努力，关于国家发展方面的信息(如新闻和其他信息)的水平，还是随着与城市距离的增加而下降。在大众媒介、学校和其他传播渠道得到更均衡的分布以前，信息的均衡传播是没有希望的。

上面介绍了拉奥、戴梅尔、勒纳和许多别的人的观察。这些人已经举例说明，国家的发展努力、和这种努力中用于农村保健、农业和社区发展的特定部分，是如何难以到达远离城市的农村，以及由于缺少多种渠道，一个农民要对他所得到的信息进行核对和补充是多么困难。

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

除了使用令人沮丧的词句外，很难归纳我们在前面谈到的这些事情。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新闻看来是稀缺的，除非某个国家出了事——例如发生战争、革命或是灾害。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材料由于缺乏通货以及由此而来的进口限制和关税而很可能受到阻碍。人员和信息向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流动看来要比向高度发达国家的流动要少得多。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内部，信息的流动和供给随着从城市向农村距离的延伸而迅速地减少。因此，在信息已

经是最少的地方，信息的流动也是最少的。同样，在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最需要变革的地方，变革看来会受到威胁，并且看来最可能遭到抵制。

向现代传播的转变

当一个社会开始现代化时，发展的第一批迹象之一即是传播渠道的延伸。

在一个完全是传统的和文盲的社会中，人的有效环境到他所能见到的地方为止，虽然有效环境也包括了由父母传给子女，或是由教士传给信徒的民间的智慧和宗教信仰。偶尔有一位旅行者、一位行吟诗人或是一个信使带来关于地平线以外地方的情况。有时，一个爱冒险的年轻人在好奇心驱使下亲自看看在地平线之外有些什么。但是，绝大部分时间里，这个传统的村庄生活在它的古老生活方式与有限的地域之中——直到"发展"开始。然后，政府、道路、学校、文化和大众媒介侵入离群独处的村庄，并吸引村民进入一个更大的世界。

伴随那个更大的世界而来的是一种深刻的心理变化。传统的村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用他们的双脚和意志就可以把握的世界之中。现在，在他们面前展示的却是一个必须依靠别人来告诉他事情的世界。他曾经生活在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事实上说都是地方性的关于危险和机会的信息流中。现在，他从呈现在他面前的信息流中看到的，是非地方性事件中的危险和机会。在他被带进的这个世界里，一个海岛的被封锁，在接近亚洲心脏的高山上打仗，在纽约东河边上玻璃墙的建筑物中一个外国大使对另一个外国大使说的尖刻话，都会被认为对一个农村里的个人有危险；一次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的飞行，在外国实验室中发现看不见的细菌的

生命，或是发现了一种被称作"脱氧核糖核酸密码"的物质，据说都会影响一个人从父母那里得到的遗传，因而可以说是一种机会，这一定是一种奇怪的经历。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对"地方性"这个词要重新定义。很多属于地方的事，现在看起来不重要了，而很多距离遥远的事，却从其重要性上被视为当地的事。对于居住在印度心脏地区的村民来说，喜马拉雅山上的战斗具有一种地方性的含义。对于居住在非洲心脏地区的居民来说，发现雅司病（一种热带的痘状慢性皮肤传染病）的治疗方法也具有一种地方性的意义。比起其他因素，大众媒介的到来，是导致这种差别的更重要的原因。当收音机开始在农村和小城市使用时，它们带来的主要是非本地的新闻。当报纸到来时，它们刊登的有关国内与国际事务的消息和言论在版面上占有很大比重，此外还有较少的关于地区大城市或州首府以下地方的报道。例如，请参阅表11关于印度地区性大城市那格浦尔3家日报内容的分析。

在那格浦尔周围的村子和小城镇中，不管这3家报纸送到哪

表11　1961年10月，3家那格浦尔日报的消息与言论的内容

	消息(%)			言论(数目)		
	国际	国内	地区	国际	国内	地区
那格浦尔时报(英文)	24.8	56.3	18.9	10	12	8
讷伯印度报(印地文)	14.5	68	17.5	7	15	8
马哈拉施特拉报(marathi)马拉地文	14.3	63.3	22.4	8	20	2

消息来源：K·E·伊彭，《那格浦尔三家日报的内容分析》

《the Hislop新闻工作者》1962年第2期P43—44。

里，它们显然都带来大量来自远方的信息，并就现在已逐渐为那格浦尔地区人民感兴趣的远方的事件发表评论。

我们一直在谈论新闻和公共事务，把它作为对于一个国家发展时，信息会起什么作用的一种解释。不但来自纽约和莫斯科的消息，而且远方国家的耕作方法，远方实验室中的科学发展，远方的中心里的艺术与思想，外国的书籍和广播——所有这些，对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也都成为有趣的和重要的东西。而且按目前的发展速度来看，这种变革几乎是突然发生的。

因此，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里，信息的渠道在很短时间内要得到非常迅速的延伸。在固有的联系渠道，诸如邻居对邻居、看守人或委员会对公民、父母对子女、或是直接的观察之外，必须加上能够到达比直接经验要远得多的地方，而且常常通到世界的另一头的新渠道。不幸的是，总是有相当数量的低效率伴随着新渠道和长渠道。

渠道沿线的损失

渠道越长，原始信息完全通过的就越少。无论在高度发达的国家还是在欠发达的社会中，情况都是这样。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这种情况较容易显示出来，因为在那里监测较为经常。例如，让我们看看新闻电讯稿在从一家通讯社的主要办公室到达日报读者手里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

记录在图表3中的消息的流动是1953年在一个5天的期间内所监测的。因此，这个结果并不精确地适用于任何其他通讯社，任何其他国家，任何其他报纸，或是任何其他时期。但是，这个结果却具有足够的代表性，使我们对于信息通过一条有许多把关人的长渠道后丢掉了多少内容有一个概念。在这个例子中，回答是，从一家通讯社的国内部发出的新闻稿，在通过主管全国广播的部

约10万到12.5万字的新闻稿从各种来源和每一个新闻圈流入美联社。不知道稿子的确切条数。

从这些稿子中，美联社的编辑选择并签发了283条，约5.7万字。这个数量的消息从美联社的几条专线上传送到美国的每个新闻圈。

从这大量的消息中，威斯康辛的美联社分社选出了77条，约13352字，转发到非大都市的威斯康辛的日报。它们约占从电传干线所获得的消息条目的27%，字数的24%。分社又在此之上增加了45条报道和6000字的威斯康辛新闻。因此对于州的专线来说，它发出了122条消息，总字数为19423字。

4 家典型的威斯康辛日报从州专线中选出并使用了74条消息，12848字。约占可从州专线得到的新闻条目的61%，字数的66%*

"报纸读者连续调查"和其他读者调查表明，一名读者的平均阅读报纸上所刊出报道1/4或1/5。对于从州专线翻印的条目他大约看15条，约2800字。在电传干线发出的283条消息中，他可能只读9条。

新闻流入美联社，然后又流出。

从美联社分社到电传干线。

从电传干线到州专线。

从州专线到日报

从日报到读者。

图3 美联社的新闻从总社国内部向四家威斯康辛非都市日报的流动

材料来源：S·C·卡特利普：《美联社新闻的内容和流动》，《新闻季刊》1951年第31期第434—446页。

主任、编制州专线新闻的州专线主任、设计版样的新闻编辑和决定读哪条新闻的读者之后，大约98%的内容被扔掉了。

现在，假设我们延伸传播渠道。举例来说，我们从印度、中

国、阿尔及利亚或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开始，那里每天都有成百桩新闻事件发生。这些消息看来能有多大的比例被把关人放行而远达通讯社的主要办公室？

假设我们在另一端延伸传播渠道。让我们想象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里，新闻电讯稿的流动正伸展到一家农村报纸。这也许是一张小报，由于缺少读者、广告和新闻纸，所以它将只能从得到的新闻中选出较少的一部分加以登载。但是它的读者将因此而更有理由从头到尾地通读这张报纸，因而也就更有理由将他们读到的东西讲给别人听。这张报纸上的消息中，有多少条目将被通过口头加以传播？当然，损失将是很大的，而且准确性远非完美。

新闻的流动比较容易计算，而且比其他类型信息得到更多的研究。但是，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来说，在科学、经济、政治与社区发展的信息流动方面，存在着与信息传播过程具有同样性质的损失，而且在向政府领导人提出一个村庄的需要、愿望和困难方面，损失甚至要更大些。任何一个曾经观察过发展信息从州首府，或是一个远距离的信息源向农村的流动情况的人，都将承认他也曾看到过图表3所反映的事实。随着与信息源间距离的加大，信息的流动逐渐地减弱。发展信息的扩散被贴切地比做灌溉：要求保证渠道末端也能够得到适量的信息，尽管在途经沙漠时会有相当数量的信息渗漏掉。

长渠道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信息在当地被应用于农业、社区发展、政治参与以及诸如此类，就必须有一种适于在当地使用的形式。地方上的需要在耕作、季节、习俗、发展阶段、接受程度，有时还有语言的类型上，有着鲜明的差异。因此，不仅尽可能减少信息的损失很重要，而且把信息转化并使之在当地得到采用，再用从其他渠道获得的可能更短、更有针对性的信息加以补充，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提到"把关人"和"多渠道"。

把关人

信息渠道越长，沿渠道就有越多的点。在这些点上，某个人有权声称，某个信息将被接收和转发，是照原样转发还是修改了以后再转发。维也纳的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可能是指出这些"关"和"把关人"的存在的第一个观察者。[16]他预言，这些点遍布于信息渠道全线。在这些点上，必须做出"进"或"出"的决定。因此，在信息的流动中，操纵这些"门"的力量和操作规章或实施操纵的人员就成为至关重要的。

人际间交流渠道和大众媒介渠道都有把关人。在人际间交流渠道的沿途，任何人都可以决定是否复述，或以什么形式复述他所得到的信息。关于通过人际锁链加以传播的谣言，已经有了许多研究。[17]这些信息时常由于站在门口的人的特殊利益和知识而受到改变。当渠道相当长时，从渠道末端传出的信息常常与它在开头输入时的样子很少有相似之处。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在大众媒介渠道上的把关人拥有什么样的权力。举例说，考虑一下携带消息环绕世界的那些渠道。第一个把关人是目睹新闻发生的人。他是有选择地看的，注意到一些事情，没有注意到其他事情；他报告了事件的一些部分，没有报告其他部分。第二个把关人是同"消息来源"交谈的记者。事实上，记者可能必须同一批消息来源谈话。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必须决定通过链条传递什么事实，写什么，给予这一事件以什么样的形象、色彩和意义。他把他的报道送给编辑，后者必须决定如何编这条报道，要删、要加还是要改写。然后他必须决定，这条报道是否值得交给发稿专线。如果他决定交送，那么通讯社里的某个人就必须决定它是否是从成百上千条消息中挑出来要用电报发往其他城镇的少数几条消息之一。别的某个人将决定它是

否值得发往国外，如果值得，以什么形式以及应当有多长。如果它真的要发往国外，那么，它可能将来到一扇非常大的门前。在这里，两个通讯社交换它们的稿子。也是在这里，第一个通讯社必须决定是否对对方的稿件放行，是否要对它进行删节或重写。经常有着比能够转送的数量更多的消息。如果一条报道继续向前走，它就要碰到更多的门：全国新闻专线、地区专线，最后是报纸和广播电台，那里的新闻编辑必须决定付印或广播哪些新闻，需要删节多少或重写多少。因此，世界新闻链条开头处的成千上万条消息中，只有少数几十条可以最终到达某个特定国家的读者和观众那里，而且在链条的终端，它们将是更简明、有时是被改变了的消息，那就不足为奇了。

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里，领袖与人民之间以及民众之间来往的信息链，特别有赖于把关人。这不仅因为这些链条是长的，有时为并行的渠道(就象我们将有机会在下面几页中所观察到的)所增补和校对，而且因为需要选用适合于当地的信息。发展的阶段越早，当地的需要也就将越具有特殊性。因此，社区工作人员、农业顾问、向别人报告报纸上说些什么的识字的村民、代表民众向高层政府说话并向人民解释政府行为的民选代表、选择适用于本地的电讯并处于将发展计划进行情况诉诸人民的地位的地区报纸、向政府报告计划的执行情况和它还需要些什么的记者、人们向之征求意见的"有影响的"农民——这些人以及很多其他的把关人，肩上承担着更大的责任。但是在一个新兴的国家中，把关专家经常是很缺的。农业保健以及社区的发展组织也还没有很好地建设起来。当地广播电台或当地报纸为数很少，采集新闻的机构并不是非常地方性的。在新兴国家中，缺乏能够帮助把新知识变得有益于高度发达国家的人民的"中间人"。因此，信息必须尽其所能地向前发展，高度发达的国家已经发现，它们的科学技术知识

储备，在出现可以称之为专家的中间人来解释或对之加以应用之前，对于非科学家来说用处甚微。而且，在这种中间人向实验室报回知识如何起作用、有什么新的问题需要回答之前，这种知识既没人需要，也没有最佳的运用形式。所以，生物学和物理学在出现诸如物理学家、药剂师和工程师一类熟练的应用家之后，才有了迅速的发展，也只有在这时，医药知识和工程知识才开始认识到它们在实用方面的真正的潜力。同样，熟练的说明家，诸如科学文章的作者、农业代理人、健康函授班和社会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这一类人的发展，会使人们在理解新知识和准备如何运用它们方面产生深刻的变化。

缺乏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一类的应用家，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试图加以解决的问题。熟练的信息中间人的重要性也许还没有被充分认识。然而，在信息渠道又小又少的地方，使信息清楚和具有说服力却更加重要。在很少有人受过技术教育的地方，用人们所了解的语言去解释技术就更加重要。在号召变革的地方，作家、讲演者或顾问有能力向被要求进行变革的人民强调变革的重要性就显得格外重要。

多元化渠道的效用

缺乏熟练的把关人与缺乏通向发展中社会民众的多元化渠道有关。

为什么在一个处于相对先进发展阶段的国家中，信息的流动要快些？原因之一就是在那里有更多的渠道。有更多的收音机、更多的报纸发行，等等，当然，还因为有更多类型的渠道。也就是说，一个人将同时拥有收音机、报纸和其他信息来源。这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

1963年初春，印度各地198个村庄中的3168人，被问及是否

知道发生在喜马拉雅山区的中印冲突，* 如果知道，他们是怎样得到这一信息的。[18] 调查是在印度北部边界事件后的几个月进行的。那时，83%的村民已经听说了这个消息。在那些听说了的人中，大约40%是从大众媒介得到的消息，60%是从私人朋友、家庭、店主之类的个人那里获得的消息。

我们可以把这些数字同一个经济上更加高度发达的社会中的新闻接纳情况进行比较研究。[19] 在美国的3个城镇就3条重要新闻报道的传播进行测定时，发现93%的人在24小时内就听到了这些消息。这表明信息的传播在这里要稍快些，特别是由于这3条报道没有一条在重要性上堪与发生在印度的事件相比。在听到这些消息的93%的人们中，88%的人消息得自大众媒介（与印度村庄的40%相比）。其中37%的人从电视、27%的人从广播、24%的人从报纸上看到或听到报道。而印度的村民，22%的人最初从广播中听到消息，17%的人从报纸上看到，1%的人从招贴中得知。

因此，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社会，至少有3条强有力的媒介渠道给它送来新闻，它们可以到达于绝大多数或是所有的人。[20] 另一方面，农村社会只有两条渠道，只能通向也许不到半数的人口。

在一个发展层次较高的社会中，如果需要了解新闻的进一步的详情或想对他们所听到的事进行核对，人们能够很容易地转向另一种媒介。如果他们要知道从收音机中听到的一条新闻的更多的细节，他们可以转向报纸。如果他们想看新闻事件的图片报道，他们可以转向电视。但是在一个发展中村庄里的大多数人，除了找别的人而外，大概就没有第二个消息来源了。

这意味着，不仅首先在消息送达某人方面较少相似之处，而且一个人要核对他听到的关于新农业计划、医疗站修在哪里、怎

---

* 原文如此，系指中印边界冲突。——译注

样获得或使用化肥、新的税收计划的内容或大概会得到传播的任何其他种类的发展信息，机会也要少得多。一个可能的后果是理解错误。拉奥曾经描述过另一个后果。② 他在农村调查中发现，在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来支持、证实或阐明所建议的变革时，采取有利行动的可能性就要大得多。当增补的信息不能得到时，关于变革的建议就会典型地被怀疑地听取，而且时常受到抵制。

当存在多元渠道时，要创办一个本地的服务机构，发现并满足当地的需要，向他们输送信息，就会容易得多。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本地的报纸、本地的广播电台、本地的传单生产日益增多。然而，在一个新兴的发展中社会里，这些都是缺乏的。因财政预算上的需要，要求广播为尽可能广大的地区提供服务。一个村庄，甚至一个小镇，不可能支持一张报纸，因而地区的支持是必要的。当投资难以获得时，多元渠道看来就像是一种不必要的奢侈。

这就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生活中的不幸事实。如果能够通过多元渠道进行传播，信息将更加自由地流动。它会被更加准确地和更有效地加以接受。如果地方的媒介能够补充地区的和全国性的媒介，它们就能够起到中间人的作用，解释信息，并使之适应于当地的条件和需要。因此，出现多元和本地的渠道，是表明向现代传播的转换正在顺利进行的一个标志。但是至少在转换的初期，多元渠道的缺乏，新而长的渠道的问题和随之而来的信息损失，熟练的把关人和地方媒介的缺乏，一定会为我们在本节中已经提到过的、在信息流动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增加新的内容。

注　释

1. 这是巴黎大学法国新闻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传播研究所的联合计划。因J·凯泽早逝，留下其重要著作的一部分没有完成，所以未发表。

代表性国家和报纸如下：阿根廷：《新闻报》、《理性报》、《安第斯报》；澳大

利亚:《吉朗广告报》、《墨尔本时代报》、《每日镜报》; 巴西:《环球报》、《圣保罗州报》; 埃及:《共和国报》、《金字塔报》、《天天报》;法国:《世界报》、《进步报》、《解放了的巴黎人报》; 印度:《印度时报》、《甘露市场报》、《印度斯坦时报》;意大利:《晨报》、《信使报》、《晚邮报》;日本:《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北海道新闻》;巴基斯坦:《黎明报》、《开伯尔邮报》、《卡拉奇时报》;波兰:《人民论坛报》、《华沙生活报》、《工人论坛报》;英国:《伦敦时报》、《每日快讯》、《苏格兰人报》;美国:《纽约时报》、《纽约每日新闻》、《得梅因纪事报》;苏联:《真理报》、《莫斯科晚报》、《哈萨克斯坦真理报》。删去巴西第三大报纸是因为无法收齐该报的月合订本。曾打算把中国大陆包括在研究内,但已证明不可能收集齐一种以上的报纸的月合订本作为月研究使用。

2. 这已由W·施拉姆编纂的《世界报刊的一日》(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60年)第138页所透露的消息来源所证实。当然,这部著作考虑到了匈牙利革命和中东发生战争的威胁给新闻模式造成的混乱。

3. 这项研究是由C·彼得森小姐在斯坦福研究所完成的。

4. 亨德里克斯和马林斯的报告见《哥伦比亚报刊评论》,(1962年), 第49—54页。

5. J·凯泽:《一周新闻》第74页,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3年。这些报纸是:《战斗报》(南斯拉夫)、《印度时报》、《民族报》(阿根廷)、《埃及人报》(埃及)、《自由报》(土耳其)、《兰德每日邮报》(南非)、《每日快讯》(英国)、《新闻报》(墨西哥)、《新信使晚报》(意大利)、《真理报》(苏联)、《纽约每日新闻》(美国)、《解放了的巴黎人报》(法国)、《红色权利报》(捷克斯洛伐克)、《圣保罗州报》(巴西)、《大公报》(中国)、《每日新闻报》(瑞典)和《每日电讯报》(澳大利亚)。事件是朝鲜战争、麦克阿瑟关于朝鲜局势的声明、巴黎外长代表会议、刺杀伊朗首相、摩洛哥局势恶化、法国内阁危机、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辞职、澳大利亚法院否决禁止共产党令、披露推翻巴基斯坦政府的阴谋、封闭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报纸《新闻报》、对苏联预算案的表决、美国报道西欧共产党数量下降、捷克斯洛伐克驻印度大使弃职、艾森豪威尔任命北约组织参谋部、意大利表决

军事贷款、土耳其内阁辞职、"公民权法案"提交到南非议会、以及查尔斯—沃尔科特拳击比赛。

6. 参阅马德拉斯市《印度报》记者K·巴勒拉曼在国际新闻学院编《新闻的流动》中的引文，第49—52页。

7. 参阅《纽约时报》R·特朗布尔的引文，出处同上，第207—208页。

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知识的贸易壁垒》第5页，巴黎，1956年。

9. 国际新闻学院：《新闻的流动》第236—237页，苏黎士，1953年。

10. L·弗里：《巴西人政治心理学的国际含义》，普林斯顿，1961年。

11. X·戴梅尔：《印度村社中现代思想和知识的传播》，《舆论季刊》，20(1956年)，第257—270页。

12. L·派伊：《传播模式和非西方社会的代议制政府问题》，同上，第250—251页。

13. 海拉巴雅什和埃尔·卡蒂卜：《埃及村社中的传播和政治意识》，《舆论季刊》，22(1958年)，第357—363页

14. 同上，第360—361页。

15. P·多伊奇曼：《欠发达村庄中的大众传播媒介》，《新闻学季刊》，40(1963年)，第27—35页。

16. 例见K·卢因在《团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对这一点的说明，《人类的关系》，1(1941年)，第145页。

17. 例见G·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幽默心理学》，纽约，1947年。

18. 这项研究在《印度村庄对全国紧急情况的知觉》一文中有报道(穆索里，国立传播发展学院，1963年)。

19. P·多伊奇曼和W·丹尼尔森：《重大新闻报道的知识传播》，《新闻学季刊》，37(1960年)，第345—355页。三篇报道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中风、发射一颗新卫星和给予阿拉斯加以州的地位。

20. 一个高度发展的社会也会有杂志和书籍流动，以给它带来信息。在发展中的村庄中，杂志和书籍非常缺乏。

21. 前引拉奥《信息在经济和社会变化中的作用》。

第三章　大众传播媒介在世界上如何分布

大众传播的重要性

我们在谈论向现代传播的过渡时，假设这是一种必然。除了某些能改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不可预见的事件外，实际上这确是必然。这里我们所考虑的问题，并非是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信息和教育的渠道，在国家发展中最终是否能得到广泛使用，而是是否应该加快它们的采用，使其对国家发展的贡献比现在更多。

这方面，大众传播媒介在历史上对国家发展有特殊的重要性。它们是伟大的增殖者。正如工业革命中机器能以其各种动力倍增人的能力一样，传播革命中的传播机器同样可使人类的信息增殖到前所未闻的程度。在第二章里我们已经明证，既使是在不识字，也无法接触到电子媒介的人们中，大众传播媒介的存在亦在信息标准上产生出意义深远的差别。幸运的是，在信息与国家发展之关系上，如此众多的国家试图向众多人民更快、更多地传播信息，大众传播不但存在，而且还很发达，它的使用得到比较深刻的理解。

大众传播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一直有效地与特权进行斗争。15世纪印刷术发展的意义，并不限于把传播从漫长世纪的口头第一手传播移向大规模的书面第二手传播，而更重要的是，将知识扩展到一小撮权贵之外。很快，印刷媒介成为政治及社会变革的工具。没有印刷媒介，欧洲和北美的革命就会难以想象；没有印刷媒介，公立学校发展的可能性就会很小，甚至完全不可能。19世

纪，大众传播进一步发展，越过了那些最有权势、能独享教育的上层人物，向广大民众提供知识和教育。政治民主、经济良机、公费教育、工业革命与大众传播共同结合起来，使几个大陆的人类生活及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新的电子传播技术的发展，又将传播重心往回移向那种可以看见、可以听到传播者的传播。电子传播技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潜在的信息渠道，这些渠道可以通向多得难以置信的受众；可以冲破图书馆的栅栏，向平民百姓传播信息；可以通过"示范表演"来教授复杂的技巧；可以在演讲时几乎得到面对面传播的效果。

在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革命——全世界2/3人民的经济、社会进步中，大众传播(以及我们学会与之相结合的人际传播)完全可能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并不是说大众传播可以独自承此重任，没有充满信心的国家领导集团，没有足够的人口、资源以及资金来源，世界上最有效的传播系统也不可能带来经济发展。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自信地说：如果不是利用了大众传播媒介或其它有关的迅速而有效的信息工具，要想按照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时间表来发展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是绝对不可思议的。

因此，让我们来看看，发展中国家为了此类目的，大众传播媒介得到了何种程度的使用。为发展斗争所必需的各种设施在哪些地方充足、哪些地方匮乏？这些媒介的发展速率是什么？它们消长的条件又是什么？

富国与穷国

我们不要心存幻想，以为所有不发达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都是相同的。恰恰相反，情况千差万别，有时会令人惊讶。媒介系统犹如它们所属的国家一样各不相同。例如，在7个非洲国家里，

除了政府新闻部门的复写的公告以外，每日别无出版物；还有15个非洲国家没有任何形式的日报。① 而另一方面，在整个拉丁美洲，报刊在大、小城市都很发达。尽管国民经济落后，却出现了十分高级的日报，智利就是其例子之一。在某些不发达的国家，如毛里塔尼亚，由于缺乏印刷设备，出版的期刊必须拿到国外去印刷。但还有一些不发达国家，如印度，印刷工业却非常发达，被用来印刷大量语言及各类技术方面的材料。在某些国家、整个广播系统依赖的是一台古老的发射机，而这台机器完全靠精心爱护和不断修理维持使用。而在一些情况差不多的不发达国家里，广播电台竟然安装了新设备。作者曾到过一个国家，那里由于一架放映机出了故障，一时又难找人修理，至使全国播映教育影片的大部分功能失灵达数月之久。作者还到过另一个不发达国家，看到那里的教育中心被赠与了一套价值25万美元的视听设备。

所以说，没有一个单一的模式。不过当你走过一个一个国家，就开始明白，发展中国家里有一种情况常成为规律而不是例外，这就是匮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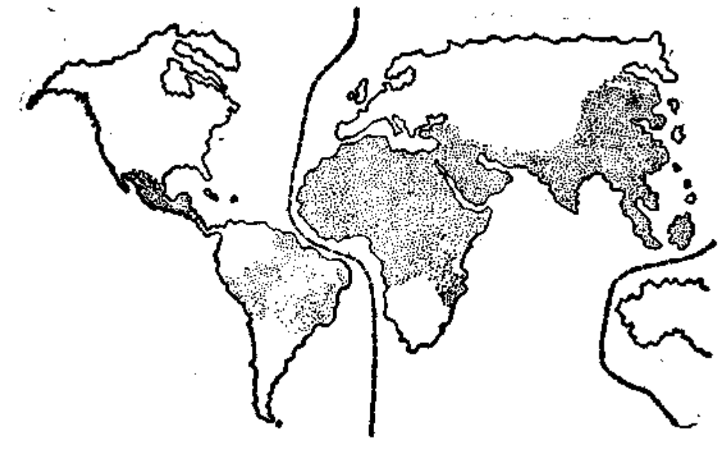


图4：匮乏带

请看图4。从美国的南部边界开始，顺着拉丁美洲看下去，一直到巴西的南部边界。然后再向东掠过整个巨大的非洲，扫过阿拉伯新月地带，跨越整个南亚和东南亚，从伊朗到印度尼西亚东端的这一带地区居住着15亿人。这就是匮乏带，其中有个别地方例外。这个地带环绕着地球，居住着世界上大部分的文盲，囊括了几乎所有的不发达国家和大部分传播系统不发达的国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一个标准，用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大众传播设备是充足还是非充足。该组织认为，作为一个"最近目标"，每个国家应力争为其每100个居民提供十份日报、五部收音机、两个影院座位和两台电视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提交给联合国的报告中说：

> 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有100个之多的国家和地区，这4种传播媒介的水平全都落在这一极低的'最低标准'之下。这些国家共有19亿1000万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66%。另外还有19个国家，人口占世界总和的20%，有三种传播媒介低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最低标准'。总之，全世界有近70%的人缺乏最基本的手段来得知本国发展的情况，更不要说得知其他国家的情况了。

事实上，实际情况甚至比这还更坏，因为上面提到的标准并不包含传播设备在国内分布的情况。在很多不发达国家，60%以以上的人住在农村，而信息设备却集中在数量相对极少的城市地区。所以，上面的基本分析并未完全反映出大部分不发达国家农村里传播设备的缺乏，甚至处于教科文组织规定的'最低标准'之上的大部分半发达国家的农村的情况也未完全得到反映。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不发达地区有大约4 0个主权国家② 没有国家通讯社，大量本国新闻的获得必须依赖 5 个世界性

通讯社——美联社及合众国际社(美国)、路透社(英联邦)、法新社(法国)、及塔斯社(苏联)。再者，这些国家的新闻在向国外传播时，大部分是通过世界性通讯社，也就是说，通过不属于他们自己的通讯社。

以上对大约120个国家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情况所作的评价，与联合国得出的哪些国家为普遍不发达国家的结论非常接近。在适当考虑了所使用的分类法的局限性后联合国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年人均收入少于300美元，它就属于不发达国家。有101个国家在此收入水平之下，此外还有16个国家的年人均收入在300—400美元之间。这两组国家也正是处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的信息设备最低标准之下、或稍稍超出此限一点的国家，几乎毫无例外。③

如果达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低标准的话，它也仅仅意味着，大约每两家有一份日报，每四家有一部收音机，平均每十户人家拥有一台电视机和一个影院座位。这个标准并不算高。报纸的最低标准差不多相当于现在一般的世界水平，其它两项最低标准比一般世界水平要低得多。虽然如此，仍有居住着世界2/3人民的至少100个国家和地区，连这一标准都达不到。表12概括了世界绝大部分地区实际情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低标准"的差别。

这张表以一种最引人注目的方式区分出富国与穷国。仔细看看非洲的数字，这片辽阔大陆的报纸人均销量只是世界人均销量的1/6弱；收音机人均占有数是世界人均数的1／6稍强；人均拥有的影院座位相当于世界人均数的1/4；电视机人均拥有数为世界人均数的1／60。在非洲，每百人所拥有的日报份数只相当于北美洲每百人拥有数的1/20，每百人拥有的收音机只是北美洲每百人平均拥有的1/35，电视机数与人口的比例只是北美洲的1/500。亚

表12 1961年，世界各地每百人拥有的日报(份)、收音机、影院座位和电视机数

	日报(份)	收音机	影院座位	电视机
全世界	9.8	13.2	2.3	3.8
非 洲	1.2	2.3	0.6	0.07
北美洲	25.0	73.0	5.5	23.4
南美洲	8.0	11.0	3.4	2.0
亚 洲	4.0	2.1	0.6	0.6
欧 洲	23.0	21.8	5.4	7.4
大洋洲	29.0	20.6	7.7	8.8
苏 联	18.1	20.5	5.6	3.0
最不发达的三个地区(居住着世界三分之二的人)	3.8	2.7	0.8	0.6
最发达的四个地区(居住着世界三分之一的人)	22.7	35.8	5.5	10.7

洲仅仅略强几分。另一方面，与高度发达的洲相比较，南美洲显然要比非洲相对好些，它在收音机、影院座位两个项目上实际还超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低标准。上表提供的情况我们可称之为接收网络，从表13我们则可了解发送(或称传播)网络的情况。

表13 1961年，世界各地的日报(种)、无线电发射机、长影片年摄制量、电视发射机的总数

	日 报	无线电发射机	电影长片	电 视 发射机
非 洲	220	400	43	25
北美洲	2200	5700	306	759
南美洲	750	1900	59	87
亚 洲	1270	1220	1618	258
欧 洲	2980	2820	1030	1406
大洋洲	110	250	1	19
苏 联	460	410	137	173
三个最不发达的地区(居住着世界三分之二的人)	2240	3520	1720	370
四个最发达的地区(居住着世界三分之一的人)	5750	9180	1474	2357

来源：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世界传播》(巴黎，1964年)的估算。

这张表格亦以其独特的方式区分出富国与穷国。占世界人口总数2/3的人民只占有全世界1/3日报总数(发行量还远不到1/3)、无线电发射机的1/4和电视发射机的20%。只是在影片摄制方面，三个不发达大陆与别的地区相比还差强人意，这主要归功于印度和日本高产的电影制片厂。

衡量全世界大众传播媒介供应量的另一个方法是看看供应增

长的速度如何。由于有了1950年的数字资料、我们可以衡量出传播媒介在12年间的增长率。表14就列出了报纸发行量、收音机和影院座位这种增长率的数字。(因为电视机出现很晚，在新近才有电视机的国家里，增长率并不说明什么。)表15是某些传播网络方面的比较数字。

表14 世界主要地区每百人占有报刊、收音机、影院座位的增长百分比(1950—1961)

	报纸份数	收音机	影院座位
非　洲	30%	229%	20%
北美洲	－13%	67%	
南美洲	33%	72%	3%
亚　洲	33%	100%	100%
欧　洲	－5%	133%	10%
大洋洲	－3%	1%	
苏　联	55%	230%	

来源：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世界传播》(1964年及以前各版)的估算。北美洲、大洋洲、苏联的影院座位数字得不到。

显然，收音机比报纸增长快得多，它在非洲的增长率非常显著。不过我们得记住，1950年时，非洲的收音机平均每100人还

表15 世界主要地区的日报和无线电发射机的增长百分比

(1950—1962)

	日报(种)	无线电发射机
非洲	20%	156%
北美洲	5%	58%
南美洲	25%	140%
亚洲	35%	180%
欧洲	25%	355%
大洋洲	10%	25%
苏联	16%	310%

来源：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世界传播》(1964年及以前各版)的估算。

不到一台。同样有趣的是，三个高度发达地区在最近12年中，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报纸发行量实际上下降了。

在表中，电台设备的增长率醒目地不同于其它项目，给人深刻印象。非洲、亚洲和南美洲每年都以平均30%甚至更高的速度发展它们的电台设备。1950年，亚洲仅有440部无线电发射机(包括日本的)，非洲只有140部。现在亚洲有1220部，非洲有400部。

这些图表告诉我们大众传播在全世界的分布情况，我们可以用下列方式来概括。

1.除了电影制造外，拉丁美洲在传播的各方面都比亚洲或非

洲稍稍发达些，广播和电视方面的情况显而易见，报纸的情况亦然：南美洲的人均销量是亚洲的2倍、非洲的6倍。虽然亚洲多产的电影厂产量超出南美洲，但南美洲的年人均观看次数比亚洲或非洲都多。

2.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收音机方面，世界不发达地区正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低标准靠拢，要不了多少年时间，亚洲、非洲的收音机增长率就将超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准，南美洲已经超过了这一标准。看来，这些不太发达的国家显然打算主要依靠广播来影响其散居的、多为文盲的人民。④

3.不发达地区的报纸发展较落后。这也许与扫盲及教育的发展有关，如果这两方面有了足够的发展，报纸发行量可望有更快的增长。

4.但是，所有这些差别比起世界上经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巨大根本差别，则相形见绌。在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就人均寿命、生产率、工业化、收入等项目进行的比较中，差别的次序相同。在这里，差异完全与前面一样引人注目。从各个方面看，亚非拉人民在大众传播领域里都是穷人。诚然，拉丁美洲在报纸和无线电方面还不错，但还赶不上非常发达的地区。此外，虽然它有广泛使用的共同语言，但在组织通讯社上还很落后。匮乏带的存在并非幻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说的"世界广大地区的设备缺乏阻碍了亿万人民有效地享受传播自由"，就是指的这件事情。⑤

发展中国家的媒介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大众传播上的差别并非都是数量的差别。

对于不发达国家的大众传播，人们首先注意的事情之一就是

传播媒介如此群集于城市之中。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各个地方都存在这种情况，高度发达的国家以及不发达的国家都倾向于把报纸、广播电台和影剧院建立在人口集中的地方。但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大部分人民住在城市，而在典型的不发达国家里，有80%的人民住在农村。因此，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媒介集中在城市中心的话，那么它们确实是集中为少数人服务。

这种情况在报纸方面非常突出，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在拥有2500万人口的泰国，所有的日报都在京城出版。在相邻的缅甸，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首都出版，仅有的一些地区报的发行量都微不足道。在象牙海岸，报纸销量几乎全集中在阿比让（象牙海岸首都——译注）和它的附近地方。加纳的四家日报，有三家在阿克拉（加纳首都——译注）出版。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37家日报，除了4家之外都在开罗或亚历山大出版。在不发达地区，只有拉丁美洲的省报和小城市报刊相对发展得好一点。

广播和电影也集中在城市，只是程度稍小些。当然，制片厂和发射台都在城市，但人们也许会希望看到，广播电台听众中很大一部分在农村（因为电台可以覆盖广大地域），同时电影观众的大部分也在农村（因为电影象广播一样，可以跨越文字藩篱）。然而举一个例子来看的话，实际上印度的每10个广播听众中只有一个多点儿住在农村，但农村却住着占印度人口4/5的农业人口。同样，大多数的电影观众也在城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传播媒介的各种标志一出了城市的边缘就几乎消失了。你可以在住宿的旅馆里阅读到晨报，看着年轻人拿着半导体收音机遛达过窗前，满目皆是横贯大街的电影放映广告；然后，当你驱车出城，到乡下去消磨时光时，你也许一整天都看不到一张报纸、一台收音机或一个影剧院。

怎么会这样呢？原因之一是困难很多。报纸得与缺少道路（再

加上雨季的破坏)、缺少邮政服务的状况进行斗争。广播和电影所面临的则是农村缺电，也缺少受过技术训练的收音机修理工和电影放映员。不止一个国家要扩大电台覆盖面的如意算盘落空，它们仅仅毁于没有人能给一切正常的接收机充电或更换电池。

识文断字这种事一出城市的边儿，也烟消云散。有文化的人同样集中在城市里，在农村，一个村子里有能力并有愿望阅读报纸的人超不过一、二个。要为这么稀少的读者服务，发行问题显然困难重重。

在自然经济状况下，在农村，很难弄到钱付给传播媒介。一个加利福尼亚的工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用他一小时劳动挣的钱买50份厚40页的报纸，共2000页。在印度尼西亚，一小时劳动挣的钱却只能买7份厚 4 页的报纸，共28页。⑥ 而在缅甸和马来西亚，如果一个村民要订阅杂志，得把他一年的现金收入投进很大一部分才办得到。同样，在农村，买一台收音机亦是一项极高的开支。如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 5 美元买一台收音机的长期奋斗目标能实现，那么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收音机的销售量就会有很大不同。

阻碍发行的另一个原因是语言问题。拉丁美洲的报刊之所以比亚洲、非洲发展得更快、更完善，主要原因也许是那里有西班牙语作为通用混合语言(巴西是用葡萄牙语)。传播媒介在非洲和亚洲所面临的某些语言问题十分奇特，印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4个邦各有各的语言；72种语言每种至少有10万人讲；全国广播系统几乎从不可能做全国性广播；每家方言报纸采用全国新闻电讯必须经过翻译；政府的农业和社会发展信息到每个邦或地区一级必须或者分散下去，或者翻译出来。不过印度在这方面并非独一无二。大多数亚洲国家都要对付好几种语言，非洲则名副其实是处于语言大杂烩中。例如，尼日利亚要用豪萨语、伊博语、约鲁巴语、

英语以及其它11种地方语言向它的人民广播。加纳则必须用阿肯语、豪萨语、达格巴尼语、加语、埃维语、英语和法语向全国人民广播。

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受众稀少。例如，在几内亚，全国仅有一家日报，发行量为600份。马里有三家日报，总发行量为3000份。既使在拥有4亿4千万人口和庞大城市的印度，最大的报纸的发行量也不过10万份出点头。

发行量太小又导致了财政困难。如果影剧院少，入场费又低，一个发展中国家就会感到制片太难。一些南亚国家的影剧院老板作了推算，影片如果要赢利，就必须在每一家影院连续放映六七个星期。发展中国家的报纸在财政上常常面临着残酷的现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讨论大众传播媒介发展问题的会议所提供的报告说，只有很少一部分报纸处于健康的财政状况。经营最好的报纸大都是这样一种情况："它们在创办时能够搞到信贷，多是由政府或外商给它们提供了第一次投资。"⑦ 在许多非洲国家，外国人所有的报刊(一般英语或法语出版)都资金雄厚、设备精良、兴旺发达。而归当地所有、用地方语言出版的报刊却在财政上拼命挣扎着。在印度，兴旺发达的大报大部分都是用英语出版的，而本地语言的报纸往往规模要小些，也不那么兴旺。

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可以用几千美元开办一份报纸，就象某些高度发达的国家在一个世纪前可能做到的那样。但是，在我们让自己为此而激动之前，应该先注意印度语报纸协会主席A·R·巴特的一篇卓越的分析报告，它的内容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里的小型报纸面临的财政问题。⑧

巴特先生说，用7500—15000美元在某个地方开办这样一份日报(就是说，用某种印度语言出版，预定发行目标为5000—10000份、在城市可以是10万份的报纸)是可能的，但那仅仅是解决问题

的开端。

在政府和私人的广告预算中，主要份额被有名气的英文报纸得到。剩下的广告费首先给了大城市及邦首府的印度语报纸，只有很小一部分残漏给为小城服务的印度语报纸。于是，小型报纸为努力生存下去，就收取较高的广告费，这使得它们的广告对购买者不那么有吸引力。

出了大城市，新闻纸的价格更贵。由于资金和外汇不足，小型报纸难以签订购买新闻纸的长期合同，这样一来，它们就可能在已经高于城市竞争对手所付价格的基础上，再付额外的费用。

对于一家小的日报而言，通讯社的费用相应更高，而如果是一家方言报纸，那么新闻电传的费用中还要再加上一笔翻译费。而若没有电传新闻，报纸就起不到它应起的作用，对订户的吸引力就要小一些。

此外，在某些国家里，顾客或订户甚至要考虑报纸的废纸价值，他们会从报纸价格中减去他们卖废报纸所得的钱。这也使小报纸的日子更不好过。它们得到的广告越少，印刷的页数愈少，作为日后的废纸对订户的价值也愈小。

巴特先生也估计，一家小型方言报纸要做到收支开始相抵，至少需要三年。在这段时间内，出版人必须准备亏损至少与他最初投资一样多的钱。同时，他会发现借贷也相当困难，因为商业银行一般不同意提供分期贷款或接受机器及其它固定财产做抵押。

但是，假定报纸能够摆脱困境，假定它如此之成功，三年后销量上升到10000份以上，那么对于一部平板滚筒印刷机来说，印刷的报纸就过多了，于是需要另一部印刷机。如果报纸想扩大，它面临的是一笔惊人的费用支出——一部轮转印刷机大约要花40000美元。

所以，一份报纸虽然可以廉价地开办，但维持它、扩大它却很

困难。

从费用问题的角度来看，电视传入了这么多发展中国家真是个奇迹。在对媒介的投资中，电视耗费是最昂贵的，而且它也许比其它任何一种媒介都需要更广泛多样的技能。与收音机相比，电视接收机价格高昂，修理花钱更多，难度也更大。一些新兴国家引进电视主要是想为其教育系统助一臂之力，还有一些国家显然只是因为电视的日益显赫而引进它。我们并非暗示，引进电视在经济上不可取，实际上，我们在后面将指出，在什么情况下引进电视既可节约钱，又可为加速发展尽力。但是，在许多地方，电视的引进与你所见到的各种缺乏情况形成了奇特的对照：缺乏机器，缺乏技术人员，缺乏胶片和新闻纸，缺乏训练有素的管理和编辑人员，以及缺乏学术研究。

尽管有种种不足，机器仍在转动，信息的传播川流不息。这一系统之所以运行得比预期可能的要好，原因之一是：那些普通、传统的传播渠道都被迫用来扩展新媒介的影响。并非每个国家都有一种象约鲁巴人的传话鼓那么引人注目的传播手段，可是，几乎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有给不识字的人读报的习惯——在咖啡馆、在乡村广场、在校舍里或任何其它的群众聚集处。许多世纪以来，象集市这一类的场所是人们互相交换信息的地方，现在，被大众传播媒介第一次用来当作传播信息的地方。而在大众传播媒介鞭长莫及的地方，木偶戏、说书人、诗人、民歌卖唱艺人以及戏剧团体也在传播同样的一些信息和见解。收音机旁，往往聚集着一群群的人在收听和讨论。在许多这样的国家里，领导人们都学会了巧妙地利用大型公众集会，确实，集会的人群也许比地方报纸的读者、或广播演讲的听众为数更加众多。因此，我们决不能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媒介是靠它们本身的力量立足。它们纳入了更大的国家传播系统之中，鼓、集市、聚会、还有民间歌手都在帮着传播信息。

当传播媒介刚刚出现、规模还很小的时候，它们也许相对更显眼些。有时，我们忽略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会有怎样的意义。仅仅在我们听到电影大篷车出现在村子里所激起的欢呼声时，我们才确实意识到：电影对于这些人民的意义不同于电影在高度发达的文化中的意义。大众传播媒介带着一种清新走进了世界上古老的村庄中，而在文化高度发达的世界里，早已感受不出这种清新了。电影打开了奇迹的口袋，收音机则正如郝登斯·波德梅克所说，在部落与现代世界之间架起了桥梁。[9]在学会阅读后，印刷品就不仅是许多乐趣的来源，而且也是理解现代世界许许多多问题的来源。此外，再用波德梅克小姐的话说，甚至"识字本身也不仅是学习怎样阅读，它还可以使人们去理解自己亲身经验以外的一种现实。"[10]因此，印刷品是一种自由的、革命的体验，它帮助个人从他的团体中、社会习惯中以及陈规旧俗中挣脱出来。[11]在较早得到发展的社会里，印刷媒介的主要功能实际上是向读者介绍一个新的、但只是停留在间接水平上的现实世界。读者是从出版物中接触到这些现实的，因而不会象在直观媒介上看到这些现实时那么大吃一惊。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是在见到出版物之前，先接触到广播和电视的，故而我们可以有理由认为，这两种媒介对这些国家将具有重要性和生动性，而对一个印刷媒介高度发达于直观媒介出现之前的国家，这两个特点就不存在。至于不发达国家的农村人以何种方式收听、收看这些新的媒介，我们虽只有一知半解，但毫无疑问，那些对媒介司空见惯的人所理解的媒介之意义，完全不同于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理解。这一点引起了对传播的一些误解，造成了一些失误。然而媒介的力量特别是对于变化中的、寻求指导和援助的人民的力量，是毋庸置疑的。例如说，在一个村子，第一个拥有收音机、或首先收到报纸的人无疑被媒介赋予了权力。第一台收音机是个奇

迹，第一部电影令人不可思议，报纸在它未普及时也充满迷人的魅力。所以，我们如果把媒介的规模与影响完全同等看待，那就完全错了。

然而，人们仍然担心发展中国家的媒介规模太小、覆盖面不足、农村地区尚未达标、还未完全充分地与人际间的组织及传播结合起来。正如我们所言，这种情况在某些地方，某种媒介比其它地方或其它媒介要多些。在亚洲，尽管一般人极少有机会看电影，但制片数目却非常之多。在拉丁美洲，报刊发展得不错，广播覆盖面也比亚洲或非洲更为宽广。可是，传播媒介仍然没有充分发展，与人际渠道还没有充分结合，还没有得到充分熟练、普遍的运用，从而使大众传播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问题是，在媒介达到足以在国家发展的其它组成部分中引起必要的连锁反应的"临界量"规模之前，我们怎样才能增加这一规模的数量呢？

辅助性服务事业

大众传播媒介增长的快慢部分取决于某些相关的社会因素增长的快慢。例如，印刷媒介就受识字人数的增长、能否得到新闻纸的限制。在一个国家里，在有电网的地方安装无线发射机和接收机、电影放映机、印刷机等，就容易得多。公共教育的普及极大地刺激着所有媒介的增长速度，而教育的缺乏亦可使之放慢。大众传播媒介象社会的其它部分一样，不可能比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其它社会发展项目过多地超前发展。因此，我们将把电气化、新闻纸、识字和公共教育，作为支撑大众传播媒介存在的材料、服务和技能的范例，并了解其增长速度。

电气化

表16所示的印度1951—1961年的情况也许可以说明电气化的进度。

表16 印度城镇、乡村电气化的规模，1951—1961年

地区人口数量范围	总数(1961年人口普查)	电气化的数量(三月)		
		1951	1956	1961
100000以上	73	49	73	73
50000—100000	111	88	111	111
20000— 50000	401	240	366	399
10000— 20000	856	260	350	[illegible]56
5000— 10000	3101	258	1200	1800
5000以下	556565	2792	5300	15861

资料来源：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第三个五年计划》(新德里，1960年)，第188页。

于是；人们可以看到，大一些的城市首先用上了电，然后电线朝着乡村一个一个地徐徐延伸。在1959—1961年间，印度的高压输电线哩数增加了一倍多，而电力却只达到了不足30%的印度农村！

正是在那些最需要电力来加速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地方，电却最少。农村和小镇比城市通电的可能性小，发展中地区的电力

比高度发达地区的要少。1961年，北美洲人均生产3744度电，欧洲、大洋洲、苏联约为此数的一半多。而南美洲的年人均发电量是364度，非洲为165度，亚洲(不包括日本)只有69度。[②] 如果非洲、亚洲打算迅速推广广播事业的话，上面那种情况就会使该地对用电池的晶体管收音机的需求非常惹人注目。

新闻纸

如果把目前世界新闻纸的供给量平均分配给全世界的人，每人每年有大约10磅。这已经够少了。新闻纸是报纸的物质材料。10磅新闻纸可以出3份大型的《纽约时报》星期日版，或可供小型报纸一周一份出一年，这后一种报纸在世界各地更典型。如果现有的新闻纸平分给全世界，那么每一个6口之家就可以有足够的纸来出版一份4页的日报。

但是，新闻纸的供应当然不是平均分配的。在北美洲，每个人每年平均可得到60磅新闻纸，而在非洲，每人平均只有2盎司，亚洲平均3盎司。所以，在亚洲、非洲，所达到的平均数比每人每年一张报多不了多少。当然，报纸并不是这样来分配：一个人得到一份日报或周报，其他许多人却什么报也得不到。可是，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在分配上的不平衡确实是惊人的。

全世界的新闻纸约85%是被最发达的三个地区所消耗，仅有15%被居住着世界大部分人口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所消耗。按人均消耗来计算，北美洲是非洲的46倍，是亚洲的31倍。

在1948年到1960年这期间，世界新闻纸的供应量翻了近一番，从750万吨到近1400万吨。在同一时期内，除新闻纸以外的纸产量几乎正好翻了一番。对发展中国家的一次抽样调查表明，在10年或12年中，这些国家中有许多地方的新闻纸用量都大大增长，如图17所示。增长速度并不令人沮丧，不过亚洲、非洲要接近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报纸发行最低限度，尚需要大大加快增长速度。亚

表17　12个发展中国家的新闻纸消耗量(1946—1950年和1961年)

	人均公斤		人均消耗量的增长
	1946—1950	1961	
巴　西	1.6	2.9	81%
缅　甸	0.1	0.6	500%
哥伦比亚	1.3	2.6	100%
萨尔瓦多	1.0	2.1	110%
加　纳	0.1	0.5	400%
危地马拉	0.6	0.9	50%
印　度	0.1	0.3	200%
印度尼西亚	0.1	0.2	100%
伊　朗	0.1	0.4	300%
尼日利亚	0.05	0.2	300%
泰　国	0.2	0.9	350%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0.7	1.9	171%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年鉴》，1962年。

洲、非洲的报人们在举行会议，探讨种种问题时，新闻纸问题总是会议的主要议题。

最近有一项研究实际表明了，除了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外，识字的推广很可能将导致对印刷纸的需求的巨大增长。这项报告⑬提出，在文盲率非常高的国家，识字的人数每增长1％，对印刷纸需求所带来的影响与人均收入增长5％带来的影响相同。然后，该报告根据这一理论推测了未来非洲、亚洲可能发生的情况。1955年，这两个洲的印刷、书写一共消耗了732000吨纸。假设每年人口平均增长率只有1.6％、人均收入增长率为2％，在这一条件下，如果从现在到1975年减少2/3的文盲，那么1975年的纸需求量将是4400000吨左右——大约是1955年的6倍！

识　字

据保守估计，全世界成人文盲有17亿之众，其中约90％住在我们称为匮乏带的地区。在97％的非洲国家、70％的亚洲国家里，识字的人不到一半。最需要大众传播媒介的地方，正是媒介发展的文化基础最低的地方。

在识字方面，没有世界范围的可比数字供我们象衡量新闻纸和电力的增长速度那样来衡量其增长速度。我们可以得到的数字表明，在整个发展中地区，识字的人在增多，文盲日趋减少。印度的情况也许可以说明增长的速度，在10年中尽管印度人口增长很快，但它的成年人扫盲率仍然从16％增至24％。⑭另一个人口增长迅速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声称，它的扫盲率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其人口增长速度。⑮非洲的一些新兴国家在扫盲工作中表现出很可敬的进步，不过其中许多国家起点很低。例如，利比亚独立时，上过五年学的人全国还不到5000，大学毕业生只有14个。⑯

总之，看来扫盲的增长速度稍稍超过了单靠学校教育本身所

应达到的程度，但超过不多。如果我们只能等待公立学校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识字问题，那么目前这一代成年人中的大部分将永不能享受印刷媒介，而实际上在下一代人的时间内，这些媒介的增长将是很慢的。

学校教育

公共教育既是向人民传播的主要渠道，也是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依靠。学校培养了有文化的人，学校向人们灌输了需要大众传播媒介的各种兴趣和需求。它们造就了各种专业技术人材，有助于提高收入；很大一部分受过教育的人用得起大众传播媒介。但是，象我们前面已考察过的其它各项内容一样，学校在全世界也不是平均分布的。

1950—1954年入学人数比率的中间值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88%；欧洲和苏联72%；北美洲和中美洲70%。但在南美洲只有51%，亚洲是44%，非洲为27%。[17] 在这几年里，不发达国家中入学的男、女儿童们，每4人中只有1人可以上到五年级。[18] 在1960年左右，美国每10万人中每年有1046个中学毕业生。在日本，这个数字是1002。而在伊拉克，每年每10万人中只有84个中学毕业生，巴西是32个，加纳是58个，海地是8个。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一部分是缺少广泛的公共教育的传统，一部分是缺乏教育设施；还有一部分是缺少教育经费。1958年，亚洲和非洲国家平均将其国民收入的约2.5%用于教育，拉丁美洲国家平均花费约2.1%。同期，欧洲国家用于教育的国民收入平均约3.2%，北美洲国家平均约4.3%，苏联约6.8%。[19] 当然，必须牢记，高度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比发展中国家的大得多。例如，1958年瑞典的教育开支占国民收入的3.1%，这意味着全国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平均都有约35美元；英国的4.1%相当于全国人均约41

美元；可是埃及的3.9%只相当于全国人均约5美元；巴拉圭的1.7%则人均总共不到2美元；印度的1.7%和尼日利亚的1.9%平均每个国民还不到1.5美元。

所以，不发达国家所在的地方正是我们看到的入学人数少、学校少、教育经费更少的那些地方。

尽管这里提供的数字不令人鼓舞，但近10年来，学校的数量及上学的人数还是有了很大的增长。当然，这种增长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非洲有17个国家的小学入学率的中间值比1934—1953年的中间值增长了一倍多，亚洲有11个国家增长了80%，拉丁美洲有10个国家增长了30%。表18提供了1953—1960年7年中，8个非洲国家入学受教育人数变化情况的数字。要想明白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挑出一个非洲国家来看看，下面是肯尼亚1951—1961年间教育增长的情况：

	1951	1960	1961
学校	2860	5024	5662
学生	260279	762892	830,191
师范学生	1156	4089	3897

但是，我们必须牢记，教育所产生的作用非常缓慢。直到下一代人进入到多产的成年期时，大众传播媒介才会感觉到目前教育发展的全部效果。

我们可以概括地总结一下。欠发达的国家拥有欠发达的大众传播系统，促进大众传播发展的各种服务事业也欠发达。这些国家

表18 非洲8国入学人数与总人口的比率及入学人数的增长率

(1953—1960年)

	入学人数与总人口的比率		1953—1960年入学人数的增长率	
	1953	1960	小学	中学
埃塞俄比亚	0.5%	0.9%	115%	208%
加纳	10.8%	13.5%	28%	69%
几内亚	1.1%	3.4%	310%	388%
象牙海岸	2.0%	7.7%	416%	293%
尼日利亚	3.7%	8.8%	166%	304%
塞内加尔	2.7%	4.2%	131%	119%
乌干达	5.7%	8.6%	85%	141%
上沃尔特	0.8%	1.7%	133%	175%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概览》。

的传播系统资金不足、设备不足，结果导致信息流量比可能的要少得多。但不管怎样，整个发展中地区无论是大众传播媒介还是媒介的各项辅助服务，其增长率都令人鼓舞。问题在于，增长速度是否足以满足急于发展的国家的需要。

评价这些增长率的最好方法也许是推算一下，两个欠发达大陆上的不发达国家，按其1950—1962年的平均增长率计算，将用多长时间才能达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低标准——每100人拥有10份日报、5台收音机、两个影院座位。我们已作了这一推算，用1962年的数字作基线，以那一时期的平均年增长率作为推测的角度，如果它们继续照此速度增长，那么结果如下：

——非洲在2035年、亚洲在1992年达到100人十份日报的标

准；

——非洲在1968年、亚洲在1970年达到每100人五台收音机的标准；

——非洲在2042年、亚洲在1981年达到每100人两个影院座位的标准。

这时间太长了吗？对非洲、亚洲而言，至少等待的时间肯定是长得过分。当然，在作此估计时，我们假定增长率不变，也许事实将证明不是如此。很有可能在扫盲、教育以及报纸发行的增长中，某一点上升得更快；或者由于电气化过程的某一环节发展的带动，电影院会增长更快。也有可能出现人口出生率的减少，那会使人均收入的数字情况好一些。对此我们可心存希望。不过预测的情况说明，收音机在未来10年非常重要，并要求人们在促进传播媒介及其辅助服务的增长上，作出更多的努力。很快，这些国家将不会再满足于这种状况，即按1950—1956年的发展速率，亚洲直到本世纪末、非洲则在70年以后才能达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日报发行最低标准；

注 释

1. 据出席1962年1月24日至2月6日在巴黎召开的非洲信息媒介发展会议的代表所作的报告。
2. 这个数字现在稍低些。引用的报告是1961年4月提出的。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展中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第16页，巴黎，1961年。
4. 另一个令人鼓舞的重要情况是，自1950年以来，不下20个非洲国家组建了国家新闻社。
5. 前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展中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
6. 据L·罗森布拉姆在《报纸印刷价格概览》中所做的估算，向印刷艺术研

究所提交的报告，剑桥，1959年。

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展中的非洲信息媒介》第9页，巴黎，1962年。

8. A·巴特：《多语种刊物的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发展中的亚洲大众传播媒介》第181—187页，巴黎，1960年。

9. H·波德梅克：《铜镇：变化中的非洲》第252页，纽约，1962年。

10. 同上，第228页。

11. D·赖斯曼曾指出，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兴起，是以"黑字对白纸的支配"为标志的。

12. 《联合国统计年鉴：1962年》，纽约。

13. 国际经济研究所：《报纸在发展和对外援助中的地位》，斯德哥尔摩，1963年。

14. 1961年印度人口普查。

15. 参阅《中国手册》第639页，北京，1950年；《人民手册》第605—606页，北京，1958年。

16. R·L·海尔勃罗纳：《大上升》第118页，纽约，1963年。

1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概览》，Ⅱ，第56页，巴黎，1958年。

18. 同上。

19. M·艾迪瑟西亚：《教育和发展》，引自世界紧张委员会编《动乱的国家》第149页。

第四章　大众传播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及辅助作用是什么？

社会变革怎样产生

收音机、报纸和电影院数量的增长并不一定给社会变革的发展速度带来相应的增长。只增加信息和渠道是不够的，例如，一些国家发现，仅仅增加一个对农村广播节目，还不足以使人们采纳新的行为。①不过，约旦的一个农村问题广播问答节目经实践证明效果不错。在农村专题节目里，把广播和小组讨论结合起来非常有助于变革的产生。②在识字训练中，普遍证明了广播并非十分有效，但在学校里它却非常有用。③从这类事例来看，显然，有些事情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做到，有些不能做到，有些可以做得比其它事情更好。此外，怎样使用大众传播媒介显然对发挥媒介的效果起很大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先来研究一些迹象，这些迹象表明，怎样才能有效地使用大众传播媒介，使之服务于国家的发展。

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育者。它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风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在这一类行为变革的背后，必定存在着观念、信仰、技术及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变化。

这种实质性变化怎样发生呢？也许，按照历史发展的正常过程，通过不断接触另外一种文化，导致了风俗和信仰的引入，这些实质性变化随之亦缓慢地到来。也许，它们由于某种力量而迅

速地发生(虽然可能不太长久)。例如:某个征服者或统治者把一些新的行为模式强加于世。今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寻求的变革不是这两种类型，而是期望比历史变化的标准节奏快一些，比强制变化过程所具有的暴力少一些。它的目的是一种自愿式的发展，许多人民将参与其中，消息灵通的人将可以帮助消息闭塞的人。在这种变革中，取代暴力的是倾向于劝说和提供机会；取代文化移入的正常节奏的，是大量增长的信息流。

这样一种变革的机制基本上是简单的。首先，平民百姓肯定会意识到目前的风俗、行为所不能满足的需要。接下来，他们肯定会创造或借用那些更接近于满足这种需要的行为。一个想要加快这一进程的国家——正如今天所有发展中国家所希望的那样——将试图使它的人民更广泛、更迅速地认识到这些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机会;将促进决策过程;并将帮助它的人民更平稳、更迅速地采纳新的习惯。

因此，从表面上看，变革过程是简单的，而实际上它远非如此。

文化联系

它之所以不简单的一个原因是,任何要被取代、或被引入的风俗习惯,都将与其它的风俗信仰紧紧相联。社会组织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其中任何一部分的变化都会被其它部分感觉到,而一个人行为的任何一方面发生的变化亦会反映到他行为的其它方面。因此，在我们考虑社会变革时，必须按照它将引起整个社会和整个人的变革这一思路来考虑。

举几个例子。正如马格丽特·米德意味深长地指出的那样,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健康是人与宇宙和谐的表示。④ 确实,在世界许多地方，人被看作是他的环境的延续，为了他能健康，他的环境

必须是健康的，而他的行为又将影响其整个环境的健康。所以，如果在健康行为上采取某种变革，也许甚至需要在宗教信仰上也来一个变革。象消灭虫害这样一件显而易见的简单事情，也许会招致全村人对一个村民的愤恨，因为他的这一行动违反了不许杀生的禁律。出门就医这样一件显见的例行之事亦要求一个人作出决断：放弃医疗或离开家乡，这两种选择哪一种更危险，哪一种对他更有奇效。截肢也许不仅需要学习更有效地运用残存的肢体，而且还要求变革那种认为截去的肢体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阿尔伯特·施威茨医生以前从其非洲经历中体验到，一个医生如果愿意治疗垂死的病人，就会导致人们对他失去信心。当地的医务人员拒绝拿他们的信誉在可能死亡的病人身上冒险。施威茨医生的行为不被认为是人道主义，却被看成缺乏能力。所以，许多当地人都避而不去他的医院，因为它被看作是一个"人们走向死亡"的地方。

雷蒙德·福斯迪克在总结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提高医疗标准工作上具有世界意义的经验时说，公共健康从而已经成为"社会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变革常常是从农业开始。这一领域内的文化联系格外牢固。用一位研究埃及农业改造的重要学者的话来说，埃及人的农业"是一种深深根植于几百年传统之中的高度一体化的生活方式。它包括个人感情表达方式、家庭关系、宗教情感、社会交际以及牢固树立的行为习惯。"⑥正如米德所说，对于自己这个农业专家来说，"人类在宗教仪式、魔法及其它宗教行为上花费的大量时间和能量，似乎是浪费掉了……但是对于本地人来说，他们在自己这些事情中赋予自身信念，把自己从常常伴随耕种者劳动的忧虑中解脱出来……在许多传统的文化中，农业是生活的全部形式，而不是谋生的手段……宗教和农业是相互联系的两个

部分。"[6] 实际上，这意味着任何可取的农业革新都必须不仅仅考虑它所预期的生产率，还要考虑它对耕种者生活的其它方面、对信仰及价值观念等将产生什么影响，如果有的话，也许会导致他抵制革新。

非常传统的文化中往往存在着对变革的抵制，工业化国家的感受常常为理解这类抵制提供一些根据。其例之一是西方对"超员雇佣"(即超过工作需要的人员雇佣，是一种在亚洲尤为普遍的现象)的不耐烦。当然，在此风俗的背后是一种家庭关系的古老神圣性。一个雇主有责任把工作给予他的亲戚，而且一般来说他也不会解雇他们(即使他们不称职)，就象他不会把做错事的儿子从家里赶出一样。企业的权威结构往往追随着家族血统关系，如果要强迫推行一种更正统的结构，那么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可能都不知道在工头与工人的关系中怎样行事。

把工业改变为西方体制的模式会产生什么后果，来自工业化国家的顾问们对此表达了他们的困惑，这就是当那些"把诚实当作家法的人在工业化体制中以不诚实的方式行事时，他们认识不到这作为一个整体现象存在是正常的。"[7] 这并不是说工业不应当现代化，只是说这种变革所包含的内容远比修改体制的项目要多得多。

另一方面，如果一种变革的进行是利用了文化联系，而不是撕裂它，那么结果也许会是好的，而且意义深远。当第一辆四轮车被送到帕帕哥印第安人手中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就是一个例子。[8] 这辆运货车几乎马上就在满足这一地区的长期要求中起了重要作用，它被用来运送长期短缺的水。人们发现，妇女们制作的陶罐在这货车上很容易碰碎，不久就换成了木桶，后来又换上了金属桶，这可以把妇女们解脱出来去干其它有用的活儿。不久，一个男人学会了通过加热、锤炼来锻造铁具的技巧，于是他能够给马上

铁掌，并修理运货马车的金属部件。为了四季都能用马车向村里运水，有必要修一条路。这就使某些工程技术以及一种团体劳动的新形式得到发展。在一些道路可以启用后，人们就用运货马车来搞贸易旅行。通过出售砍伐的木头、多余的谷物和麦子，这个村社出现了现金交换的贸易形式。由于运货马车作为村社里的公共财产使用，导致村政府内有了更广泛的协作。如此看来，一件简单的新事物，带领了一个村庄朝着现代化道路发展的方向走去。

因此，文化联系的实际重要意义是，为了预测到继发的影响和抵制、为了在可能之处利用各种关系、为了平缓地过渡，社会变革的任何一项内容都必须在非常广泛的基础上加以考虑。要能够做到这一点，有必要透彻地了解文化，理解人们打算进行的变革只是生活所有形式的一部分。确切的问题是：这样一场变革对于被要求接受变革的人民将意味着什么？

团体关系

社会变革复杂的另一个原因是，必须要考虑团体关系这一因素。必须变化的是人，而这些人是生活在团体之中的，在团体中嬉戏劳作，在团体中获得许多自己最珍视的体验。他们最坚定持有的信仰和价值观是团体的准则，并共同坚持，共同保持。对一个人来说，要转而反对一个强大的团体准则太困难了，因为在那种状况下，要么是整个团体必须变革，要么是他个人必须另就新团体。

实际上这意味着，如果社会变革不与团体准则相左的话，它就会容易得多。但是，在几乎所有的传统社会里，许多团体准则都有碍于现代化。这一类的准则有：那些宣传宿命及人类无法与自然抗衡的宗教信仰、那种无论对健康和庄稼多么有害也不许杀生的戒律、视重体力劳动为卑贱的信条、以及为婚嫁不惜债台高筑的习

俗。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想避免与团体准则的某些对抗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如何正视它们。

怎样劝说人们去做一些从来不可接受的事情？库尔特·利文在40年代初期就作了一些挑战性试验。譬如，在肉类短缺时，他试图劝说家庭主妇们用以前大家都不喜欢的那些部位的肉来做菜。他发现，对她们演讲、让她们阅读文章，相对来说收效甚微。但当他为主妇们提供一个机会进行讨论后，差不多所有参加讨论的人都决定试着做一些新花样的肉类菜肴。有了自己同一阶层的人作社会支持，大部分妇女实际上都采用了不熟悉的、新部位的肉来做菜，这就是说，知道了人人都做这件事，它就被证明是一种社会准则。[9] 还有一些学者对其它事情也做过类似的试验。例如，对于改变一个行业的管理人员的行为方式这一问题，利维恩和巴特勒比较了演讲和讨论的两种效果，结论几乎正是利文所得到的那些。没有机会就某一个问题进行讨论、并使讨论的人差不多都答应改变，在实际中就不会产生多少变化。[10] 这就是农村广播论坛的原理——召集一群农民，通过广播把问题告诉他们，然后找一个机会让听众们讨论它，并决定对这问题应采取什么行动。[11]

在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行为中，最基本的不是讨论。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成立的广播俱乐部曾组织过大量讨论，但没过多久，俱乐部会员们就因讨论过多而渐渐厌烦此道。讨论是重要的，但最根本的东西是参与决策和行动。无论在什么地方，一个广播论坛只要是成功的，讨论(在所有可能组织讨论的地方)就是行动的先锋官。正是鉴于这一认识，加拿大农场论坛推出这样的口号："收听、讨论、行动！"

因此可以说，在涉及到团体准则的地方，参与决策可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手段来促进社会变革，减少它所引起的震动。在忽略了这一方法的地方，变革计划要冒极大的风险。例如，在30年代

和40年代，有一项众所周知的计划，即抢救因过度放牧而渐至侵蚀光的那伐鹤人(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译注)的牧场土地。为了抢救牧场，那伐鹤人的畜群规模要强制减少，特别减少绵羊和山羊的数目。10万余只山羊、20万余只绵羊以极低的报酬被赶走。减少畜群的计划成功了，牧场土地侵蚀最终也得以控制。但是，这件事却在政府与那伐鹤人之间引起了棘手的麻烦，援助这一部落的其它各种努力也因此而瘫痪。⑫

在执行这一计划的方法上，主要有两点做错了。第一，这件事是政府强加于人的，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又不做任何努力来引导那伐鹤人来参与实施细则的设计。第二，设计减少畜群方案的人根本不知道，牲畜(特别是绵羊)对那伐鹤人一直意味着什么。这个部落的全部经济都建立在绵羊增长的基础上，人们以羊肉为主食，出售羊毛和羊羔，并用羊毛编织地毯、毡子使用和出售。所以，夺走绵羊对于那伐鹤人本来就朝不保夕的生活方式又造成一个威胁。如果有一个缓慢、小心的开端，引导那伐鹤人自己参与这个计划，也许在完成目标时就不会招致这么多敌意。然而对牲畜的直接进攻被人们认为是对自己的进攻，这就是持续20多年的对政府的怨艾之根源，也是政府寻求努力帮助那伐鹤人的每一个计划都受阻滞的罪魁，亦是政府每项提议都深遭猜疑的祸首。事实上，正如斯派塞所言，对那伐鹤人来说，"减少牲畜"已成为一种象征，它给人带来不愉快的、反政府的种种联想，就象"长征"——就是那伐鹤人在1863年被迫象囚犯一样进行的充满仇恨、永志不忘的那次长途跋涉一样。⑬

那伐鹤计划的错误，错在没能获得人民的理解合作。这个词是杜伯提出的。在描述印度的一项工程时，他提到"这个呆板的计划表……有关当局把注意力都放在完成物质指标上，大小官员们……感兴趣的是设法完成工作"，结果是，人民在某种程度上参加

了劳动竞赛，但对这些竞赛的目的却不甚了了。所以人民普遍感觉到，他们只是被迫的。他评论道："传播是一个双向过程，它既包括信息、指示的给予，也包括信息、指示的接受。尽管在将村社发展计划的作用限定为传播和改革的动因时，这一事实得到了承认，但在实践中这些计划却倾向于担当给予者的角色，村民们大部分都处在接受一端。"⑭

在社会改革的决策过程中引入理解参与，是使一项有效计划能够充分考虑到团体关系的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是，充分利用期望改革的社会所原有的传播和影响的渠道。不言而喻，变革动因是始于领导开始工作的。杜伯讲述了在一个印度村庄里，农业工人是怎样犯了同选举产生的政务官员们一起工作的错误。这些官员们虽然态度很热情，但对农业实践却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就象检查员们后来所发现的那样，农业领导者是与政务官员们完全不同的人。⑮ 在这个村子里，领导分为许多层次，各有各的特殊作用。在这种文化中要想高效率地工作，就必须理解并利用这些特点。

此外，许多种类的社会变革显然对旧的社会关系及权威地位形成威胁。比如说，当年轻人进工厂或搬到城市里去时，氏族家庭就受到了威胁。年轻的、受过教育的人一般对保守的领导人难以忍受。各种专业技术和货币经济给人们提供了选择职业的可能，因此也提供给他们前所未有的一定程度的自决权。结果是，新的权力集中，新的领导人以及新的劳动团体向旧的领导者、旧的关系模式发起了挑战。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一定程度的骚动。

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如果你的目标是在现有文化中加速社会变革，并减少变革引起的震动，那么正如你必须理解文化联系一样，你也必须理解社会关系。

技能的现代化

使社会变革复杂化的另一件事情是，在许多情况下，变革要求人们学习新技巧。当正常情况下需要几百年时间的发展被压缩到几十年中完成时，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已经在向技术化社会迈进时(如今发展中国家正是这样)，要及时教授各种技术往往很困难。假如明天在非洲或亚洲的某个村子里建起一座小工厂，熟练工人也不可能手到擒来就让它运转起来。当无线电在村庄里开始普及时，当地却找不到技术员来修理它们，如果坏了一个电子管或电容器，那它们只好永远在宁静沉默中睡大觉。

因此，任何向现化代方向努力的社会变革都需要制定一个教授必要技能的计划。这其中有许多是基本的技能，举例来说，在相当一部分人口能阅读、计算之前，一个社会的现代化是不会深入发展的。还有一些其它技能非常专门化，如：修理收音机和农场机械、机床操纵、簿记、测量、医术及制药，在刚刚开始发展时，这类技能几乎总是短缺。要平缓地进行社会变革，重要任务之一便是使专门技术与整个技术的发展步调一致，这样，就不会出现技术等待工人或熟练工人等待机器和工作的现象。

大众传播媒介的意义

在社会变革中怎样高效使用大众快播媒介，刚才我们所说的概括了两点。

第一，在准备建立大众传播媒介的地方，如果不具备关于当地文化的适当知识就使用它们，那么它们显然要冒着低效、事实上是阻碍生产的危险。对于任何传播，无论是大众传播或人际传播都是如此，但它特别适用于大众传播媒介，因为它们覆盖着

更为广大的地区，而且是从远处操纵，从其受众得到的反馈较少。一个负责乡村事务的工作人员在向耕种者谈论循等高线耕犁法时，可以马上判断出对方是否听懂了他的话；同样是负责乡村事务的工作人员，当他通过广播向几百个村庄(大部分他都从未到过)讲话时，他就无法得知自己的听众是否理解了他的话，当然他也不能及时意识到怎样修改自己的广播讲话。所以，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高效率地使用大众传播媒介就意味着它们应该尽可能的地方化。它们的计划起源应该接近其受众的需要；这些计划应该让了解自己将要与之对话的有文化的那些人来制订；同时，受众也应该能够得到可向媒介提供反馈报告的各种手段(最后这一点，我们将在"研究"一章中更多论述)。

在发展中国家，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失败了，皆因其发起人错误判断或错误理解了当地的情况。例如，一个南美国家曾大范围地努力引进一种新玉米，它在各方面都比老品种好。新玉米更耐寒，更有食品价值，产量更高等等。而且这种玉米很有希望改进人及牲畜的饮食、健康状况。整个计划只有一个缺陷，这种玉米(因为它如此耐寒抗病)硬得难以用手工磨碎，村民们又不愿把玉米运到城里的磨坊去。然而，这种玉米被证明可以制造很好的商业酒精，结果这场运动没有改进饮食，却促进了酒精中毒。[16] 在非洲、亚洲也有类似情况，那里的妇女们拒绝使用新装在家里的自来水洗衣服，因为那样会使她们失去在小河边洗衣时会晤朋友的机会。[17] 在印度，有一个村子回绝了安装一种便宜、少烟的新式炉子的机会，尽管没有这种炉子，人们得在家里的地板上做饭。那样做饭，整个家中很快就烟雾弥漫，渐渐透过茅屋顶。人们因此而眼睛刺痛，上呼吸道感染。但是，烟雾弥漫的屋子有一个好处是号召安炉子的人所不了解的：烟雾可以控制寄生于房顶中的白蚁。没有烟雾，白蚁很快就会吃光茅屋顶，人们又得花上一大笔钱来重

修房顶。[18] 这些都是对运动后果无先见之明的例子，这一场场运动皆败于缺乏当地知识。

在构成地区变革之最基础部分的决策过程中，地方化甚至可以说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变革进行中，最珍贵的一个部分是地方性榜样或范例。当阿塔图克在土耳其生活中大范围地进行其变革时，他常常尽可能多地访问村庄。当他打算禁止土耳其式圆筒无边帽时，他就戴着有檐儿的帽子去访问村庄。[19] 玛格丽特·米德指出，在中国，大众教育计划是由居住在农村的知识分子执行落实的，他们了解人民的需要，并知道怎样与之交谈。[20] 许多出生于城市的农业代理商，只是在他脱去鞋子，跳入稻田时，才能胜利完成他的使命。对那些害怕变革和试验的传统型村民们，只有用示范才能使其信服，而使人信服的示范只能来自地方知识。一个建立在概念化而非地方知识基础上的示范，将会产生出比眼下树立的影响更为深远的消极影响，就象在缅甸的一次教农民深耕稻田的示范，结果却毁了保存稻田水分的硬土壤层一样。[21]

后面这些例子提出了有效使用大众传播媒介的第二层含义：有一些传播任务是大众传播媒介可以高效完成的，而另外一些任务它们只能起协助完成的作用。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报道某人脱掉鞋子、跳入稻田，如果有电视或电影，它们还可以把事情发生的过程表现出来。如果有电视，阿塔图克就能向更多的观众展示他的有檐儿帽子，而不用走那么多旅程；但是，若仅靠广播或印刷出一个公告或倡议，就很难取得领导人把土耳其帽换成西式帽这种亲自示范的效果。没有任何一种媒介可以接任地区决策团体的任务，然而媒介可以为讨论提供材料，例如，就象它们在农村电台论坛中广播最初谈话时所作的那样。理解这条界限——媒介在何处可以独自高效率地工作，在何处它们完成任务只是为了支援人际传播——怎样划分，这是发展中国家在能够最大程度享受到现代化

传播的好处之前，为了自己所必须学习的首要事情之一。

如果宣布，发展中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效力受到诸多限制，这并不会是一个令人泄气的报道。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传播的任务如此之多；这其中明确处在大众传播权力范围内的如此之多；以至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只要把它的大众传播媒介用来担当它们可以完成得最好的那些任务，传播体系就会是拥挤不堪了。所以，问题不是给媒介找事儿干，而是应该区别出媒介应派哪种用途。

在国家发展的社会变革中，传播的任务有三种。首先，平民百姓必须得到关于国家发展的信息；他们的注意力必须被集中在变革的需要、引起变革的机会、以及变革的方法和手段上；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必须唤起他们对自己、对祖国的事业的抱负。第二，在决策过程中，必须让人们有机会明智地参与其中：对话必须扩大到把所有决定变革的人都包括进来；领导人必须有机会指挥，普通人的意见必须有机会被人听取；变革的问题必须讲清楚，变革的选择方案必须进行讨论；信息必须既能流向又能流出统治集团。第三，必须教授所需的技能：必须教会成人阅读，孩子必须受到教育，农场主必须学会现代耕种的方法，教师、医生、工程师必须受到训练，工人必须掌握专门技术，普通人必须学习更多的如何强健自身的方法。如果这三组传播任务符合我们前面谈到的传播之三种基本功能——看守人、决策者及教授者，这并不令人意外。这些正是传播在社会（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中的基本任务。唯一不同的是，当一个社会正处于急剧的社会 经济变革的骚动中时，所有的需要都被强化了。

在这些任务中，哪一项大众传播媒介可以独自完成？哪一项只能由它们帮助完成？就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所知而言，可以这样说：

第一组任务——看守人，告知功能——是大众传播媒介完全

可以直接完成的。事实上，没有媒介，就不可能按照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任何类似时间表来完成这些任务。

第二组任务——决策功能——的大部分工作，大众传播媒介只能起帮助完成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完成这组任务需要团体决策；要求变革根深蒂固的观念、信仰和社会准则；因此，人际传播的途径是关键性的问题。不用说，大众传播媒介可以通过为讨论提供信息、通过传播领导人讲话、通过把发生的事情搞清楚，对此提供很大的帮助，但这些只不过仅仅起到了一种辅助作用。

第三组任务——教育功能——有一部分可以直接完成，有一部分则要通过与人际传播者相互结合起来完成。例如，如果在教师的指导下，在课堂上把大众传播媒介作为整个教育过程的一部分来使用，媒介也许能被充分利用于教育之中；但是在没有学校和老师、或师资缺少训练的地方，媒介就能暂代其职。同样的道理，拿收音机（试举最常见的例子）来说，在教授一项新的农业技术时，它要想完成一个熟练的示范表演人员所做的工作就太难了。但是，一旦人们学会了这项技术后，收音机在提供进一步的信息、解答问题、报道结果等等方面，就会大有帮助。

这也许使区别显得更加明确。因此，让我们进一步仔细看看，在三大传播任务中，媒介的作用、辅助作用到底是什么。

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

媒介的看守人作用

生活在大众传播媒介非常普及的社会里的人，有时会忘记他们通过媒介学到了多少东西。印刷书籍作为公共教育的得力助手已有300年之久。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报纸，它们就成为人们赖

觉所及之外的环境的主要报道者。事实上，世世代代的人们主要是用他们从报纸上(近代以来还从收音机、电影、电视及新闻杂志中)学来的东西组成了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概念。每一个看过电影或小说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些媒介给自己留下了多少持久的记忆。镜头、角色、情节、台词，在首次读过或看过之后的许多年里，它们仍然是那么生动、鲜明和清楚，成为一个人可以信手拈来的智慧的一个组成部分。父母们都注意到孩子是怎样从电视里学会了广告歌曲、短语、词汇及习惯，孩子们无需努力，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学。对此，父母们有点不以为然。换言之，我们所有关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经验都说明，向它们学习是多么容易，无论你情愿还是不情愿。[22]

由于媒介有这种高效率报道和传达的能力，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说，媒介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某些基础性的服务。

大众传播媒介可以使人开阔眼界　传统社会的许多人们在第一次接触到大众传播媒介时，都能恰当地看出媒介具有的魔力。一个非洲的智者对作者说，它们有魔力，因为"它们可以把一个人带到比我们视野所及范围更高的山上，让他极目远眺"。它们有魔力，因为"它们可以使人看到、听到他从未到的地方的事情，认识他从未见过的人们"。即使是在魔光消散后，它们仍可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去理解其他人民怎样生活，从而用新的洞察力来审视自己的生活。媒介是一股解放的力量，因为它们能打破距离和孤立的藩篱，把人们从传统社会传送到"伟大社会"中。在那里，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未来和远方——正如普尔估计的那样，"在那里，每一个商行都必须预期到未知顾客们的需求，每一个政治家都必须预期到未知选民的需要；在那里，对于将产生巨大变化的未来已拟定了规划；在那里，一个人也许每天都受到处于迥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的行为的影响"。[23]

这一点之所以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是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有助于发挥移情作用这一特点。对此，丹尼尔·勒纳的著作比任何人论述的都好，他认为移情作用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民所必有的根本的、基础的品质。他说，这是因为：

> 它能使近来迁徙频繁的人们在一个变化着的世界中高效率地行动。简单地说，移情是一种站在别人的地位上来看自己的能力。对摆脱传统环境的人们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技巧。例如，如果这些最近迁徙频繁的人是农村人，他们成长于自己的环境中，认识身边所有的各类人，了解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对他们而言，移情能力也许会产生出天壤之别。在出了自己的村庄或部落后，每个人必然遇到新面孔，结识各类新人物，并学习各种与自己相联的新关系。极大的移情能力仅仅是在具有工业化、都市化、文化普及以及民众参与诸特点的现代社会里，才算是一种占优势的人格。传统社会是非参与性的——它按血缘关系把人们分为彼此隔绝、互不往来的一个个社会；因为没有城乡分工，它在经济上没有互求依赖的需要；由于缺乏互相依赖的各种结合关系，人们的视野就局限于本地，他们的各种决策只涉及熟悉的人和熟悉的环境。因此，这类社会不需要这样一种民族"意识"，这一意识能使互不相识的人们通过比较各自的观点而形成"共论"。
>
> 但是，现代社会是民众参与的，因为它是在共论之上运行的——人们在对公共事务做出个人决定时，必须经常与其他不相识的人有充分的统一，以保证一个稳定的共同管理。这一社会组织的历史成就(我们称之为参与社会)有这样一些标志：大多数人民都受过教育，读报纸；在工作中取得现金收入，并可依法自由调动；在开放的市场上用现金购买货物；

在选举中(实际上是在对竞选人的抉择中)投票；以及就许多非个人事务的事情发表意见。就这种参与方式来说，尤其重要的是，绝大部分人民被期待对公共事务"抱有见解"——而这部分人民的必然期待是，他们的意见将产生作用。[34]

因此，通过把人们看来遥远的事物变得近一些、把人们看来是陌生的事物变得可以理解，媒介可以有助于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架设桥梁。

大众传播媒介可以集中人们的注意力　在现代社会里，我们关于远方外界的概念大部分来自于大众传播媒介。当传统社会向现代化发展时，它也是始于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依赖。结果是，在何者重要、何者危险、何者有趣等一系列问题上，必然有很大一部分意见是来自于媒介。报纸、广播、杂志象山坡上的守望者一样工作着，它们必须决定向人们报道些什么内容。这种选择的行为——选择报道何人，选择拍摄何物，选择引用何人言论，选择记载何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民的所知、所论。

让我们举例来说，在媒介十分普及的国家里，一个政治竞选人除非让人民通过媒介来逐渐充分认识自己外，否则很少有机会获胜。在对政治竞选进行深入研究的地方得出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媒介并不能直接改变大部分选民的投票决定，但是对于在竞选期间谈论什么事情及什么人物，媒介能起很大作用。[35]通过把公众注意力集中到某些主题而非其他主题上，媒介可以使这些主题在竞选中起更重要的作用。在许多广告竞争中，人们也是打算把注意力吸引到一个牌子或一个产品上，特别是在竞争的产品除商标名字外差别细微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广告证明了媒介在把公众注意力保持在此商标而非彼商标上，所具有的能力。[36]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因为这意味

着可以把公众的注意力保持在发展问题上。有时，兴趣可以被引导到一个新的习惯、一种新的行为、或一种新的农作方法上、引导到实行现代化所能得到的报酬或某些需要变革的事物上。通过把注意力引向这一类特定的题目或事物，传播媒介还可以控制某些人际传播的题目。如果可能的话，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本应亲赴全国每一个小小的社团之中，向这些团体的成员提出一个发展问题，或者一种想法、一种可能，以进行思考、讨论。他们不可能亲自走遍许多农村或许多社团，但却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广泛地灌输各种想法和题目。

大众传播媒介可以提高人们的期望　广告的历史、函购商品目录的成功、以及那些小家庭为了达到自己见过的别人享受的那种生活水平、或为了得到一件他们只是听说过、只是见过照片的商品而拼命工作的事实，都促使我们相信，大众传播媒介不仅在发展中文化的背景下，而且在高度发达文化的背景下都可能提高受众的期望。

果真如此的话，这对发展中国家可是非常重要的事。它们面临着将人民从宿命论、从对变革的恐惧中唤醒的需要。它们需要既鼓励个人抱负，亦鼓励民族抱负。每个人都应当渴望过更好的生活，并愿意为此奋斗。做为公民，他们应当渴望民族的强大和伟大。

麦克莱兰和勒纳都认为，媒介可以提高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期望。[27] 勒纳写道，当开罗电台的声音传入一个偏远村庄时，"在个人追求上发生的现象几乎应有尽有"。拉奥也描述了当村民们可以说是"偶然听到"大众传播后，他们的希望是怎样被提高的。在他所研究的印度村庄里，人们被激起各种新愿望，其中之一就是希望拥有一件人们在画片上见过的一种特殊式样的衬衫。这些村子里的裁缝匠和剃头师傅要常常光顾附近的电影院，使自己能够模

仿在那儿看来的新式样，因为村里的人会带着他们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到店里来，比照着银幕上的样子做一身新式衣服，或理一个式样特别的发型。[28] 从拥有一件衬衫的追求到希望民族伟大繁荣的追求，也许相距甚远，但是，大部分新兴国家都认为，它们的电台和报刊的首要用途之一就是树立起民族追求。举其例之一，苏联的大众传播媒介有数十年都充满了国家发展及工业化的新闻，因而在苏联各阶层人民中造成了这样一种感觉，好象自己属于一个正朝着更强大的经济、更美好的生活迈进的强大民族。

当然，提高一个民族的期望并非不冒风险。勒纳说，当埃及政府在农村建立起广播后，村子里除了人们的期望以外，什么也没真正改变。他接下来说：

> 这是一种典型状况，在过去10年中，这一状况产生了不断出现挫折的循环。在某种意义上，大众传播媒介被用来刺激人民……提高了人民对世界上好东西及更美好生活的期望。然而，在提高成就的水平方面却没有作充分准备。于是；人们被鼓动得想要比自己所能得到的更多的东西，期望迅速超过了成就，然后挫败蔓延开来。[29]

因此，当一个政府试图提高本国人民的期望时，它必须考虑在满足这些期望上能做到多少。如果胃口被吊起来了，又得不到满足，那么作最好的估计，也是下一次人们将不会这么快就上钩了。作最坏的估计，政府也许得应付一个难堪的局势。一项明智稳妥的政策应该使人们被激起来的欲望与他们可能获得的实惠尽量互相符合。但是，有一点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如果不提高人们的期望，不刺激人们为更好的生活、为民族的进步而奋斗，那么发展永远不可能出现。

所以说，大众传播媒介能够为发展创造一种气候。我们可以

这样总结，大众传播媒介在向发展中国家人民提供可用信息的种类和数量方面，所作的贡献价值重大。它们可以开阔人们的视野，因此帮助人们建立起移情的能力；它们可以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发展的问题和目标上来；它们能提高个人及民族的期望；所有这些工作它们大部分都能靠自身的力量直接完成。这就等于是创造了一个刺激发展的信息"气候"。通过展示经济高度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设备和生活、通过传播外界发展的消息、通过刊登本国及世界其它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报道，媒介可以创造一个理智的气候，鼓励人民以另一种眼光来审视自己目前的实践和未来的前途。[30]

决策过程中的媒介

在改变固执的观念或受重视的习俗上，大众传播媒介仅仅能间接地起帮助作用。在向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社会习俗发起进攻时，大众传播媒介从来没有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这些观念习俗之所以根深蒂固，原因之一就是长期以来它们被认为是有益的。而且，在整个社会里它们一般已得到家庭或对个人至关重要的其它集体的赞成；反对这些观念就意味着一个人反对一个集体，而这一集体的成员是他所尊重的。作为个人他感到自己处于这些观念习俗的包围之中；改变它们会给自己带来苦恼，会使自己与习惯了的生活和伙伴疏远。因此，这类状况得到强有力的维护。

有关研究表明，人的灵魂几乎可以竭尽全力来抵制对其坚定信念的攻击，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出，信念被坚决维护到何种程度。人们选择那些支持自己固有信仰的新闻、广播或文章，抵制或抛弃那些不支持的。[31] 如果他们真是接触到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与他们的坚定信仰相悖的信息，他们常常就会错解或歪曲这一信息。

虽然他们并不是蓄意歪曲；然而他们的信仰结构起到了维护自己的作用。有些实例研究表明，所有失败的运动皆因自己的意图被本来指望他们的观念得以改变的那些对象错解了。例如，在一次非常有名的运动中，人们用一部名叫"比哥特先生"的连环漫画来倾泻对种族歧视的嘲笑。但是，有偏见的人却把这些漫画解释为支持种族偏见的观点。[28] 结果，这些人的偏见更甚于从前。

社会对于观念的直接控制多是通过团体关系——通过个人钦佩或尊敬的人、或通过一个人属于或渴望属于的团体——来施加。为何如此并不难理解。对任何一个人而言，他最有价值的经历大部分是在各种团体里获得的——家庭小团体、工作团体、好朋友的娱乐圈儿、教堂、俱乐部、政治上志同道合的小集体、欣赏一种共同文化的社团，等等。一个人从每一个团体中学习扮演某个角色，遵循某些准则。对角色和准则的理解认识使个人在团体中生活得自在愉快。作为团体之一员，他不用经常检点自己做些什么才合适，他还能理解并预见其他成员将要做什么。因此，无论是在家庭团体中的婚姻生活和儿童抚养，是在劳动团体中的工作，或者是在宗教团体中的礼拜，团体的作用能以最大的满意和最小的阻碍来发挥。故每一团体都想维护它的准则和角色。

现在假设一个团体的一名成员停止遵循其准则。例如，假设家族中的一个孩子决定退学，或者教堂里的一个教友改变了他对上帝的信仰，或者政治团体中的某个成员意识到自己反对该党的主要原则，那么，团体将会施加所有压力来试图引导他迷途知返。如果这些压力不奏效——这个成员也不太可能改造该团体——通常的结果是他不得不离开这个团体，然而很少有人想离开自己所尊重的团体。

当一个人一旦因为信仰观念的原因决定脱离某个团体时，他一般会参加与其新的信仰更一致的另一个团体。如果他脱离了A

党，就有可能在B党找到同志等等。对个人来说，几乎总是会受到这些影响。一个新的有影响的人物要进入个人生活，一个有吸引力的、准则多少不尽相同的新团体要进入他的经历中。否则，就是他目前所在的团体必须自己决定改变其准则或习惯。[33]

所以，对于很多这类的决策，人际传播和影响的渠道远比大众传播媒介更有效。大众传播媒介可以起帮助作用，但只是间接的。以下将提出某些使传播媒介可以进入决策过程的间接方式。

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向人际渠道馈送信息　有影响力的人们，其建议和观点在社会人际决策过程中显得十分重要，他们都是典型地大量使用大众传播媒介的人。[34] 例如，在某一地区农民中最有影响的那些人，在农业问题方面所读的报纸、听的广播往往比一般人要多。如果某人在政治问题上的提议受人重视，一般来说他就是非同寻常地高度利用了政治媒介。某位年轻女士在什么电影值得一看方面若被奉为权威的话，一般说她在电影方面读的书刊要比常人要多得多，她本人看的电影也比别人多。实际上，在发挥影响时，从媒介所获得的信息虽然不是唯一的、充足的理由，但肯定是起作用的一个因素。

这对发展中国家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人际影响的渠道提供信息是可能的。如果大众传播媒介传播了农业信息，那么就极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些信息将被农业"权威"们获得，并重复给别人。当传播关于照管小孩的信息时，那些提出如何照管孩子的建议常被别人采纳的妇女很可能会得到这些信息，并向别人重复它们，如此等等。

我们还必须补充：其它方面要相同。如果有影响力的发言人无法接近媒介，比方说，假如他们不识字，也没有收音机，那么他们就不可能从大众传播媒介获得信息。如果他们所持态度与大众传播所表达或暗示的内容截然相反，他们就很可能会抵制或歪曲

大众传播媒介传达的信息。但是，如果他们基本上不反对大众传播所表达的信息，如果他们乐于接近媒介，那么，媒介如果不为人际渠道提供信息就没什么道理了。

在某些情况中，大众传播是进行点对点传播的最有效的方法。例如，如何接近、通知社区或推广工作者，并使其跟上时代的发展还是个问题。某些发展中国家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工作者从事农业、卫生事业及社区的发展。典型的情况是，这些人非常分散。对于他们，常常没有时间进行充分训练，但他们仍需要信息和帮助。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这些推广工作者跟上时代并得到提高，使用收音机(有时还有电影和出版物)就很有用了。有时候可以同时向这些工作者和公众传播，这就是播放广播、放映电影、或出版些印刷材料。那些推广工作人员可以居高临下，把这些印刷材料读给村民们听，然后他可以帮助村民来理解并运用这些材料。在对教师进行帮助和提高的工作中，也使用了同样的手法。

应该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大众传播媒介可以把领导通常使用的某些人际传播渠道接收过来。温斯顿·丘吉尔在1939—1945年战争中所发表的广播演说，就是使个人领导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产生最有效影响的例子。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也学会了有效地使用广播。

大众传播媒介可以授人以地位　当然，被一家很有声望的报纸或电台认可或称赞，有助于建立起个人的声誉。事实上，一个人仅仅被媒介提到就有助于提高他的地位。[35]拉扎斯菲尔和默顿对于媒介能授人以地位这一令人颇感困惑的能力作了如下描述："大众传播媒介通过证明个人和团体的权力来赋予他们声誉，提高他们的权威。能受到报界，或者广播、杂志、新闻纪录片的重视，就表明某人功成名就；表明某人之重要足以使他鹤立鸡群于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中；表明某人的言行之重要足以要求公众的注

意”。⑱

在一个媒介相对稀少、新闻名流较少的发展中国家里，媒介的这一权力甚至比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里还大，并有可能提供一条途径来树立领导。

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国家政治领导人早就发现了大众传播媒介这种授人以地位的权力，但是地方领导者常常需要增强地位。我们不仅是指选举出的领导人们，也包括那些社区发展工作人员、农业顾问、以及其他对村民们有顾问或指导身份的人。他们的声音出现在广播里，他们的照片或讲话出现在报刊上，这对于提高他们在农村的声望和知名度真的能起作用。同样，这也有助于为某些人或某些值得仿效的行为提供地位和名声。在这方面，苏联和东欧的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宣传劳动英雄人物、生产率记录、先进集体及其他发展运动的模范典型，也许工作的最出色。无疑，整个国家发展运动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不断宣传，也可以得到一席地位。这将吸引人民参与发展，而正是他们的参与又进一步为发展运动赋予地位，如此这般，螺旋上升，正如我们在前描述的那样。

大众传播媒介可以扩大政策对话的范围　在乡村，关心当地政策事务的人们彼此相邻，只要他们愿意，而且风俗也允许的话，他们完全可以面对面地谈论这些事务。到目前为止，在那些传统的乡村里，通常仅此而已，因为村民们对更高一层次的政策一般不感兴趣，而更高层次的人也无意与村民们分享自己的政策。但是，当一个国家开始其发展事业时，它就亟需扩大政治讨论和决策的范围。平民百姓们需要闻或听取关于国家政策的辩论，以便形成自己的意见，在适当时亦可按他们的意见行动。决策者们需要比以前更清楚地理解农村人的需要、愿望，这样他们在制订更宏大的政策时，就可以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国无大小，若想不靠大众

传播媒介来完成这些事情，几乎将是办不到的。[37]

随着国家的发展，大众传播媒介开始报道新闻、地方问题及地方领导人的讲话。地方报刊和电台越发展，新闻报道就越好。这些报道都被国家其它地方的受众及国家决策者们阅读和收听了。与此同时，媒介也报道全国新闻、国家的种种问题以及领导人就应采取何种政策所进行的演讲和辩论。于是，政策讨论的范围就扩展开来，直到它覆盖整个国家。当这种情况实现了，发展期间国民参与的条件就建立起来了，全民的移情意识得到了鼓励，一个国家的发展所必需的各项条件的成熟就近在咫尺了。

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强化社会规范　马林诺斯基注意到，在特罗布里恩群岛上，对于违背社会规范的行为，不到它们被公开宣布出来是不会采取有组织的社会行动的。在先进的文明社会里亦会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许多社会规范对个人来说很不方便或纯系累赘，所以这些规范执行的面很宽，许多人都懂得阳奉阴违之道。只要这种阴违之道保持私下性，就不会采取什么社会行为来惩罚背离规范的行为。但是，一旦它被公开揭露出来，那么人们就被迫采取公开的支持或反对规范的立场，于是，团体往往采取行动来解决背离的问题。正如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所言："公开性缩小了'个人看法'与'公共道德'之间的差距。"[38]

在现代社会里，承担公开揭示的任务大部分被赋予大众传播媒介。它们的任务就是向人们公开那些对规范的严重背离。如果这些社会规范还不普遍为人所知，就象在发展中社会里它们未必被人所知那样，那么媒介的部分任务就是宣传规范。

如此看来，通过媒介在公众头脑中树立起发展行为的规范，并控制对这些规范的背离是有可能的。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授人以地位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正如某些发展中国家授予地位给它们最好的农民和工人一样，它们也这样毫不含糊地谴责懒惰、无

效和腐败。一旦这些违背社会规范的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整个社会都会惩罚它们，并告诫人们远离这种行为。

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帮助人们培养趣味　在一定的范围内，人们学会喜欢他们的所见所闻，音乐和美术领域里尤其如此。在一些高度发达的国度里，流行歌曲和舞蹈的成功主要仰仗于它们被大众传播媒介介绍，使人耳熟能详。历史上不断出现这样的事例：新曲或新画由于不被人熟知而遭拒绝，尽管后来它们成为伟大的"古典作品"。大众传播媒介的特殊的力量就在于加快这一熟悉的过程，因此在培养趣味上它们可以施加影响。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点所具有的意义远非是"大肆宣传"流行歌曲或介绍新画派这类事。文化是人民之间最好的桥梁之一。如果A地的人民喜欢B地的人民的音乐、舞蹈或绘画艺术，那么他们就有喜欢B地人民的预先倾向了。如果A地和B地的人民互相喜欢对方的艺术，他们就预先倾向于感觉到他们之间的结合力，并预先倾向于更好地互相理解。发展中国家可以运用这一有力的手段建立起民族感，许多国家都非常急需这种民族感。如果确实存在一种"民族的"艺术或音乐舞蹈，它就可以被强调为号召全国人民的集合点。无论一种民族艺术存在与否，这个国家各地的民间艺术都可以用来使这些民族在心理上互相更接近。苏联宣传其国境内各族人民的民间舞蹈和音乐正是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影响人们轻率地持有的观念，对于固执的态度则可潜移默化之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在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上，大众传播本身并不很有效。但是完全有可能通过大众传播，对并不固执的立场、对那些既无时间亦无信息来建立起固执态度的新问题施加某些影响。在众多例子中仅择其一，有一个著名的玩笑，一家电台描述了火星对地球的入侵，这在几个国家引起了恐慌。这个玩笑非常逼真，它主要是以新闻广播的形式

出现，就象人们惯常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新闻一样。那些惊恐的人们相信广播是真实的，被吓得想不出办法去核实这条新闻的真实性，找不到法子保卫自己，抵抗新的、生疏的星际战争的危险。因此，他们向山上跑去——直到发现这只是个玩笑(在一个国家，人们在此之后转回家来，并烧了广播电台!)。[3]这是一个说明大众传播媒介在鲜为人知、牢固观念和行为模式尚未建立起来的地区能大显奇效的例子。假设发展中国家不想把自己的人民吓得神经错乱，那么同样的原则可适用于其它的效果：运用大众传播媒介，在新战场上比在老战场上更容易取胜。

大众传播媒介也可用来使现已存在的观念略有改变或轻微的转向。例如，正如广告商所发现，一旦人们断定牙刷是件好东西，那么说服他们相信这一种或那一种牙刷是好东西，就相对容易了。如果人们确信学习和阅读是好事，那么说服他们想去上学或听广播、或做其它能学习阅读的事，就容易多了。如果把农业或卫生方面的一种新方法介绍为仅仅是古老光荣传统的一个例证，它便有可能被人们接受；如果能把它说成仅仅是古老光荣传统的一个细微变动，那它就更有希望被人们接受。通过这些方式，大众传播至少可以直接用来改变人们的观念——如果在所谈论的问题上不存在顽固观点和行为模式，或者如果把改变表现为仅仅是旧的顽固观点的延伸或转向。[4]

显而易见，大众传播媒介在伴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策中有很大用处。它们的用处不在于正面攻击根深蒂固的观念或长期受尊重的习俗。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属于个人影响和团体规范的范围内。如果要对受到坚决捍卫的习俗和信仰进行变革，往往需要人际传播，并且一般要包括团体的变革。因此，在这类重大决策中，大众传播媒介只能间接帮忙。它们能够向人际传播渠道馈送

信息；它们能够授人以地位并强化规范；它们能够扩大政策对话；它们可以帮助培养情趣。在未形成牢固观念的地方，或者在变革仅仅是要求对现有观念稍加引导的地方，它们可以直接产生效果。但是，在改变牢固信仰和行为方面，它们多半只能起帮助作用。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教授者

卡西莱在为《世界广播手册》准备的一篇有说服力的文章中，对信息能为发展中国家人民做的部分工作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首先，它能使个人在整个国家及全世界的相互关联的环境中来观察自己。它创造了一种使新技术方法的采用及新观念的接受成为可能的气候。它使公民能够在国家中起到自己的作用。然而，如果个人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去掌握新技能和新知识，那么这种"通过信息而达到的认识"必定是不充分的。④

这就是我们前面曾提到的技能障碍。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仅仅知道需要变革或已下决心变革是不够的。在变革大规模出现以前，必须在民众中普及新技能。这就要求有全国性的教育和培训计划。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是：

大众传播媒介对各类教育和培训可以有极大帮助 它们在学校内外的许多不同条件下为自己做出了证明。它们证明了自己补充和充实学校工作的能力。在缺少教师和学校的地方，它们证明自己能够担负大量的教学工作。它们证明对成人教育和扫盲训练是极大的帮助。而且，它们对工业和技术人员的培训以及教师的在职培训，也有很大的帮助。

这些事实很重要，因为如我们所知，教师和学校很缺乏，而现有教师中的许多人所受的培训只适于昨天而非今天的教学工作。技术技能非常短缺。全世界有7000万不识字的成年人。在发

展中地区，到处都非常需要学习新的农业技术和方法。

对于媒介充当教师的潜能已不再有任何怀疑了。当然，教科书早已证明了它们能做些什么。许多国家已证明，广播和电影在成人教育及教室里可以起辅助作用。现在已有关于这些新手段的证据。例如，在393个实验班中，将主要靠电视教学与靠传统课堂方法教学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在全部对照的例子中，有65%（从学生们在期末考试中所能完成的内容上看）无区别；有21%的电视班写出的考卷大大优于传统班；只有4%是传统班较占优势。[②]来自程序化教学法的早期报告同样令人鼓舞。几乎在全部例子中，程序化都对班级的实力增长起了作用。学生们能够学得更快，而且在某些特殊的训练形式中（例如，计算机操作和电子学），程序化能够减轻教师在教授细节和操作方面的大量负担。[③]这些研究结果主要是来自经济发达国家，但有关教学传播媒介的研究现在也开始来自发展中国家，而且首批结果非常令人振奋，以下一节我们将提到其中的一部分。

在教育界，到处都大量谈论"新教育媒介"。为了阐明这些是什么，让我们把（作为教学手段的）媒介分为四代，即：

第一代媒介——海图、地图、图表、书写材料、展览、模型、黑板、示范、戏剧剧本等等。其中许多同教学本身一样古老，并且全部远远早于大众传播。这一代教育媒介区别于其它几代的地方是，它不需要机械或电子设备。不用说，所有这些媒介虽然并不总是供给充足，但在发展中国家却是可以得到的。

第二代媒介——印刷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和测验。靠机器（印刷机）把这些引进传播过程，以便能迅速、廉价地复制人工书写和绘图。300余年来，这些第二代媒介广泛应用于教育。现在，较新式的印刷方法，诸如照相制版和胶印，使它们更便于为工业不发达国家所应用。这些媒介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熟知，并且在其中

大多数国家得到了生产。然而，供应和质量方面还有不少缺陷。

第三代媒介——照片、幻灯片、电影胶片、无声动画片、录音带、电影、广播和电视。这一代媒介靠把机器引进传播过程，以供人类进行观看和收听，或者说进行观看或收听。这些媒介最老的有100多年了，最新的约35年，其技术为发展中国家所熟知。几乎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电影和广播，某些发展中国家也有电视。放映机和教学影片在许多国家处于缺乏状况；广播在教育中的应用大大低于它的能力，工业电视仅仅在少数发展中国家越过了实验阶段。应当指出，象通讯卫星这类引人注目的新型"教育媒介"，只不过是扩大第三代媒介的手段。

第四代媒介——程序化教学、语言实验室、电子数字计算机在个别指导过程和快速信息检索中应用。这一代媒介非常之新，每一种都要靠人机传播。程序化教学使个别指导过程"自动化"，现已开始在发展中国家试用。语言试验室使学生能够按照专家的榜样来练习语言技巧，也刚刚开始进入应用。明确地为教育目的而应用计算机，至今大多数还只是在工业化国家。

哪一些媒介是"新的"，多少取决于你在什么地方回答这个问题。高度发达国家的新的教育媒介是电视、程序化教学和语言实验室，计算机的教学应用也开始步入舞台。在发展中国家，就绝大多数情况而言，"新的教育媒介"是刚超过第二代媒介之后的那些主要项目，甚至连第二代的印刷材料也短缺。

但是，不管定义是什么，新的媒介代表了发展中国家按照要求的速度和质量来提供教育的巨大希望。

我们谈到过，在教育和培训中，媒介能提供帮助，因此我们将它们在这些领域内所能起的作用与它们在传递信息中所能起的作用相互区别开。换言之，我们说媒介能够独立担当看守者、报道者的工作，但只能帮助教授者。这是因为教育和培训所要求的

远远超出了信息传送。它们要求有目的的发展，学习技能，系统积累知识，准备付诸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有人际联系的因素——和学生们一起工作的教师；帮助一个社区决定它将把哪些新技术和新习俗引进生活的讨论小组；或者至少有一个能协调学习、在学生需要时能为之提供帮助的辅导员——时，这一任务完成的最好。在中学的理工班级中，一个老师配上一堂电视课或电影，可能比单打一更有效。识字训练证明，对于收听广播的学生来说，有一个辅导员或教师十分必要。在工业培训中，电影能够大大加快学习进度，但一般说它不能完成整个工作。在社区成人教育中，讨论小组和实地工作人员对广播产生实效做出了很大贡献。在这个过程的某些点上，需要双向传播——需要某人提供指导、施加影响、回答问题、进行讨论。因此，大众传播媒介与人际指导的互相结合——媒介上的专家指导和一位教师的双向互相作用——影响特别大。

当然，这意味着，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辅导员、技术指导和实地工作人员在进行合作。如果当没有他们、或者他们不能教授某些课题的时候，媒介便能够承担、也确实承担了更大的职责。我们不知道，在渴求教育但又缺乏教师、辅导员和实地工作人员的发展中状况里，媒介所能起的作用有多大限度。但我们知道，没有教师或辅导员在场，要从媒介中学习阅读和书写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也知道，讨论有助于社区成人教育，因为如卡西莱所说，一个人"只把他一贯尊重的人们所赞成的东西吸收进自己的生活中"。⑥但是，有数不清的人自己通过书本阅读了法律，学会了计算。人们通过函授学会了工程、电子学、无线电修理等技能。在芝加哥，某一初级大学的全部课程都是由电视讲授的，许多学生的学习相当成功，他们除了考试或交作业和提问题外，与学校没有其它接触。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环境下，媒介很有可能能

够承担起比经济较发达的国家所要求的更多的教学工作量。[26]现在，我们需要在发展中地区进行更多的实地试验，以弄清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它们。

然而，我们至少知道这一点：对于各种形式的教学、成人教育和技术培训，大众传播媒介能有极大的帮助；在缺乏教师、培训人员、辅导员的地方，媒介能够承担起相当大的教学量；而且，一旦学会了基本技能，媒介就能提供进一步学习的机会。例如，一旦把基本步骤引进现代农业，广播和报刊便能源源不断地提供有关实际耕作的有用信息。一旦一个人学会了电子学的基本技能和知识，他便能通过阅读学会更多的东西。一旦一个人掌握了学习方法，他便感到较易在没有监督或直接帮助的条件下学习。

注　释

1. 例见S·C·杜伯：《印度变化中的村庄：社会发展中的人类因素》第114—115页，伦敦，1958年。
2. 参阅W·施拉姆和G·温菲尔德：《大众传播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用途》，向应用科学技术为欠发达地区谋利益的联合国大会提交的报告，日内瓦，1963年；J·马瑟和P·纽拉斯：《印度农场广播专题节目的一项经验》，巴黎，1959年。
3. 例见胡姆赛和拉塔芒卡拉：《论运用广播学校作为教学手段的成果》，曼谷，1960年。
4. M·米德编《文化模式和技术的演变》，纽约，1955年。这次听证会上的许多实例引自该书。
5. 默罕墨德·沙拉比：《埃及乡村的重建》第7页，开罗，1950年。
6. 前引米德编《文化模式和技术的演变》第188页。
7. 同上，第246页。另参阅H·D·冯：《中国工业组织》，天津，1937年。
8. W·布利斯：《面包车进入南亚利桑那巴巴哥印第安人中》，E·H·斯派塞编《技术变化中的人类问题》，纽约，1952年。

9. K·卢因，《团体决策和社会变化》，T·纽科姆和E·哈特莱编《社会心理学选读》第330—344页，纽约，1947年。
10. J·莱文和J·巴特勒，《变化行为中的团体决策讲座》，《实用心理学杂志》，36(1952年)，第29—33页。
11. 前引马瑟和纽拉斯《印度农场广播专题节目的一项经验》。
12. E·H·斯派塞，《牧羊人和技术员》，前引斯派塞编《技术演变中的人类问题》第185—208页。
13. 同上，第203页。
14. 前引杜伯《印度变化中的村庄》第128页。
15. S·C·杜伯，《乡村社区发展中传播学的一些问题》，《经济发展和文化变化》，(1957年)，第129—146页。
16. G·M·福斯特，《传统文化和技术变化的影响》第85页，纽约，1962年。
17. 同上，第96页。
18. 同上，第81页。
19. 前引米德《文化模式和技术的变化》第260页。阿塔吐克也采纳了这一论点，土耳其帽其实并不发源于土耳其，而是从其它文化中借用来的。
20. 同上，第258页。
21. 同上，第186页。
22. 有关论据参阅D·韦普尔斯、B·贝雷尔森和F·布雷德肖，《哪些读物合人意》，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0年。另参阅C·J·霍夫兰，《大众传播媒介的效果》，G·林塞编《社会心理学手册》，波士顿，1954年；W·施拉姆，《程序化教育研究书目简介》，华盛顿，1964年。关于从广播新闻中记下了多少，参阅T·W·哈勒尔、D·布朗和W·施拉姆，《广播新闻收听中的记忆》，《实用心理学杂志》，33(1949年)，第265—274页。关于从娱乐电影中学习，参阅P·W·霍洛德依和G·D·斯托达德，《从电影中汲取思想》，纽约1933年。关于从大众传播媒介中记牢论点，参阅D·韦普尔斯和B·贝雷尔森，《公众传播和公众舆论》，报道见R·D·利，《公众传播的概念结构》，纽约，1954年。
23. I·D·普尔，"现代化进程中的大众传播媒介和政治"，前引L·派伊编《传

播和政治发展》第249页。当然，"大社会"是G·华莱斯的用语。

24. D·勒纳：《传统社会的消逝》，第49—51页，伊利诺斯州格伦科，1958年。

25. 参阅前引普尔《现代化进程中的大众传播媒介和政治》第250页。详情参阅P·拉扎斯菲尔德、B·贝雷尔森和H·高德特：《人民的选择》，纽约，1948年；以及B·贝雷尔森、P·拉扎斯菲尔德和W·麦克菲：《投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4年。

26. 参阅D·卢卡斯和S·布里特：《广告心理学与研究》，纽约，1950年。

27. 前引麦克莱兰《正在取得成功的社会》和勒纳《传统社会的消逝》。

28. 前引拉奥《信息在经济和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第58页及以后。

29. 前引勒纳《传统社会的消逝》第344—345页。

30. 其中某些用语是经允许从H·卡西莱博士的私人通信中借用来的。

31. 参阅L·费斯廷格：《内心冲突理论》，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另参阅前引拉扎斯菲尔德、贝雷森和高德特《人民的选择》及贝雷森、拉扎斯菲尔德和麦克菲《投票》。

32. 参阅E·库珀和M·杰荷达：《宣传的入侵：有偏见的人怎样回答反偏见宣传》，《心理学杂志》，引(1954年)，第434—436页；P·L·肯德尔和K·M·沃尔夫：《传播学研究中有关反常事例的分析》，P·F·拉扎斯菲尔德和F·E·斯坦顿编《传统学研究：1948—1949》第152—179页，纽约，1949年。

33. H·H·凯利：《成员特征和对团体依赖观变化的抵制》，《人类关系》，8(1955年)，第275—289页。

34. 对权势人物的最全面的论述见E·卡茨和P·F·拉扎斯菲尔德：《个人的影响》，伊利诺斯州格伦科，1955年。在卡茨的《传播流量的两个等级》(《舆论季刊》21(1957年)第61—78页)一文中有晚近的文献概览。

35. 许多政治家说过，如果他能经常制造出现在新闻栏目里的新闻，他宁愿放弃报纸编辑的承认。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曾经这样表白自己的一位政治家，他四次当选美国总统，尽管他遭到大多数报纸编辑的反对。

36. P·F·拉扎斯菲尔德和R·K·默顿：《大众传播、民众志趣和有组织的社会行为》，W·施拉姆《大众传播》第498页，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

1960年。他们对我们所引用的作出了补充："这种交换功能状态的运行，可以在'名人'对一件产品作鉴定的广告模式中，得到最生动的证明。在民众的大圈子里(但不在特定的有选择的社会阶层内)，这种鉴定不仅加强了产品的威信，而且反映了作鉴定的人的威望。它们向公众宣告，强大的商业世界认为此人拥有足够高的地位，他的意见受到许多人的重视。简言之，他的鉴定就是对他本人地位的鉴定。理想但不做作的循环威信模式，见之于卡尔弗特勋爵为'名人'所作的一系列广告中。商业公司和称赞产品的商业化了的证人加入相互满足的、无止境的行列。其实，名人称颂的是借厂商向自己的知名度道贺的名酒，他的名气大得愿被人用来鉴定产品的名气。这种相互赞赏的社会运转大概不合逻辑，但却有效。大众传播媒介的听众看来赞成这种兜圈子的信条：'如果你果真是个人物，你就会是大众注意的焦点；如果你是大众注意的焦点，那你肯定应当真是个人物'"。

37. 关于在一个国家中大众传播媒介对话的实例，参阅S·J·克劳斯：《大辩论》，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62年。

38. 前引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大众传播、民众志趣和有组织的社会行为》第499页。

39. 参阅H·坎特里尔：《来自火星的入侵》，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0年。

40. 关于大众传播媒介"引导"效果的讨论，参阅J·T·克拉珀：《大众传播的效果》，伊利诺斯州格伦科，1960年；以及前引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大众传播媒介、民众志趣和有组织的社会行为》。

41. H·R·卡西莱：《广播和电视有益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和教育》，为《世界广播手册》准备的打印稿，1963年。

42. 例见W·施拉姆：《我们对从教育电视上学习了解些什么》，传播研究所《教育电视，下一个十年》第52—76页，斯坦福，1962年。

43. 关于截至1963年1月左右对程序化教育研究的总结，参阅W·施拉姆《程序化教育研究注释书目》，华盛顿，1964年。

44. 更为详细的分类请参阅W·施拉姆：《美国新近教育媒介》，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教育中的新方法和新技术》第5—17页，巴黎，1963年。

45. 前引卡西莱《广播和电视有益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和教育》。

46. H·R·卡西莱认为："在严重缺少学校设施的情况下，广播……可以'在空中'开办陆地上缺少的学校网"。

第五章　伟大运动中的大众传播媒介

系 统 的 概 念

实际上，第五章要说的是，大众传播媒介对某些发展任务可以有比对其他任务更为直接的帮助。每个想通过大众传播帮助实现社会变革的人都应该了解他所试图改造的文化。但是，在利用媒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经验最多的国家里，人们经常谈论的不是"媒介"而是"运动"或"系统"。

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发展的伟大斗争是持续不断的，结果常常不是来自单个信息或单个媒介的影响，而是产生于相关信息或互补渠道的一系列影响。使社会的某一部分现代化的运动几乎都要既利用媒介又利用面对面的传播。只要一有可能，这些运动就会使用一条以上通向受传者的大众传播媒介渠道。随着运动的继续，信息的性质将随之改变并需要不同的渠道或渠道组合。比如，在某一运动的初期，某种媒介，如广播，在使人们了解需要和机会方面也许非常有效；但在运动后期，为了帮助人们就某一拟议中的变革作出决定，重点也许就转移到面对面的示范或讨论上了。于是，发展运动的计划者们发现自己在考虑传播系统而不是媒介。什么样的信息和渠道组合，以何种次序排列对实现所需要的变革帮助最大？这是计划者们面临的问题。

法国国立农业研究所的雷内·杜蒙教授在研究了法属非洲的农业需要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向该地区农村人口传播信息的首要

渠道不是媒介或实地工作人员，而是公立学校。而且这种公立学校不是现有的严重阻障农业发展的那种，而是一种迥然不同的新型公立学校。杜蒙教授接着写道：

> 诚然，非洲的学校，特别是由于种姓特权的原因，现在被认为是文化的来源，但是，这些学校更被看成是通向政府和行政部门"天堂"的一种途径。许多非洲人来到法国后吃惊地发现，白人也具有农民和工人的社会地位，他们自己也在叉草和耕地。这些非洲人一直习惯于想象所有的白人都同殖民行政官员一模一样，就是说，不干侍候人的工作。他们认为教育应该使他们自己也免受体力劳动的耻辱。①

因此，他建议建立一种新型的教育机构，作为向一种真正的非洲教育制度的过渡，一种面向不能上传统学校的、10—14岁农村男童的农村小学校。这些小学生当中没有几个能有机会上中学、当学者或进入政府部门。相反，他们将成为非洲亟需的那种农民——那种目光远大、不以劳动为耻、而且愿意采纳技术人员和指导人员意见的现代耕种者。办这种学校比较便宜。校舍和教师宿舍由村民和学生们自己建，作为对孩子们进行教育的一种练习。他说："象学习法语——非洲的一门外语——这样的昂贵需要就可以免了"。学生们将半天劳动，半天上课。课程将是基本的，实用的。他说："这种农村学校很快就会成为村子里真正的农业发展中心。"②

他认为，在这种新型的学制初见成效之后，非洲国家就可以有效地利用农业实地服务、农业广播、农业新闻公报以及其他传播渠道。但是，这些渠道要在学校的变革引起了人们对体力劳动的态度的根本转变实现之后才会真正有效。

我们没有必要确定杜蒙教授是否提出了正确的解决办法，或

是否低估了大众传播媒介的能力。关键在于，他得出解决办法的方法不是问："我们应该怎样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或学校、或实地工作人员、或农村讨论小组）？"而是问："如何才能实现所需的变革？"

这里是系统思维必须开始的地方。计划者必须对文化有足够的了解，才能懂得如何实现特定的变革：通过信息和说服教育能做到什么？通过什么样的信息和说服教育？什么必须通过分配资源或提供机会——不是象征性地——来做？然后计划者要规划事情的次序。当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互相促进，当受众需要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时，就得运用它们。就计划的信息部分而言，在运动的某些特定阶段需要将信息传给某些人们，因此，必须找到将信息传给他们的最佳渠道。为了某一目的，应尽可能使用一条以上的渠道，以保证信息达到。如有可能，应用一个信息去加强其他的信息。所以，面对如何才能实现某一预期变革这一问题，发展运动的计划者们不得不动用整个传播系统，努力通过最佳组合和次序充分发掘传播系统的所有潜力。

在一个典型的发展运动中，受众通常是从较快的媒介那里最先了解到某一问题或某一事件。接着而来的是对问题和事件所作的较详细的介绍、所发表的意见、所阐述的各种立场、所提供的更多的信息，所有这些都来自在需要它们时最适合于提供这些服务的任何渠道。这是符合需要的次序的：首先需要初步了解，然后需要更多的详细情况，这样，决策的条件就变得明确了；其次需要正反两方面的争论以形成意见；然后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来支持已形成的意见；最后需要将共论和决策表达出来。

对高度发达国家的革新进行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一过程中的第一步，通常是同提供关于某一有潜在效益的新方法的信息（同时也指出现行方法的不足之处）[3] 的大众传播媒介建立联系。这时，

未来的革新者还是这一过程中较为被动的参加者，而媒介则是积极的参加者。但是，如果信息引起了革新者的兴趣，那么，他们就会积极起来。他们总是要问他们尊重的人或通过其他媒介核实已经得到的信息。他们通常要了解关于这种方法的更多的信息。他们想知道其他人的看法和打算。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想看看这种方法的实际应用。所以，这时搞一个示范将是有益的。如果需要作出集体决定，开个会或举办一次专题讨论是很有帮助的。如果革新者决定试行新方法，那么，他们就需要确实很详细的信息和指导。为此，他可以去找某个专家，去请教一位经验较丰富的农民，参考一份“怎么做”的招贴画或杂志，或者查阅一本技术手册等等。我的意思是，对这些不同种类的信息的需要有先有后，不同的目的需要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目标。

所以，如果发展中国家想要在其伟大发展运动中充分利用其设施，在运动的初期就得有人用广角镜来看这一问题——这就是说，要超出广播、推广服务、学校、报纸、或电影的单一角度。必须有人研究对变革的需要，研究变革发生的可能过程和现有资源，然后再设计能最有效地实现所需变革的信息、渠道和事件系统。

四个运动领域

农 业

一个设想广泛的发展运动的例子之一是印度的“集约农业区计划”，或曰“一揽子计划”。这项活动的对象是该国各地若干个区——每个邦选出一个区——的数百万耕种者，活动是印度政府在福特基金会的财政和技术援助下举办的。其他的机构也提供了援助。福特基金会驻印度首席代表在一份思想内容丰富的文件中描

述了上述计划。下面我们引用该文件中的几段。

"一揽子计划"包括的内容之一是"一揽子"互相关联的方法：

印度最近几年的农业改进工作强调单独采用个别方法，如：使用改良品种，或使用绿肥，或水稻插秧而不是播种等等。但是，"一揽子计划"却强调同时使用"一揽子"若干相关的方法，比如同时使用良种、种子净化与处理、改进苗床制作、适时适量使用化肥、改进用水以及适当的作物保护措施等方法。这"一揽子"耕种方法因地而异，但总是包括一组相互作用的方法，产量比个别方法单独使用高得多。这些相关的耕种方法是那些耕种者在现有条件下可行、可以得到足够技术指导与物资支持而且是耕种者们同意采用的方法。④

"一揽子计划"的另一个方面是足以使革新者们免遭采用某个计划但又不能完成该计划这一挫折的后勤支援。土壤实验室、工具车间、化肥与种子供应以及获得信贷的机会近在眼前，唾手可得。

所有这些都是对信息"一揽子计划"的补充，但决不是同它分开。其目的是使信息计划尽可能地方化，并使之在各个方面同村庄的需要和文化相一致。所以，"计划"中的每个区都有自己的信息单位。主要依靠"村一级工作者"——他们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农业——召集会议并在各村有很多单个联系的街道和区工作人员。最常用的技术是示范：

计划大量依靠实地示范来教耕种者们如何使用新的耕种方法，如何施用化肥和有机肥料，如何进行种子处理和更好地选种、排灌水、作物保护以及谷物的收割、干燥和储藏。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有七个区分别举行了少则几百多则数千次改

进作物种植方法的实地示范……还计划开辟几个“示范村”，举办用水专门示范，以及发展为耕种者服务的示范合作社。⑥

示范计划将同更广范围的信息活动相结合：

通过在每一个区的首府所在地设立“一揽子计划”信息办事处，正在开辟一条大众教育的新途径。根据官方计划，这些办事处的工作将作为中央——邦——区综合信息服务的一部分进行。这些单位将是在印度最先设立的区农业信息办事处。其职能是开辟并使用现有渠道，将技术和计划信息大量传给耕种者和公众。它们将制作和发行用于其所在区的简易直观材料、传单、图片、招贴画和幻灯片，并协助培训推广工作者。它们在可行的范围内利用报刊杂志作宣传，利用公共演说、广播节目、贸易博览会上的展品、电影和幻灯片。它们还协助学校、青年和妇女团体、地方合作社、商业团体以及村委会的活动，以便尽可能广泛地传播计划信息……所有这些活动加在一起，使改进农业的信息和主意不断地传到耕种者那里，并且为信息反馈到计划官员那里创造了必要的机制。这一工作肯定能消除耕种者与关于新方法及其好处的知识和启示之间的现有差距。⑥

于是，根据对地方文化的了解并在足够后勤支援下，各种各样的媒介和传播渠道被综合起来，用于实现某一经过深思熟虑而制定的目标。充分评估这一活动的效果还为时过早，但是，生产力的初步提高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当然，并非每个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计划都象上述农业发展计划那样得到大力支援。但是，许多国家都有不太复杂但非常有趣的发展，我们只能提其中的几个。这些发展都同广播的广泛使用有关。不难看出，为什么广播对农村发展计划特别有用。它

传播的距离远而且可以越过各种障碍；它传播速度快，在几种主要媒介中制做成本最低，接收也不算贵。由于半导体收音机的普及，即使在没有电的地方也可以收到无线电广播。它对有文化的人和文盲同样有效，而且适合于各种内容和形式。

由于这些原因，广播用途很广，节目类型多种多样。较简单的用法之一是约旦安曼广播电台的清晨对农村广播。这个节目每天早晨六点一刻开始广播，内容主要是回答问题。电台每周收到农民们提出的约三百个问题。"怎么才能治好我家母牛的早产病？""对使我的果树树皮脱落的虫子该怎么办？"广播员——一个前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者——从问题中选出最紧迫的问题，必要时还可同农业部或其他部门的专家们讨论这些问题。得出最佳答案后，他就在清晨节目中用对话的形式，友好而引人入胜地将答案播出去。潮水般涌到他那里的问题之多，就证明了这一节目的用处。⑦

值得指出的是，约旦的这个节目是双向传播。在广播节目制作之前，听众们将问题寄到电台。所以，耕种者们总是在同农业专家进行不断的对话，随时将给农场造成麻烦的问题告诉专家们。当耕种者们弄不懂专家建议时，他们就提出另一个问题。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双向传播使得该节目如此实用和如此受欢迎。

即使在高度发达的国家，当运动进行到农民们要决定是否采用某一新方法的时候，面对面传播也优先于大众传播媒介。农民们主要依靠媒介获得有关新的耕种方法的信息，但是，当问题关系到决定是否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采用新方法时，他们就要请教其他农民或专家顾问。⑧不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高度发达国家，变革的决定都将在地方作出；它需要讨论、专家建议和个人的影响。如果是在团体或社区的基础上作出的决定，那么，这一决定就更有可能具有持久性。

由于这个原因，发展并完善使专家意见同社区讨论决定相结

合的农村广播论坛节目，对整个农村发展事业来说是大有希望的。这一论坛专题节目不必只限于农业信息，它可以而且一直被用于多种多样的社区发展计划。它可以而且一直既用于广播又用于电视。不管采取上述哪种形式，这种专题论坛节目对改变团体的观念和行为都有很大的潜在价值，因为讨论可以使整个团体发生变化，而不要求其中的个人偏离团体。这就是说，它在大多数国家是这样起作用的。在讨论被看作是一种游戏或是一种磨炼和表现个人才智的方法的文化中，一次讲座比一次按计划进行的讨论取得的效果要大。但是，正如1941年首先开办《农场广播论坛》的加拿大已经发现的那样，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大众传播媒介与团体相结合极富成效。

在加拿大举办该论坛节10年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该节目主持人对这一作为成人教育的手段的作法进行评价。结论是：这些节目在培养领导才能、鼓励农民们相互合作和创造一种"社区感"等方面成就斐然。[9]

法国组织了农村电视讨论小组。对这些小组进行认真评价后发现，它们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向其成员传递信息并产生预期的观念变化。评价人员还发现了这些俱乐部的另一个有某种重要意义的特点：当广播的题目是同未来的观众共同选定，节目是同未来的观众一起制订时，这些俱乐部就更有效。[10]这是对发展信息"地方化"投的又一赞成票。

日本也组织了不少电视论坛小组。人们兴趣很高。后来这些小组发展成为社区社交中心。评价报告中说："尽管是寒冷的严冬，但是，村民们不分老幼妇孺，每个星期四晚上都到区政厅来……他们开始对饶舌和闲聊失去了兴趣，而对严肃话题越来越感兴趣。电视使农民能够开口说话，表达思想，并使他们意识到，在众人面前讲话毕竟不那么难。此外，他们在表达思想之后有一种满足

感”。[11] 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该项试验的资助停止后，日本政府决定自己出资继续组织这些俱乐部。

对农村论坛的最广泛的试验是在印度。开始时，向每个邦的五个单语区的150个村庄的收听讨论小组广播20个节目，不久，这项活动便推广到全国3500个村级论坛组。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定今后每年增加5000个论坛组。除了农村的农民专题讨论组外，全国农村还有约1400个妇女收听俱乐部，约2000个儿童俱乐部。[12]

关于农村论坛组的研究报告热情洋溢：它们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功，在有专题讨论组的村子里，知识的增加是惊人的，而在没有论坛组的村子里，知识的增加却微乎其微……论坛小组迅速发展成为能够比村委会更快地促进村里的公共事业的决策机构。它们常常承担起介于村委会和市政会议之间的职能……这些论坛组因而变成了村政民主的一个重要工具，并使更多的人能参与本村的决策过程。……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要求专题讨论组永久化”。[13]

这些论坛显示了大众传播媒介同有关的小组讨论相结合的独特作用。其效果鼓舞着印度政府以及其他国家的政府，按计划在尽可能多的村庄安装社区无线电接收机。印度中央政府补贴农村收音机费用的50%，每台最多补贴25美元，剩下的50%各村付1/4，其余3/4和安装费一般由邦政府支付。现在，印度的村庄已安装了大约100000台这样的社区收音机。此外，还有稍大于这个数字的私人收音机。

必须再次强调指出，农村论坛并不只限于农业信息和农业生产决策。实际上，任何有见识的农业信息节目，其内容都比农业技术要广得多。它们包括卫生、生活条件、教育、扫盲、参与公

共事务和与提高农业生产只有间接联系的其他题目。当然，为了实现这些间接目标所做的任何工作，最终也将在生产力上得到反映。但是，最成功的农业信息是传给作为人而不仅仅是种植者和耕种者的农民的。

卫 生

没有必要详细谈论卫生改进运动或其他社区发展运动，因为这些运动的问题同我们已经谈过的农业运动的问题几乎完全相同。

林伍德·霍奇顿是一位多年研究亚洲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社会人类学家。他在谈到卫生改进计划时说：

> 我们的公共卫生教育计划越是深入执行，我们的教育努力就越是要关心个人，关心那些影响个人行为的社会和心理因素。
>
> 在疟疾防治计划的最初阶段，我们直接关心的既不是文化价值观念，也不是个人的观念与信仰。我们关心的是给人民些什么，为人民做些什么，而不是同人民一起做些什么。但是，当我们想促进计划生育或是改变某一部分人的饮食习惯时，我们就直接冲击个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和信仰了。我们必须帮助人们根本改变其行为。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只有当我们理解这些价值观念和态度，并通过它们进行工作时，工作才会有进展。我们还将发现，不能通过立法产生公共卫生计划，相反，重点必须放在教育过程上。⑭

那么，在卫生运动中，正象农业改进计划那样，只要我们关心的是给人民或为人民做些事情，任务就不太艰巨。而信息运动虽然有用，但不是关键。然而，一旦需要村民们做出决定和改变

其行为，这时，有效的信息就变得很关键了。正如卫生发展官员们所发现的那样，在这个阶段，如果我们期望运动成功，信息有效，那么，我们必须：(1)使整个运动以对村民的生活、信仰和观念以及决定其生活方式的社会因素的了解为基础；(2)同了解村庄和村民、了解社会变革过程的实地工作人员或其他人进行面对面交流，并且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支援和扩大这些实地工作人员的工作；(3)最后，综合使用各种传播渠道，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使用其中的每一种对信息的总体效益作出最大贡献。

印度中央卫生教育署的一份报告表明，该组织是如何将信息用于加快社区卫生发展的。首先，有一批积极的公共卫生实地工作人员，巡回医生和诊所遍布全国。该署及其在各邦的办事处为这些人源源不断地提供材料，对这些材料的计划和选择实地工作人员有发言权。该署利用所有大众传播媒介同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教育人员和公众取得联系。该署有一个关于卫生问题的电影资料馆，审查新影片以便向其他用户提出意见，并帮助新闻部制做关于卫生问题的电影。它还存有幻灯片、安排广播讲话，并在《S-wasth Hind》月刊上刊登讲话稿。它正着手对印度的电视台进行试验。它出版已对受众作过精心预试的小册子；发新闻稿，代作广告，出版招贴画。它参加了不少卫生展览。现在，它打算用方言为只受过最低教育的人们办一种新的非技术性健康报。在一个有代表性的运动如天花防疫运动中，它编写通俗小册子，为六个不同的团体对象绘制宣传接种疫苗必要性的招贴画，制作介绍疫苗接种的传单、公共汽车宣传画和板报，为报纸撰写专稿和举行记者招待会，为实地工作人员准备"谈话要点"和技术背景材料，发行健康报专刊，为运动搞一些专题广播节目、广告和提出一套口号等等。

在有设施和人员的情况下，几乎任何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

运动都会同我们刚刚描述的情况相似。这就是说，它将是一个范围很广的努力，是一个得到大众传播媒介支援的深入的人际运动。在同常常是文盲的乡下人打交道时，卫生信息计划人员们发现，电影和广播对支援公共卫生人员特别有效。我们可以各举其中的一个例子。

菲律宾政府一直在使用22辆机动放映车。这些放映车设在卡车上，自带发电机、屏幕、扬声器、麦克风、展品、手册和其他所需的材料。这些放映车从一个社区开到另一个社区，放映关于健康与环境卫生、改进农业生产方式、政府机构与公民职责等方面的电影。演完电影之后，常常用车上的扬声器和麦克风组织对电影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人们成群结队赶来看电影，每次人数少则500，多则3000。一年之内，观众多达数百万人。

在南朝鲜的一个缺少电和接收机的地区，人们巧妙地利用为数有限的廉价电池接收机。他们寻到了20只这样的接收机，并花几百美元建了一个功率为50瓦的发射机。在另一个以肺结核、伤寒和肠道寄生虫病为主要健康问题的地区，制订了一个介绍一些有关这些病所需信息的计划。一个长达3小时的节目对这些信息作专题广播，但同时也播放相当多的娱乐节目——唱歌比赛、地方乐队演奏、街头采访等等。这一节目每天广播三次。每次广播以后，志愿人员便将接收机转移到另一个社区。这样，在三天之内，180个不同社区的人就可以用20架接收机收听到同一广播。

这一广播节目传播了预期传播的信息，深受欢迎，大获成功。在节目播出之前和以后，分别对听众进行了抽样测验。结果表明，听了广播以后，相信肺结核遗传的人比听广播前减少了一半以上。几乎每个人都懂得了脑炎是怎么传染的，知道伤寒病因的人比以

前增加了50%。[16]

当然，这并不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受众肯定会从大众传播媒介那里了解到他们应该了解的一切。本书第一章中所提到过的秘鲁农场项目的经验就是一个例证。根据卫生计划，放映了一部虱子传播斑疹伤寒的彩色电影。农场居民身上长满了虱子，需要向他们指出这种情况的某些危险。影片进行预演时观众认为效果很好。但是，影片放映一周以后对看过电影的人进行的提问时表明，观众并没看懂这部电影。他们说，他们见过很多虱子，但从没见过电影里那么大的。所以，他们认为，那些危险的动物准是另一种虱子；此外，他们见过许多得了斑疹伤寒的病人，但从未见过像电影里那些身上长着奇怪讨厌的红白斑疹的病人。所以，他们认为，这准是一种只有别人得他们不会得的病。[17] 观众所学到的显然不是影片要教的东西。这件事说明，大众传播者为什么需要了解受众，为什么需要对发展中国家的大众传播尽可能进行预试。

扫盲教育

在一份考察各种媒介对扫盲教育所能做的贡献的内容丰富并有独到见解的文件中，法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提出这样一个笼统假设：在发展中国家，“必须将扫盲看作是一个实际问题，而且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从这个假设出发，文件提出在扫盲斗争中应考虑的几点：

第一，扫盲的形式必须因社会团体、发展部门以及目标的不同而异。

第二，在决定何时发起扫盲运动时，应考虑到这些团体和部门的发展计划。换言之，在通向现代化和发展的道路上，

扫盲不一定是要迈出的第一步。

第三，扫盲运动必须被看作是综合协调的各种措施的一部分。

第四，因此，必须采取步骤做必要的准备工作(研究现有的需要；在尚未感到有扫盲需要的地方采取措施，根据已有的兴趣引起人们的要求；编写更多的读物；为至今还没有书面语的语言设计出一种书面语形式；制造和发行练习本和铅笔等学习用品等等)。类似这样的问题在生产和对外贸易方面将或多或少涉及整个经济的结构。在另一个层次上，这些问题又产生了优先事项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能为那些已经学会阅读的人印书刊或报纸的印刷厂，或没有进口报刊书籍的发行机构，或者象多次发生的那样，如果扫盲班教的语言不是日常报刊书籍中所使用的语言的话，那么，教那里的人阅读又有什么用呢？扫盲运动的准备工作、后续行动和其他非主要部分的另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是，培训运动开始前、进行中和结束后所需的总务技术人员和行政服务人员。⑱

这就再次强调，任何旨在实现广泛社会变革的信息运动都必须以当地文化和情况为基础，同其它方面的发展相联系，并得到计划和后勤方面的充分协助。有了大功率发射机或与之相应的设备并不能保证其中任何一个运动的成功。尽管大众传播媒介在任何信息运动中都必不可少，但必须对它们进行综合利用，给它们以各自最擅长的任务。

同社会环境和其他发展计划联系最密切的莫过于扫盲运动。正如法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扫盲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它是造就更多有用的、有创造力的公民和加速国

民发展的一种手段。因此，其内容必须适合社会和发展计划的需要。要鼓励人们参加，就必须保证扫盲对社会和个人都是件好事，而且会带来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社会地位的好处。后续阅读材料必须同社会的生活、问题和机会密切联系，否则新识字的人就会认为，花这个气力不值得而不再努力。换句话说，正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扫盲专家常说的那样，"扫盲是个社会问题"。当人们开始考虑扫盲信息时，人们首先考虑的是社会环境。

一个社会什么时候准备发起一场广泛的扫盲运动？这就是说，它什么时候能够利用新获得的读写技能并奖励拥有这些技能的人？谁应该学习读书识字？是否某个团体比其他团体更需要学习？只教儿童阅读而不教成年人行吗？刚识字的人应该学习阅读什么？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将读到某些事情，那么，能否将扫盲教育作为社会总发展的一部分，并用来传授有关卫生、农业、公民权利与职责、算术、或社会当时最需要的知识？在就信息渠道作出决定之前，这样的问题就出现了。

但是，当人们开始考虑渠道问题时，人们发现有三种普遍使用的方式，其中有两种强调面对面传播，只有一种强调大众传播。上述三种方式之一是大规模志愿运动。群众团体规模较大、扫盲率已相当高的国家一般都发现，集中大量人力教别人阅读比设计其他运动更容易。比如，在波兰，电子媒介扮演配角——帮助增加刺激，赞扬成就等等；印刷媒介通过提供初级读物和印刷深入浅出的材料，对弥合刚识字的人在扫盲阅读能力和报刊阅读能力之间的差距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主要的信息渠道是志愿教师，他教文盲们认字母、学发音，并监督他们学习读写的初步尝试。

第二种方式是将整个工作留给学校。这就意味着，很多儿童将学会阅读，但学会阅读的成人很少。印刷媒介将提供不可缺少的初级课本和读物、电影，广播和电视也会给予某些帮助。但这里

的主要信息渠道是学校教师。

前面援引过的法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报告中有一段谈到作为扫盲中心的学校：

> 因此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即：在需要迅速发展的国家实现扫盲是否应被看作基本上或主要是学校的任务？学校作用很大，而且确实不可缺少，但其扫盲速度太慢，扫盲人数太少，不足以满足那些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需要。尽管这些国家为普及学校教育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但是，它们不能仅仅依靠学校教育为其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它们需要新的扫盲技术和媒介，特别是电视。另一方面，这些辅助手段同学校的工作并不矛盾。通过电视媒介进行的扫盲运动完全可以以学校课程为基础，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这样；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用学校的物质设施；可以为学生入学打下基础。但是，不可否认，象电视这样的教学媒介比学校更灵活，更容易适应各种迅速变化的情况。仅举一例：这种教学媒介更容易接近那些没有受过职业训练、或只受过在其目前情况下毫无用处的那种培训的动荡不定的农村青少年——这些人在非洲各主要城市与日俱增，而且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将继续拒不接受那些使用传统方法的教育和培训形式。⑲

多数发展中国家已经或多或少感觉到这一论点的力量，并试图用以电视、广播或电影为基础的校外扫盲班来补充学校扫盲教学。这就是扫盲教学的第三种方式。1962年6月召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扫盲专家会议时，67个国家在回答一份调查提纲时，有13个国家报告说，它们通过广播教扫盲课程，另外13个国家说，它们举办电影扫盲课程。目前用电视扫盲的国家的准确数字尚不得而知。但是，这些国家包括：意大利、巴西、墨西哥、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危地马拉、科特迪瓦、美国和肯尼亚。

在媒介讲授的扫盲课上，一般作法是在尽可能多的广播、电视和电影扫盲中心配备教师，或者至少配备志愿的班主席和督导员。这对不能音像并茂的广播尤为重要。这样的教师不需要多少培训，因为广播或电影专家教师可以承担大部分工作。但是，地方督导员证明自己在向学生解释疑难和向广播员反馈学生的学习问题方面是很有帮助的。

电视是一种很吸引人的扫盲媒介，因为它不仅音像并茂，而且很新鲜，特别有吸引力。对电视作为扫盲教学的一种媒介的最广泛的试验是在意大利进行的。直到1960年，意大利还有将近200万文盲，主要集中在南方的农村。此外，这些人对扫盲教育抵触很大。意大利广播系统和教育部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做出了共同努力。他们开辟了一个叫作《永远不太晚》的电视连续节目。这个节目设计精心，以避免使成年观众为难或产生反感。讲台和教室从没在画面里出现过；教师是从态度友好而且外表象普通人而不象知识分子的人中挑选的。节目注意避免将成人当小学生对待、以高人一等的口气对他们讲话或是同他们"玩游戏"而伤害他们的自尊。幽默和除了阅读技巧以外的有用信息使节目轻松活跃。节目辅有特制的阅读材料和学生们可以任选的补充课程。意大利人发现，在每一个讲课的地方安置一个教师，指导学生们做练习，补充电视教学并回答问题，这样做很有益。

当时的这一试验是意大利主要通过电视给具有抵触倾向的成年人上扫盲课的一种努力。结果如何呢？几乎每一个经常在收看点听课的成年人都学会了读写。当然，其中有些人比其他人学得更好。目前还搜集不到关于在家看电视听课的学生学习进展情况的任何准确资料，但是据报道，其中有些学生非常想念帮助他们纠正练习的地方教师。公共教育部以为，这一试验非常经济。国

定收看点达4000个，每次收看人数约5630000，占意大利所有文盲的1/4以上。⑳

所有成人扫盲计划，特别是那些依靠电视、广播和电影等媒介的计划，都大量依靠特别的简易读物用于课后学习。没有这些读物，学生们很快就会忘记新学的技能。此外，如果这些材料设计得精心，就能传播关于农业、健康、环境卫生、公民义务、本国历史与政府以及国民发展中其他优先事项的大量有用信息。

对这些材料，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的处理方法。比如：波多黎各每年编发4本书、若干本手册、4 期宣传画和8—10张招贴画。这些材料都浅显易懂，并同发展计划相适应。利比里亚发行一份用扫盲班所教的1200个单词编写的多样性月刊《新时代》，每份售价 3 美分。在尼日利亚北部，刚学会读写的人们可以看到各种长达 8 页的小报。在印度的勒克瑙，扫盲院用词汇简单的图书组建村图书馆，出版适于初学阅读者的书籍，还发行一种易读的家庭半月刊。其他国家每周或每两周发行一批特刊，以简单易读的形式提供新闻，从而培养了人们看报的习惯和兴趣。在另外一些国家，报纸刊载专门为初学阅读者撰写的一个或更多个专栏材料。用这些和其他方法提供阅读材料，结果令人满意。问题是要编写初学阅读者认为有用、有趣、简单易懂用不着“记下来”的材料。㉑

可见，大众传播媒介在扫盲过程的三个阶段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可以培养那些不识字的人学习阅读的兴趣和习惯。学生被吸引到课堂之后，媒介既可演配角(如在波兰)，也可以演主角(如意大利的电视教学)。当学生们掌握了足够的阅读技能，可以独立阅读一点东西时，大众传播媒介必须提供简易读物，以缩小课堂阅读到成人日常阅读的距离。

正规教育

除了工业化本身之外，教育是发展中国家经费开支的最大项目之一。所以，计划人员的问题是：大众传播媒介怎样才能使有限的教育经费成倍增加呢？现代传播对减少每教一个学生所需的费用、提高教学效率或利用现有教学设施教更多的学生所能做的任何贡献，都将是具有相当大意义的经济贡献。

全世界的每一个教育系统都依靠印刷材料，学校只有在用得起视听教具的情况下才使用这些教具。[22] 当然，发展中国家的课本和教学影片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想有自己的课本，就必须有自己的图书印刷工业和熟练的课本编写人员；要想有教学影片，就必须有制片工业，至少要有进口合适的教学电影和放映机的安排。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缺少合适的课本，教学电影没有被充分利用，就是因为它们在这两个方面失败了。尽管如此，这些媒介在正规教育中的效率和作用已得到了广泛承认。

广播和电视这两个较新的传播媒介在发展中地区正规教育中的效率和作用尚未得到充分证实，但是，广播和电视提供了某些极具吸引力的可能性。在缺少训练有素的教师的国家，广播和电视提供了广泛共用其最佳师资的机会。当某些课程没有合格老师教时，广播和电视给人以希望：在培养出合格教师之前也可以教这些课程。没有放映机和教学影片，电视可以权充"大放映机"同时为成万所学校放映。在没有学校或人们由于某种原因不能上学的地方，广播和电视可以提供某种不上学而受教育的机会。[23]

巴黎国立教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亨利·刁才德，对他所称之为就广播和电视对教育的利弊已经达成的广泛一致意见进行了概括。他说，一方面，广播和电视的传播及渗透能力使其具有某些积极特点：

a)在整个接收网内传播某个单独……信息；
b)信息的迅速即时、自动传播；
c)传播的规律性，使一系列连贯信息得以传播，从而允许采取机构性的协调行动。

也有一些心理上的利：

a)同观众心理注意力持续长度并存的"直接"信息的即时性和真实性；
b)信息的人格化亲密性；
c)从属于某一接收者群体的从属感和参与某一有全国意义的活动的参与感。

另一方面，由于很难使广播信息合乎用户的不同需要，广播和电视也有一些消极特点：

a)固定的时间表把听众和观众束缚在某一时刻；
b)在广播之前教师对信息的内容（或多或少都有些）没有把握；
c)信息的播出结构、节奏是预定和不可改变的，任何调整都是不可能的。㉘

然后，刁才德将在全世界许多地方已成功进行了的将广播和电视应用于教育的四种形式概括如下：

丰富性广播，这种广播同课堂教学相结合，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

弥补性广播：旨在弥补现有教育制度的不足，比如，替换不称职的教师或提高现有教师的素质，从而使教育系统主

要在数量上得到改进；

普及性广播：为在家自学或为学习目的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这些团体的成员已经受过某些教育)提供或延长受教育的机会；

开发性广播：旨在把教育传到从未见过学校的社区。在这种情况下，广播和电视将举办入学前的大众教育活动。[25]

相对高度发达的国家以多数或所有上述形式成功地使用电子传播媒介已有数年之久。[26] 在过去几年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所进行的充分试验和个例研究不容置疑地说明，发展中国家也能够卓有成效地将这些媒介用于教育。

对电子和电影传播媒介在丰富和弥补发展中国家教育方面的有益作用，已经不存在怀疑了。有效利用广播传播讲话和音乐，利用电视作示范和演电影的国家是如此之多，列举这些国家的名字是多余的。研究结果证实了试验报告。比如：日本对七年级学生试行英语广播教程，发现既听广播，又听老师讲课的班比完全用传统方法教课的班学的要好得多。[27] 还发现，听日语广播的三、五年级学生在试验期内学习成绩同用传统方法教的学生的成绩一样好或更好。[28] 在泰国，对二、三年级和六、七年级学生进行了丰富性音乐和英语广播教学试验。结果表明，听音乐广播的学生分数比没听广播的学生分数高得多。听广播课的英语学生同没听广播课的学生相比，听力测验成绩相同，阅读和笔试成绩比后者好。[29] 在印度的德里，对两个八年级地理班进行了一次 24 天的单元教学比较。在试验期内，给一个班演了几个电影，另一个班没演。单元结束时和结束几周后进行的两次测验表明，看了电影的班比没看电影的班的学习成绩好得多。[30]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教育家们没有编写新的物理教程，

而是将在美国和英国都很成功的哈维怀特物理电视教程(共162课，每课半小时)改编为教学电影在土耳其各中学放映，以探索用这种教学节目弥补合格教师短缺的途径。因此，这个试验将中学生在下面几种情况下能学到什么作了比较：(1)有经验的教师在教学电影的辅助下教课；(2)缺乏经验的教师利用教学电影教课；(3)函授但有机会看教学电影；(4)最优秀的老师讲课，不用教学电影；(5)中等教师讲课，没有教学电影；(6)全部电影教学。结果发现，听最优秀教师用除了电影以外的任何教具讲课的学生取得的分数确实比只看电影但没有老师讲课的学生取得的分数高些。但是，如果教学电影是课程一部分的话，经验丰富和缺乏经验的教师所教的学生的测验分数没有多大差别；函授和电影教授的学生的分数和经验丰富的教师使用电影教授的学生的分数也没有多大区别。缺乏经验的教师使用教学电影所教的学生或函授并看电影的学生取得的分数比另一个城市里中流教师不使用教学电影教的学生取得的分数高得多。这些结果充分证明了电视或电影教学的巨大效果。[31]

1942年，一所实验广播学校在智利开始广播。它最初是靠商业电台做广告来维持的。其首要职能是丰富学校课程，但不久其范围就扩大到诸如"了解我们的孩子们"和"家庭教育"等题目的普及性广播节目和对老师及其他专业人员的广播节目。该校得到的接受与支持与年俱增。教育部正式表示支持并为该校增派了相当多的教师。教师们自筹资金购买接收和放大系统。智利广播协会将14个广播电台交给该校支配。这些电台覆盖全国，每周播出26个节目。对这一试验总的评价是，该校在为智利建立新的教学课程和教学方法方面发挥了非常有益和非常重要的作用。[32]

在德里，有3万多学生正在通过安装在各个学校的约500台电视机收看丰富的语言和科技课程。有关报告是令人鼓舞的。据

报告引用老师和教务人员的话说，电视课特别是印地语的电视课既教了学生，也使老师们学到不少东西。[33]

尼日利亚西部播放教学电视节目已近三年了。尼日利亚在电视教学方面碰到了每个发展中国家新建立任何的教学电视计划中可能也会出现的许多问题。因此，对尼日利亚的经验和问题进行研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将非常有益。但是，对结果的评价总的来说是积极的；教师们和发射台人员制做的节目超过了预计的数目。[34]

电视广播教学的一般性结果之一是提高了教师的素质和课堂教学的质量。亨利·卡西莱在1961年普尔杜讨论班的一次讲课中谈到了这一点：

> 有人曾跟我提到过这样一件事：俄勒冈的一位科技教师在给电视教师的一封信中说："今年我再也不要你教我的班电视课了，因为我看你讲课已经两年了。我想，你教的那些我也完全能教，我再也不需要你了。"我认为就是应该这样，如果电视教师不能在讲课中加进一些课堂上所无法复制的实物，就更应该这样。如果课堂教师保证自己也能在课堂上使用实物，这当然很好。如果她从教学电视上学会了使用实物教学，这样就更好了。还有一次是在巴基斯坦，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该将电视用于初级教育？"显然，在每个学校都安一台电视会造成很多问题。村子里没有电，小学校成万上千，电视价格昂贵，经济和许多其它方面的问题使每个学校安一台电视很难实现。但是，如果能用电视培训教师，就会得到双重效果：既使用电视媒介，又可以避免电视媒介的某种不利条件，即：师生之间缺少接触。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重视对电视的使用，把它作为教师职前特别是在职

培训的一种手段。[35]

这种教师培训是广播或电视用于丰富性或弥补性广播的副产品。但是，也可以由传播媒介直教进行教师培训。比如，在萨拉瓦克，师范学院的专家们每周两次广播一个"教师广播讲座"节目，内容是关于初级课程的教学方法。还有关于各种题目——校舍的设计、"书籍计划"、医疗、国民发展和其他旨在开阔教师的视野并深化其知识的题目——的对教师补充广播讲座。[36]

摩洛哥教育部的广播电视教学服务部，每天除了向2200个班的14万名学生播出三次广播课程之外，还在晚间为教师们播送四堂示范课，两课用阿拉伯语，两课用法语。该服务部主任说：

> 比如，有些广播课讲解怎样用听说法教语言课。这些广播课对法语教学改革的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你看，很多教师不得不完全改变其教学方法，他们过去习惯于教文学语言。现在，他们要教一种实用的语言。在这方面，口头练习的作用重要得多。
>
> 此外，许多教法语口语的摩洛哥年轻教师，由于其语音和语调低于其书面语知识水平而常常碰到困难。这些法语示范课帮助他们改进了自己的发音，同时告诉他们如何恰当和高效率地组织语言课。小学巡视员们发现，经常听广播课的老师所教的学生比其他学生法语讲得更好、更流利，这些老师在课堂上讲课也更加自如。[37]

电视机在摩洛哥尚未普及，但电视已被用来鼓励小学生上中学和促进教师培训。

用广播和电视普及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在意大利，其形式是电视学校(不是教学电视) 为上不了学的儿童和成人提供各种学

科的教育。电视学校毕业生在公立学校考试中的成功是电视教学卓有成效的证明。1961年，电视学校一年级学生中69.6%进入了二年级，在校一年级学生升入二年级的为81.6%。但是，电视学校二年级学生中73.2%通过了升学考试，在校学生升入三年级的只有69.9%

伊朗用教育电视成功地为学期考试不及格的学生播出了一个为期六周的暑期物理补习班课程。参加了暑期补习班的学生中，72%在新学期通过了补考。㊳

我手头上掌握的刁才德称之为“开发性广播”——这些广播面向没见过学校的地区——的材料很少。我掌握的材料主要是关于扫盲计划的，其中有些计划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应该补充的是，在一些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广播已被用于扫盲计划。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扫盲的同时或作为扫盲课的一部分，广播还传送了大量有关发展的材料。哥伦比亚就是一例，贝乐曼所著的《移山的信念》一书就是对哥伦比亚经验的生动描述。㊴

摩洛哥广播电视服务部主任说：

> 对教学来说，电视肯定比广播好。但是，电视也有个设备的问题，因为必须为每所学校提供一台电视机。㊵

毫无疑问，今天，当许多发展中国家期望传播媒介帮助它们解决教育问题时，电视满足了它们的愿望，尽管收音机普及得多，比较便宜，而且使用它的技术员和制造商也更多。电视机的价格差不多是收音机的10倍。电视机维修费也比收音机的高。电视发射机、播音室和节目制做的费用也高得多。制做上乘的电视节目需要更多的工作人员和技术培训。

正如卡西莱所说：“尽管如此，实践已经证明，电视的影响效果如此之好，传播信息和教育如此有效，商业吸引力如此巨大，

对民族威望的意义如此深远，以至于电视在全世界的发展和应用超出了所有预言。"④ 在写本书时，大多数拉丁美洲和中东国家，10个非洲国家和8个亚洲国家已经有了电视，而且拥有电视的国家正在逐月增多。所以，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有了电视机，通常是白天有几小时用于教育。大多数国家的电视虽不是全国性的，但毕竟覆盖了大量人口。

当然，电视教学成本的高低取决于它能做什么。芝加哥的一所初级大学发现，300—400名学生是盈与亏的分界线。少于此数，课堂教学比较便宜；多于此数，电视教学比较便宜。在印第安那州的杰佛逊县，许多学校也发现了一条电视教学盈与亏的分界线。很难给教育质量的改进和教师水平的提高标上一个财政数字。但是，当你计算一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培训和聘请专家教师所需的巨大费用时，那么，似乎完全有理由认为，电视使现有优秀师资成倍增加的能力将会节省大量开支。此外，技术的发展使电视覆盖的范围不断扩大。廉价电视机放大器已经问世了。一架在印第安那州北部上空飞行的飞机正在成功地向5个州的上百万学生广播电视教学课程。十年之内，电视卫星很有可能将被用来非常广泛地传播教育节目。

几乎可以肯定十年以后，发展中国家将电视用于教育目的的机会将比人们仅仅在几年以前预计的大得多。

刁才德在我们援引的那篇文章中问道："今天，除了广播和电视之外，有没有任何其它人类事业能帮助一个过渡中的社会迅速有效地跨过本世纪下半叶的难以跨过的门槛：提供世界规模的现代教育？"②

有些人认为，可能有一个——程序化教学。

这一新的自动化教学方法很快就在美国、西欧、苏联和日本投入使用，现在又开始在发展中国家试行。1963年夏天，举办了两

次程序化教学讲习班，其中一个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在尼日利亚举行，另一个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在约旦联合举办。在这两个讲习班上，向60多位教师和国民发展官员介绍了编写和使用程序的方法，并让他们编写和试用了首次为发展中国家编制的程序化教学材料。在这两次会议上，特别是当人们试用新程序时，到处充满了兴奋之情。新程序或新方法能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多大贡献，现在说为时过早，但是，讲习班的参加者以及关心这两个讲习班的人对此满怀希望。他们指出，程序化教学具有某些对发展中地区及其教育系统来说特别可取的特点：

1. 在缺少师资的地区，它强调学生自学。

2. 在政府和教育人员迫切希望修改教学内容以使教育适合本国需要的地区，作为编制程序化教学材料的一部分，程序化教学要求对教学目的和教学方法进行认真研究。

3. 在人们想速学求成的地区，程序化教学为人们提供了用自己最快的速度学习前进的手段。

不论程序化教学能否不负众望，不论电视教学在最近的将来在财政上对发展中国家是否可行，看来，今后十年，新的教育媒介将极大地促进教育的发展。因为，正如观察家们所指出，在较新和迅速发展的系统内应用新媒介不受在教育方法已经固定的发达系统应用这些媒介所受的限制。如果新兴国家迎接住向他们提出的挑战，他们将充满想象力地看待“新”媒介及其教育问题同媒介的关系。

让我们同它们一起想象一下吧。

假如一个新兴国家能够随心所欲地设计自己所需的教学课程(不一定是它所继承的教学课程)，并且确信新媒介能帮它教授它所选择的任何课程；

假如一个新兴国家能尽可能广泛地共用其最优秀的师资，使每个学生都能通过电视上真正出色的教师讲的大部分课；

假如除此之外，新兴国家能根据能力划分教师的职责，几个优秀教师上电视课，其他教师组织课堂教学，另外一些(也许没受过什么培训的)教师批改作业，作记录；

假如新兴国家能不再把学校的每个教室都建得一样大。这就是说，假如这些国家能注意到，有些学习活动需要学生独立完成，有些活动需要一个很大的房间(比如，电视教学班)，还有一些活动只需要进行小组讨论的房间，并根据不同活动的不同需要建筑不同面积的教室；

假如某个国家通过程序化教学可以使尽可能多的年轻人以其各自的速度学习某些课程，这样，在同一时间内，聪明的学生就可以学得快些，迟钝的学生也能学得更好些；

假如某个中学少、辍学率高的国家能提供程序化函授课程，这样许多当地没有中学或由于学习成绩之外的原因被迫中途退学的年轻人就可以继续受教育。

是梦想吗？可能是，但并非空想。一个国家的建国初期是幻想未来的年代。一个教育系统的幼年时期是憧憬如何使用新的教育乘数辅助国家发展目标的好时光。这是面临预算和师资培训紧迫问题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家发挥他们对新的教育媒介的丰富想象力的时候。正如罗伯特·勒弗朗所说：

有些经济上最不发达的国家没有经过中间阶段，便从手推车和牛车时代大步跨进了飞机的时代。我们不必担心，至少这些国家要重复欧洲国家用了几百年才走完的通向文化殿堂的缓慢朝圣。相反，它们应该急行军，用现代化方法和技术而不是用苏格拉底、蒙田、卢梭和朱尔斯·费里使用过的方

法和手段同无知和文盲作斗争。[39]

注 释

1. R·杜蒙:《加快非洲农业的发展》,《农业杂志》,3(1959年),第239—253页。
2. 同上。
3. 例见E·M·罗杰斯:《新发明的普及》,伊利诺斯州格伦科,1963年。
4. D·恩斯明格:《欠发达国家克服农场经济障碍的途径》,为美国农场经济协会准备的论文,第25页,康涅狄克,1962年。
5. 同上,第27、32页。
6. 同上,第27、28、32页。
7. 前引施拉姆和温菲尔德《大众传播媒介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应用》。经温菲尔德博士同意,我在多处相当详细地引用了这篇论文。
8. 例如,E·A·威尔克宁在《农业技术变化中传播媒介的作用》一文中,报告了有关美国农业取向中运用不同的传播渠道的大量调查,《社会力量》,24(1956年),第361—367页。另见前引罗杰斯《新发明的普及》。
9. 参阅J·尼科尔·A·A·谢伊、G·J·P·西明斯和R·A·西姆:《加拿大农场广播专题节目》,巴黎,1954年。
10. J·杜马泽迪埃:《电视和乡村青少年教育》,巴黎,1956年。
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本的乡村电视》,巴黎,1960年。
12. 前引马瑟和纽拉斯《印度农场广播专题节目的一项经验》。P·V·克里什纳摩西:《对印度乡村听众的广播》,《乡村广播人》1962年9月第11—12页。
13. 前引马瑟和纽拉斯《印度农场广播专题节目的一项试验》。
14. L·L·霍奇登:《乡村变化的心理和社会因素》,向世界医学协会第十六届大会提交的论文,第7页,1962年11月13日,印度孟买。
15. 向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交的报告。
16. G·F·温菲尔德和P·哈特曼:《传播——改善卫生的途径》,《增殖》1961年第3期第2113页。

17. 据前引福斯特《传统文化和技术变化的影响》的报告，第138—139页。

18. 法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准备的报告。

19. 同上，第4页。

20 E·塔罗尼：《扫盲战斗纲领，》《电视和青少年教育》，6(1962年)，第3—8页；M·G·普利西：《意大利电视对通过电视广播消灭文盲运动的贡献：'永远不太晚'》，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关于教育中的新方法和新科技专家会议的论文，1962年3月12日—20日。

21. 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两份有益的出版物，《新识字者丛刊：七件历史案例》和《新识字者丛刊：编辑方法》，巴黎，1957年。

22. 关于视听材料效果的研究概况，参阅W·H·艾伦：《视听传播研究》，《教育研究百科全书》，纽约，1960年。

23. 参阅前引施拉姆和温菲尔德《大众传播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应用》第13页。

24. H·迪厄塞德：《关于把广播和电视应用于教育目的的理性理论备忘录》《欧洲广播联盟评论》，75B(1962年)，第45—58页。

25. 同上，第46页。

26. 参阅1962年3月苏联代表向教育新媒介专家会议提交的报告，前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中的新方法和新技术》第35—40页。

27. 日本广播协会：《"广播英语教室"收听效果》，东京，1956年。

28. 日本广播协会：《"广播日语教室"的效果》，东京，1956年。

29. 洪赛和拉塔芒卡拉：《论广播学校作为教学方法的成果》，曼谷，1960年。

30. 国立视听教育学院：《电影在教学中的效果》，新德里，1961年。

31. 《伊斯坦布尔医学电影报告》，安卡拉，1961年。

32. L·菲莫尼亚斯：《智利十年经验》，《教育》季刊，Ⅱ，第3期(1959年)，第37—43页。

33. 摘自前引恩斯明格博士的私人报告。

34. G·L·阿姆斯：《致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旅行报告结尾》，尼日利亚，1962年。

35, H·R·卡西莱：《关于教育电视的国际讨论会报告》，第112页，珀杜大学，

1962年。

36. 参阅《亚洲基金会会刊》，26(1963年)，第 3 页。

37.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辑》第424期第12—14页，1963年9月20日。

38. R·S·哈德塞尔和G·K·巴茨：《伊朗的教育电视》，《增殖》，4(1961年)，第28，31页。

39. D·贝尔曼：《当大山移动时》，第31—44页，巴黎，1954年。

40. 前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辑》。》

41. 前引卡西莱：《广播和电视有益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和教育》。

42. 前引迪厄塞德《关于把广播和电视用于教育目的的理性理论备忘录》第56页。

43. R·勒弗朗：《视听媒介：它们在学校中的地位》，《世界银幕》，3(1961年)，第39页。

第六章　传播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臂膀

我从北部非洲某国的一位内阁部长那里第一次听到一个朴实的谚语，这个谚语概括了我在下面要说的意思。这个谚语是："不要在黑暗中耍刀子。"

这个谚语相当贴切。如果有光亮，杂耍师可以眼盯着刀子，双手在旋转的利刃之间移动自如而不受伤。换句话说，他从他抛到空中的每把刀子不断得到反馈。反馈告诉他，什么时候这把刀子下落，在何处伸手接它，下次抛多高等等。在黑暗中就没有这些反馈了。

当我们谈论发展中国家的传播研究时，我们是在谈论反馈。发展中国家也在耍着危险的器具。它们经不起发动社会变革的力量而不加以注意、使用大众传播的有力武器而又看不着其对象所造成的后果。传播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正是要满足这一需要：提供来自受众的不断的、有系统的反馈。所以，那些有时认为传播研究是一种"奢侈品"的国家，即使实际发展问题重重，也不妨重新考虑这一观点。

反馈的重要性

大众传播媒介关心两种反馈。一种是它们自己可以通过其节目获得的。在许多国家，这是通过使媒介"地方化"实现的，效果

甚佳。广播电台成为“地方”广播电台；报纸进入乡镇并把其记者派进村庄。它们放弃了那种认为节目必须完全在电台或电视台播音室里制做，电影必须在摄影棚里拍摄，只在城里或新闻广播里才有新闻的想法。它们走向村庄，走向乡镇，采访农场问题，摄制有关今日村庄的电影，采集“普通百姓”的意见。他们请乡里人提问题由媒介回答，给编辑写信，请当地人参加广播讲话和讨论会。换言之，其节目大量依靠地方制做。通过地方制做，他们使地方新闻和意见反馈到媒介，从而使受众觉得，渠道确实是他们的，而不仅仅是通向他们的。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人都希望与别人交谈，而不是听别人谈。某个新近独立国家的一位地方领导人曾经这样描述过他感觉到的这种区别：“当我们是殖民地时，他们来对我讲话。现在我们自由了，他们来同我讲话。”很自然，他喜欢双向交流。传统社会的每一个公民，在需要就价值观念和风俗作出决定时，总是希望能和别人讨论这些问题，而不是只听别人高谈阔论。这就是为什么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节目进行双向交流有助于鼓励人们作出发展决定的原因。

节目反馈——我们上面谈到的那种双向交流——旨在在媒介用户之间建立信息和意见的流通。另一方面，研究反馈是为了使有关受众以及媒介效果的信息向媒介的节目与政策官员和国家领导人流通。

这种研究反馈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1.从事象社会变革那样微妙的事业的国家都希望对实际情况了如指掌。它们希望使变革过程尽可能效率高，破坏性少。有些社会团体变化得快些；有些团体对变革的抵触多些。所以，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社会团体对信息有不同的需要。这里作一解释，那里作一示范，在一个地方回答几个问题，在另一个地方做几个保

证，又在一个地方研究并明确理解一个问题……是否采取这类行动决定着变革是缓慢的、受抵制的、讨厌的，还是合作的，让全国人民觉得他们是在共同前进的。

换句话说，针对大众传播媒介受众的信息是否适合受众，取决于来自受众和有关受众的适当信息。来自和有关受众的信息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信息若要有益，就必须以事实而不是主观想象为基础；就必须足以照顾到受众中不同团体的不同特点，照顾到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研究的亮光应尽可能对准受众对信息的需要是如此重要的原因。

2.发展中国家不能把资源浪费在不成功的或无效率的运动上。即使在有传播研究的高度工业化国家信息运动也经历了某些挫折，那些旨在移风易俗的信息运动尤其如此。[①]因此，在研究尚未开始、对媒介特点和差异了解不充分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大多数信息运动都是旨在实现巨大变革的发展中国家，就更有理由注意避免可能遭受的信息运动方面的挫折。此外，同较富的、更发达的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可用于信息运动的资金较少。所以，在正当其时地把信息送到需要的地方时，错花任何部分开支所造成的后果就格外严重，而为减少这种可能性和提高信息传送效率所能做的任何研究都会取得心理和财政上的收益。

3.发展中国家通常有各种各样的受众和条件，但对这些受众和条件却缺乏详尽了解。对媒介来说，发展中国家受众中的许多人是陌生的，因而是难以预测的。由于传统社会的各社区之间联系甚少，因此，潜在受众中的社会团体是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中发展起来的，因而会表现出各种文化差异。所以，较不发达国家的受众不象许多其他国家的受众那样具有相同的文化素质。此外，这些国家媒介与受众之间的文化差距总是大于发达国家。非洲或亚洲受过高等教育的节目制作人或编辑或新闻主任——他们也许

是在欧洲国家或美国上的大学——同其欧洲或美国受众的距离似乎比同其本国村民的距离近得多。除非他们不断做出努力，接触其受众，进行研究使自己扎根于本国文化之中；否则，他们的节目、电影或印刷品就可能同最需要这些东西的受众格格不入。

4.新媒介尤其需要同其受众保持密切联系。发展中国家的受众变化很快，他们在变化期间需要大量信息，在不同的时期需要不同的信息。但媒介本身是新兴的，而且也在迅速变化。所以，即便没有可以指导媒介为受众提供服务的传统，媒介也有理由认为，其自身的发展同受众有一种伙伴关系，并把自己的传播研究计划看作是在变革的某一时期最适合于受众的服务的一种手段。

处在媒介变化与社会变革同时发生中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发现研究的实际用途。乔治·L·阿姆斯在报道尼日利亚开办教育电视第一年的经验时写到：

> 整个使用的基本问题……是研究问题。计划委员会只有对接收效果和可传性的具体情况有相当了解时才能有信心地工作。比如，……其他的学术领域有迹象表明，非洲人的视觉也许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敏锐，但对这一点似乎没有任何实证，而且这一情况对学习过程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有影响的话，也一无所知。更具体一点说，需要了解在打开视听教具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注意力能持续多久等等。在这一点上，"试验的某些方面是成功的，"其他方面是不成功的；"如果要将试验转变为永久价值观念的一部分，长期规划就成了一个日益必需的附品，"政府就需"确定它要做什么"。阿姆斯说："至此，系统研究就不再是学术性的，而成为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问题了。"②

传播研究的性质和任务

研究只是向大众传播媒介和国家领导人提供关于受众和传播效果的反馈的若干途径之一。同其他途径相比，其特点在于可靠。

当你收到一封赞扬信或是抱怨信时，你很难说出这封信代表多少受众。即使一个广播节目制作人走访某一村庄了解对他的节目的反应后，也很难知道下个村子对他的节目是否有同样的反应。所以，一个国家的大众传播者越是老练，他们对零散的反馈就越是怀疑。当某个观(听)众说某个节目“好极了”时，他们学会了把它看成是某个人的意见，不一定有代表性。当有人告诉他们某个信息运动“大获成功”时，他们懂得要这个人拿出这一判断的根据。对某一运动成败的许多非正式判断总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或者是以不充分的观察为基础的。有时许多运动工作人员认为运动成功，而更深入的研究却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有时许多非正式观察家看到了失败的迹象，而更有代表性的抽样调察却表明运动相当成功。所以，正如较发达的国家已经发现的那样，发展中国家也发现，除了系统的反馈或关于受众的报告——这些反馈和报告通常达到研究的标准并使用研究的方法——外，不能完全依赖任何反馈或报告。

研究没有任何特别深奥之处。研究只不过是我们所发现的系统、准确地搜集信息并使我们能够估价信息的可靠性的最佳方法。研究是通过科学的抽样、适当的研究设计、统一提出问题或进行观察、熟练的数据归纳以及应用合适的统计数字来完成的。研究决不是一种不经过学习或训练就可以从事的工作，但也没有任何不可思议或神秘的地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计划出一本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关于传播研究的手册。除此之外，人们还可以在许多

地方获得训练或读到所使用方法。③

拉斯威尔从以下几个方面描述了传播研究的内容：

谁说了什么通过哪条渠道对谁有什么效果？④“谁”是指对传播者和像大众传播媒介这样的传播组织的研究。比如：哪些来源的发展信息在村子里得到相信？如何组织媒介才能使其更有效率？“什么”指对内容的研究：有关国家政策或经济变革向人民说了些什么？“渠道”指对不同媒介的研究，比如：某一特定种类的信息如何传到村子里？某一类信息最有效的传播渠道或渠道组合是什么？“对谁”指对受众的研究：其特点、需要、信息习惯、对大众传播媒介和发展信息的反应等等。“效果”当然是指传播所取得的结果：受众从中记住了什么？信息对人们的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有何影响？而对发展中国家实际意义最大的是这后两个：对受众和效果的研究。

现有的用于传播研究的方法和技术范围很广：从内容分析到抽样调查，从对参加者进行观察到实验室或实地试验。这里不是讨论研究方法的合适地方，但应该指出，这种研究的技术已比较成熟，并在一些国家的成百上千次调查和试验中得到了完善。

在发展中国家，人们对传播研究经常提出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代表着人们对传播研究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个问题大概是这样的：这难道不过是常识吗？难道一个不用研究方法、统计数字和其他科学标志的聪明人不也能得出研究所得的答案吗？另一个问题是：这些问题不是已经被发达国家的传播研究回答了吗？上述问题应该得到回答。

对第一个问题，我们要说明，研究同常识并不对立，只不过作为政策基础更可靠罢了。下面举几个例子。

“常识”一定会说，同人民取得联系并使其认识到需要改变他们的某些习惯的最佳方法是使用他们最熟悉的语言。这

在大多数情况下无疑是对的。但是，加利福尼亚州发生的一件事说明了常识提供的指导和人们从研究得到的指导两者之间的区别。加利福尼亚州卫生部想为去妇幼保健诊所的讲西班牙语的母亲们印一些指导手册。给她们西班牙语的手册是再有常识不过了。但是，西班牙语手册的效果却不是很好。初步研究表明，她们对语言非常敏感；她们在文化上正在移入美国生活，对可能不会使用英语的暗示总是使她们感到愤怒。所以，她们拒绝西班牙语手册。这时，"常识"本来会说给她们英语手册吧。但是，研究又表明，她们实际上确实不能令人满意地阅读英语。所以，研究建议是，手册印成双语版——英语部分以使种族差异不突出，西班牙语部分是为了易懂。这些小册子收效很好。这种解决办法无疑"不过是常识罢了"——但要是没有我们通常称之为研究的那种有系统的实地调查，也许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这个解决办法。⑤

另一个例子我们已经简要提到过："比哥特先生"动画片的例子，只有"常识"才认为，改变某个人的偏激态度的最好办法是让他自我嘲笑。这就是动画片是减少偏见运动的主要工具的常识方面的原因。但运动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如果稍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有偏见的人比以前更偏见了。通过研究才发现为什么会这样，并学会今后如何避免类似的失败。研究表明，偏见很深的人往往死死抱住其偏见不放——他们抱得这样死，以至他们竟会歪曲他们所闻所见事物的最明显的意义。比如：曾经有这样一部动画片，片子对要求在医院输血时只输"蓝血"的"高贵"人进行了嘲弄。在这方面持有偏见的人一般对这部片子并不发笑；他们认为：在医院要求输到最高贵的血液是个好主意。了解这些情况后，只有"常识"才会试用另一种消除偏见的办法。但是对这种结

论，以前"常识"并没有给过任何指导。⑥

常识根据文化发达国家文娱节目的长期经验告诉我们，应该让受众"高高兴兴"地离去。如果能在某一节目的末尾安排点滑稽可笑的内容，观(听)众就更可能以后再来看(听)这一节目。在教学电影之后演一部喜剧很可能会讨得观众的欢迎，而且显然能使观众得以放松。但是，当这种作法在发展中国家试行时，发展官员们就产生疑虑了。他们怀疑，在看到后面的喜剧时，观众对前面的教学影片中关于农业、卫生或读写的内容还记得多少。一位电影官员曾沮丧地写道："我多少次看到教学的所有效果在卓别林出场时爆发出来的阵阵笑声中付诸东流啊！"⑦因此，问题在于要平衡教学上的损失和增加观众以后再看节目的动机——换言之，查明观看的积累结果。在一段时间内，演喜剧时观众学到多少，不演喜剧时学到多少？有多少人从头学到尾？像这样的问题都值得研究，对这类问题，常识提供不了足够的指南。

所以，并不是因为人们不重视常识，而是因为人们知道在哪些情况下常识可能提供不了足够的指导才使用研究的。

第二个问题是指经济发达国家已进行了大量的传播研究，事实确是如此。问题是：发达国家所作的研究有多少可应用于发展中国家？

传播研究的结果越特殊、越个别，就越不可能用于别处。比如：一项研究结果表明，某一电视节目在英国吸引了一定数量的某一类观众。但这一研究的结果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性则是很有限的。⑧显然，如果发展中国家想获得有关自己的电视节目、广播电台或报纸的这类信息，他们就得研究自己的观众、听众或读者。但是，多做些理论研究怎么样？比如：曾长期由卡尔·霍夫兰领导的耶鲁大学心理学小组就取得了一系列研究结果。这个小组发现，某些类型的人比其他类型的人更容易被说服；在某些情况下，从两

方面进行论辩(即，也引用对方的观点)是值得的，在某些情况下却划不来；非常强烈地诉诸恐惧感通常会导致对某一论点的拒绝而不是接受等等。[9]这一研究结果是否可以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刚刚开始。或许有人会引用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拉扎斯菲尔德和卡茨的"两步流通"理论——即大众传播通过意见、领袖在人口的不同地方产生一定影响，这些地方的人比一般人吸收的大众传播要多。[10]所有这些研究结果都出自文化发达的国家。其中有些研究结果无疑可用于其它国家的文化，但我们现在对这些结果可应用的范围有多广尚不得而知。因此，有必要在其它文化中照抄这些结果。那么，就最具体的研究结果而言，发展中国家在其自身规划中预计很少能用得上这些结果。就最一般的研究结果而言，在照搬更多的这种试验之前，发展中国家必须小心翼翼地应用这些研究结果。研究结果在规划新闻节目或运动中的应用越具体，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发达国家的研究结果时就必须越谨慎。

可以直接应用的是方法，而不是研究结果。为了积累起能为自己所用的一套有用的传播研究结果，发展中国家必须使用上述方法进行传播研究。

现在我们举几个如何直接使用传播研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例子。

试用信息材料

在智利的某个诊所，孕妇们得到在怀孕期间保持健康的指导。其中一项是"每天行走3公里"。她们认真地接受了这一忠告。但是，当后来有人问她们3公里多远时，便发生了激烈争论：这一距离分别被解释为9到81条街。显然，公制长度单位对这些孕妇没有任何意义。健康指导应该说得更通俗易懂，比如："先走

到市场，再走到教堂，然后返回”。在墨西哥的一个诊所也出现过类似事件。在那里，产后妇女被告知“每3小时”给孩子喂一次奶。指导同样被准确地记住了，但这些指导并无任何意义，因为小时对产妇们没有任何意义。她们没有钟表。她们靠光阴衡量时间，从来不必掌握小时的概念。⑪

信息服务业充满了这类事件。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却由于表达方式而不能被某一特定文化中的人民所理解。当人们搜集一份发展中国家的大众传播记录时，无疑会从中找到不少传播失败的例子。当一个医生被病人误解时，他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发现并纠正这一误解。但是，如果大众传播媒介被误解，发现并纠正它就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大众传播媒介必须格外努力，防患传播失败于未然。

这正是试用的特别有用之处。在印刷或播放信息材料之前，先在材料针对的一部分人身上试用这些材料是比较简单、容易的。这样，就可以发现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发生误解，对哪些问题的兴趣不太大，一种材料是否可能比另一种更有效。

这是试用的一个层次。另一个层次是“试点项目”：即在一个有限范围内试行某一运动，并对其每一方面进行密切观察和估价。一个进行得好的“试点项目”能取得丰硕的成果。

试用可以几乎例行地用于新受众、新题材和所有重要材料，直到传播者们对其材料和程序能适应预期的受众的需要这一点充满信心为止。

评价运动和节目的结果以改进以后的运动和节目

大众传播总是匆匆忙忙。它总是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从一个节目转到另一个节目，从一个运动转到另一个运动，总是被驱使着把时间用于考虑下面必须做什么，而很少有时间估价一

下它已经做完了的事情的结果。来自受众的报告常常太迟、太少或太零散，对改进未来的工作没有多少帮助。

为了使过去工作的结果对改进今后工作有实际用处，可以通过研究目前的某一运动或查明某一受众群对某个节目、电影或印刷品的反应，获得一些最有用的信息。受众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特别喜欢或不喜欢什么？什么被误解了？节目内容受众记住了多少？他们因此做了什么？人们的意见或行为是否有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材料或运动的目标？受众中不同的人的反应和对这些人的效果分别有何不同？是否有些人喜欢，其他人不喜欢？是否有些人误解了，其他人则没有误解？材料或运动是否对有些人有效，对其他人无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为什么？如果能回答类似的评价问题，其结果对任何希望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服务的信息系统将有重大帮助。的确，如果目标是信息效率，那么每一个重大信息运动都应包括评价这一内容，而且应该不断对信息材料抽样进行评价。

了解在一特定文化中革新是怎样发生的

在前面几页，我们谈到，一个农业运动由于找错了领导人而失败了：运动的发起者是在同民选的但是与农业革新决策无关的政治领导人打交道。这说明，了解某一特定文化中革新是怎样发生的多么重要。了解谁是作出关键决定的人，谁是领导人，其影响有多大，舆论有何重要性和如何形成的，团体规范对个人有何影响等等，是非常有用的。所有这些事实都有助于传播者了解该找谁，以及什么地方需要什么信息。而所有这些都是研究的课题。

农业革新是指农民们是如何决定采用某一新种子或肥料，或一种放牧方法，或是一种不同的耕种方式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对这一革新过程进行了反复详尽的研究。[12] 研究的许多结果无疑可

以推广，但发展中国家的某些情况表明，研究结果决不能全盘照搬。比如：印度革新研究的初步结果表明，起码在某些条件下，新方法是在革新过程非常早的阶段采用的。[13] 而大部分信息搜集和估价试验——这在古典农业革新模式中，发生在采用新方法之前——实际上却是在采用新方法之后，其目的是使自己放心并学习如何实行新方法。完全有理由认为，在一个对任何革新都不大习惯、对农业推广还没有建立起在某些其他文化中已经建立起来的信任、团体规范在农业中影响较大、宗教迷信已成为农业的一部分的文化中，成功革新的模式同已经被研究过的革新模式大相径庭。情况是否如此还有待于发展中国家自己弄清。

比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迷信同人们接受什么样的革新以及如何对待革新有很大关系。吕宋岛上的一个团体认为，每个行动的每一步得从某个特定的神那里得到效力；人同自然事件无关。在许多拉美国家，人们习惯于把自然事件作为上帝的意志或命运来对待。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说，[14] 在这种情况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因此，在最坏的情况下，很难说服相信这些迷信的人使用化肥或给牲畜接种疫苗，因为庄稼的长势和牲畜的健康取决于神。至少这种权威的分配在农民和其职业之间造成了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显然需要不同于农业推广通常所需的信息处理。下面是雷德菲尔德和沃纳对这种目前存在于尤卡坦（在墨西哥—译注）的农业的描述："它不仅仅是一种谋食之道，而且是一种崇拜鬼神的方式。农民在耕种之前，先在地里立一个祭坛并在祭坛面前祈祷。他们不得在玉米地里喧哗，因为玉米地是一种神殿。耕种玉米地是神与人之间的永久神圣契约中的偶发事件。根据这一契约，神把它们所有的一部分——自然环境财富——给予了人类。反过来，人类崇拜神灵并举行为神作牺牲的传统仪式。这些仪式是这种谅解的戏剧性的表达。"[15]

但愿成为该文化一部分的农业信息不同于南达科他州或萨克森农场主们所得到的那种信息！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这不是地方传播者，比如社区发展工作者所应知道的情况吗？因此，真的需要象研究这样复杂的东西吗？诚然，一个来自地方文化并对周围的一切非常敏感的人可能知道存在着我们提到过的迷信鬼神之事。他也很可能知道谁是在当地作出农业决策的有影响的人物。由于有颇具资历的地方代表不断向大众传播媒介报告这些事情，因此，这些人就构成一种很有价值的资源，不论我们是否称之为研究。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媒介在地方通常没有足够的代表，反馈很少，而且覆盖的面很广，包括许多不同的社区。所以，有必要作出特殊的努力和安排以搜集媒介所需的信息。

理解受众

杜博讲过这样一件事：同一电影在尼日利亚的四个团体中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其中三个团体看了发笑，但第四个却没笑。在这一团体中，甚至用本国语解说的评论员似乎也不明白影片的意思。[16] 显然，受众中有些差异没有被预见到，如果不对受众做些研究肯定不会被充分理解。

媒介必须要知道受众对所传信息的题目了解多少，受众持什么态度会影响其对信息的接受；他们能够理解什么样的语言和象征手法，以及人们在同其相识的人面对面交谈中想知道或可以很快了解到的所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信息。

在发展运动中是用照片还是图画？这是一个表面上看来很简单的问题，我们就举这个问题为例。有一个传教士写道："拿一张黑白照片给土著人看，他们会说他们看不懂。"[17] 如果你告诉他们，他们正在看"一头牛或一条狗的照片"，他们会"认为你在撒谎"。

但是，他说，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他们中间的孩子身上，告诉他们哪是牛角，哪是狗尾，他们就能学会看懂照片，而且不久老年人们会再看一遍，然后拍着手说："对啊！这是条狗"。人们有理由认为，理解无细节照片的能力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18] 毫无疑问，某种程度的教育会使大众传播媒介对受众的其他特点有更多的了解，但是许多差异仅通过教育是无法预测的。

比如，某些地方习俗被认为是传播成功的障碍。说话人用左手打手势的电影会被加纳的阿散蒂人认为是侮辱性的。[19] 竞争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们来说完全是一种积极的动力，但是让一个萨摩亚孩子在学校跳一年级就会使他非常痛苦；给那伐鹤族和霍皮族(美国亚利桑纳州东北部的美洲印第安人——译注)孩子特别夸奖是个极大的错误。[20] 世界上大多数人都知道医生要问问题，并无拘束地、坦率地回答这些问题，但许多祖鲁人（在非洲东南部——译注)却不说病状，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医生就不能充分表现其医术了。[21] 这些只是例子，但这些例子说明，可能会阻碍传播的习俗的差异范围有多大。

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可以说人们接受几乎所有免费给予的东西。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却并不总是如此。某些国家的人们对免费提供给村民的无线电接收机是否同花钱买的收音机有同样价值和用途表示怀疑。向哥伦比亚农民提供果树苗，向贫困的智利产妇免费提供奶粉和危地马拉一家新诊所提供免费医疗等计划都受到人们的极端怀疑，而且直到对物品或服务稍微收了点费才得以实施。尽管收入对捐赠者没有多大关系，但付款对受捐者却有很大关系。他们认为，要付钱的东西可能值得买。[22] 在锡兰(即现在的斯里兰卡——译注) 人们曾对一个洛克菲勒资助的医治钩虫病的项目产生怀疑。针对人们的疑虑，负责该项目的一个名叫摩尔的医生解释说，洛克菲勒先生曾患有严重的钩虫病，

出于对安拉治好他的病的感激他，捐出所有的钱用于医治其他人的钩虫病。他在讲这件事时说："如果安拉和洛克菲勒先生知道了我故意说的这个谎，但愿他们能原谅我。"㉘

"受众在哪里？"这是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媒介最常问的问题。或者说，他们对接受变革持何种态度？他们对变革的基本主题的理解有多深？比如：如果讨论给牲畜接种疫苗的问题，受众知道细菌和细菌是怎样引起疾病的吗？在规划住房运动时，了解特定文化中的人们对房子的概念是有帮助的；如果要改变住房，文化的其他部分应作哪些变革，了解这一点也是有益的。在制定农业信息计划时，应该知道社会地位、家庭关系、社区价值观念和习俗同农业生产的关系。例如：在牧场四周围篱植树可以防止水土流失，但巴苏陀兰的部落酋长们却反对这样做，认为这样做有损社区团结和公有制。马达加斯加塔那拉人的一个团体宣布取缔较为有利可图的水稻栽培，因为水稻栽培造成了私人所有，从而破坏了传统的联合家庭所有和合作劳动制㉙对这类信息的需要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需要并非总能得到满足。对传播和社会变革的文化源的研究常常是在某一项目或工作组中增加了专业研究人员后才开始。

在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媒介需要了解的关于受众的许多情况中，有一组有关媒介和受众之间关系的问题：受众中有哪些人？他们看什么，听什么？他们对不同的媒介——报纸、广播等等——有什么看法？他们认为哪些需要应该得到信息的满足？他们当中哪些特别团体有哪些特别需要？任何出版商或电台经理都会想出更多类似的问题。只要他们能找到这些问题的有帮助的答案，他们就能够满怀信心地努力为受众提供更佳的信息服务。而这些正是受众的研究问题。

研究信息如何传及于民

类似上述问题引出信息如何传及于民这一更大的问题。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这些问题已得到详细研究。比如：已知某些人可能看报纸或杂志的什么内容，这种人可能看什么样的电影，可能选择什么样的广播电视节目。已经知道某些受众，比如农民，可能到哪里寻找新的农业技术，到哪里寻找有关这些技术的新信息或咨询。这些非常有用的信息，欠发达国家却一点也没有。搜集这种资料并不是一项很困难的研究任务，随着信息系统的发展，搜集这种资料变得越来越有必要。

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仍不能同全民见面，大众传播媒介的许多职能被下放到人际传播渠道，而关于人际渠道的相应信息也可能获得，并常被证明是有用的。比如：某一社区在某种社会变革或政策方面有影响的人物是哪些人，在决定是否采取一种新的保健方法时可能会征求哪些人的意见，知道这些是很有用的。这种有用信息的另一个例子是信息在社会上流通的基本方式：谁找谁谈？有时这些渠道受严格限制。比如：杜博引用过这一事实，即：在加纳塔连西人中，面对面传播受"家谱关系"的影响极大。所以，这些人对本族其他地方比较熟，对其母亲出生的地区就不太熟，对同他们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地方和人，即使近在咫尺，也几乎一无所知。㉕同样，在许多穆斯林地区，常常很难找到通向妇女的传播渠道。某些国家存在着正式和非正式传播的不同渠道。例如：一些非洲国家的命令或指示必须通过酋长领地的各级非正式的传达，国王不能将这些信息直接下达给某一酋长所辖的居民。相反，必须由一个信使向国王下属的酋长传达，然后再由这个酋长的信使向他的下属传达，直至信息传达到要求传达到的级别。而另一方面，也有信息可以在同一国内不

受这种限制进行流通的一些非正式渠道。[25]

显而易见，在一场信息运动中，了解这些人际渠道会减少麻烦，提高效率。一方面，知道谁是人际信息的主要来源以便使他们(指来源)得到信息是很有用的，另一方面，知道人际信息预计会遇到哪些阻力，也是有帮助的。比如，在美洲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地区进行卫生运动期间，玛格丽特·克拉克医生在察访住房时遇到了意外的阻力。于是，她编了一份有可能去该地区察看住房的陌生人的名单。这些人几乎毫无例外都意味着麻烦。这就是说，他们包括警察——那个懒散的报告某个孩子逃学的警官；少年法庭的代表——他报告某个孩子犯了法；政府稽查员——检查账目；另一个检查员检查卫生设施；估税员或收税员，建筑检查员等等。所有这些人都是该住区居民的潜在威胁。所以，该地区社会工作者的一个主要问题就在于是否能建立起一种朋友提供帮助的作用，而要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该地区的文化作一些研究和有相当了解。[27]

另一组研究问题旨在改进对这些现有信息资源的管理。信息传播效率低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问题。传播效率低妨碍地方媒介，也妨碍政府的信息服务。所以，仔细研究一下自己的信息流通问题可以使任何发展中国家受益。如果用不着通过信息部门自上而下，是否会有更多的信息传到村里？如果印刷能比现在更加下放，信息流通量能否扩大？对邮政制度或服务作哪些变革有助于使缺少信息的地区得到更多的信息？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大大有助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用信息的流通。

发展中国家的传播研究

不可否认，发展中国家进行传播研究有其特殊问题。这些问

题首先是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迄今所进行的传播研究甚少或者没有进行过任何研究。进行得多了，就会变得容易起来。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研究设施也越来越多。在某一特定领域进行研究的特殊问题被发现了，其它许多问题也就解决了。了解了足够的情况，就不再需要研究整个问题了，可以对问题的一部分集中进行深入研究。这是传播研究开展较好国家的令人羡慕之处。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因此，必须解决某些行政和工作问题才能进行大量有效的传播研究。

行政问题

研究人员　设计和监督构成传播研究的系统询问和观察，需要受过训练的研究人员。发展中国家从哪里获得受过训练的传播研究人员呢？

最终，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培训。最初可以派一些研究人员出国受训，但培训应尽快在本国建立起来。

但是，这种培训需要三或四年的研究生课程。与此同时可以作些什么呢？

可以采取一些临时措施。可以从传播研究搞得好的国家借一个胜任的研究员。他可以监督一些研究工作，培训若干人作能胜任其职的研究技术人员。满足研究需要的另一临时办法是在本国找一位虽未受过传播研究专门训练，但对此项研究感兴趣，并具备比如说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的技能的学者。他可以访问传播研究发达的国家，从中学到一些有益的理论和技术；可以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其他某个国际组织给他派一位短期咨询员，或者为来自邻国的新的传播研究人员举办国际讨论会。

增加传播研究人员的一个办法是，向早期项目派超过实际需要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这样，就有更多的人获得传播研究方

面的经验。

克服传播研究人员短缺的另一个办法是，训练媒介或信息服务人员进行一些比较简单的研究、比如：可以由有应变能力的传播人员——假如他们得到详细的指示而且在必要时有地方寻求咨询——进行广播听众研究、报纸读者调查或初级预试。所需的培训可以是不超过一个月的课程，由本国或外国的熟练研究人员教授。

在国际大众传播媒介研究协会的协助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计划编制一份发展中国家传播研究手册。

研究与发展 要想使传播研究在今后几年对信息节目产生重大影响，就必须把研究看作是同发展密切相关的。传播研究人员在初期的主要职能是利用其技能，帮助作家和节目编制人生产出有效的产品。研究人员将被派去研究某个信息运动，其任务是使运动尽量有效果。他将努力查明下周而不是明年有效的结果。他实际上将发挥某种工程作用，而不是基础研究这一传统作用。

对受到正统方法和程序训练的研究人员来说，这样做有时很困难，可能还令人不愉快。其中许多人会由于这一需要的迫切性做这项工作，但真正的解决办法是培训若干学生，让他们获得这种工程职能。他们需要学会正统传播研究人员的大部分技能，但重点略有不同：他们还得学会和练习另一不同的作用。今后20年至少需要成千这样的人。

短快结果与有永久价值的研究成果 如何快速获得可用的结果并使之"相加"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最终归结为管理研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必须象管理其他资源那样管理研究。最初，发展中国家无疑会觉得，必须将大部分力量放在我们提到过的"工程"问题上。但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克制将全部力量放在这些问题上的冲动。它们应该进行一些有关理论的长期研究。此外，在"工程"研究过程中提出问题的方式同研究结果能否得出一个原理

或导致某个可以反复用于指导信息的洞见有很大关系。在不同的地方是以同样方式提出问题从而使结果成为可比较的吗？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明确问题和进行观察，从而使人们对发生了什么毫无疑问吗？所有有助于解释结果的必要事实都搜集了吗？比如：假如正在观察人们对某一信息的反应，研究人员对受众的教育、态度和习惯的了解，是否足以使其正确观察结果，并将这些结果同另一些受众的反应相比较呢？注意发展研究的方式将会使研究有长远用途。一张国家受众特点图和在特定条件下有效或无效程序目录将逐渐形成。

所以，发展中国家最有用的行政工作之一就是保证对不同地方搜集哪些情况作一些共同规划，并将这些不同地方搜集来的材料汇总整理成可为传播者和研究人员所用的形式。

借用科学农业的一个概念——实验农场——对发展中国家的传播研究很有用。农业意义上的实验农场是这样一个农场，在那里可以试验和示范新技术、新作物，可以进行短期快速研究，也可以进行长期的持续研究。同一概念似乎也可以应用于传播研究。传播实验"农场"是传播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不断进行多种研究项目的实验室。其中某些项目可以短而快，结合运动进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是长期的项目。多种研究人员共同研究不同项目的优越性有：(1)联合规划、短期研究和长期研究可得以平衡；(2)可以从所有项目中汇集和整理研究结果；(3)工作和经验有连续性；(4)可以培训未来的研究人员。显然，这样一个"传播实验农场"是信息计划的一个重要国内资源。

工作问题

抽样　大部分社会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都取决于抽样——即：从人口中选一部分人进行抽样提问或观察，以使提问或观察的结

果具有代表性。在发达国家，统计调查人员已学会如何熟练地抽取样品。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一任务则往往非常困难。某一国际研究组织的领导E·C·威尔逊，将发展中国家在充分取样方面的某些困难概括如下：

"由于缺少普查数据和现有统计数字不可靠，所以只能应用最原始的抽样设计……由于缺少足够的统计来源，通过抽样进行预测或人口估计的问题变得更复杂了……此外，在缺乏关键的人口参数资料的情况下，也没有现成的抽样检查控制手段……建立即使是最简单的抽样也常常需要较高的成本……在对住房没有作有秩序的安排、人口中相当大一部分人住在迅即出现、转瞬又消失的临时住所内、在成千上万人四处飘流、无家可归的情况下，很难对住户进行有秩序的登记……随机选择家庭成员提问常常同地方风俗或家庭规矩发生矛盾。在有些国家，妇女们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在另一些国家，每家的男主人是它的唯一代言人。"[28]

这些问题对有些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确实存在的，并使抽样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随着国家的发展，人口资料日益充分和愈加可靠，抽样也将越来越容易。不过，没有必要等待情况发生了预期的改善之后才将传播研究用来为发展服务。但是，抽取样品时加倍小心，不做力所不及的工作，对抽样结果的可用性不说言过其实的话都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许多种有用的研究不用先进的抽样方法也可以进行。经过精心规划和用洞察力加以解释的实例研究就是研究的一个例子。这种实例研究在发展的现阶段对许多国家都用处很大，而且即使需要抽样，也是最低限度的。对整个村子或某个单位进行研究，如果进行得好，是很有用处的，可以绕过抽样问题。正如人类学家早就证明的那样，不用抽样对参加人员做一些观察研究也可以产生很有价值的结果。这并不是说，抽样不是大部分传播研

究的重要和必需的工具；而只是说，许多事不用抽样就可以做。

采访记者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社会采访的传统，由于许多国家存在着禁止妇女采访的清规戒律，发现并训练专业采访人员的问题就变得复杂了。工业化国家中的大多数采访记者是妇女，许多妇女具有采访的经验和技巧，这使她们很容易训练。不用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非如此。此外，在许多国家，谁可以采访某一社会阶层的人是受到限制的；还有语言问题使一些采访记者除在有限地区外不能进行有效的采访。诸如此类的问题使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更加复杂，但绝非不可改观。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不得不训练它们所需要的采访记者，以应付他们必须面临的特别采访问题。[29]"传播实验农场"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每个研究项目训练至少若干名采访记者，情况就会改观，一批经验丰富、久经考验的采访记者就会逐渐产生。

采访 许多传播研究项目包括征求意见——对某个节目、小册子、电影、某项政策、某个知名人士的意见，或是工业化国家大多数居民应该持有并在询问之下能无拘束发表的意见。不幸的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却并非如此。有些人认为不应该对最隐私的问题以外的任何事情持有意见；这些人既不认为自己应该有某种意见，也提不出任何意见。所以，试图采访抽取出来的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人常常碰到障碍。劳埃德和苏珊娜·鲁道夫曾描述过他们采访印度的"没有意见"的人们时的一些经历。[30]当他们将打算采访的人名单拿给村长看时，他会满脸惊愕地问："你们为什么偏要向这个可怜的阿利加尔妇女提问题呢？我能比她告诉你们更多的东西！"那个妇女自己也会反问："为什么偏要问我呢？我不过是个无知的女人。要问就问我男人吧！"

鲁道夫夫妇说，在某些情况下，"她自己和她的邻居们的这种认为'一个可怜落后女人的意见毫不足信'的观点是如此之坚决，

以至他们只能猜测一个城里来的受过教育的男人希望同她交谈的最神秘、最可怕的原因。'是警察吗?'这是采访记者不只一次碰到的问题。有个妇女确信提问是刑事诉讼的预审,所以一边回答,一边哭。采访记者断定,提问既无助于科学,也不会令人更幸福,于是便停止了提问。"[31]

这些国家的所有社会研究都受诸如此类问题的影响,必须找到一个绕开这些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常常是靠观察获取大部分数据。比如,拉奥巧妙地将观察和提问相结合。[32]为了使项目具有真实性,有时需要采访官员,不论其回答列入抽样与否。有时可能作一些解释。鲁道夫夫妇在香港时发现,古老的泰米尔谚语"欲知米饭生熟,拣一粒尝尝"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解释。对他们象米粒等人拣出来尝这一通俗解释,许多采访对象都感到非常满意。[33]

在经济发达国家,人们通常愿意私下问答。而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并不总能接受这一点。单独采访经常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其他人的意见和影响很容易同被采访者的意见混淆起来。有时,一个问题会使旁听采访的人争论起来,而接受采访的人却完全被排除在外。拉奥说,当他试图当着一些妇女的丈夫面采访这些妇女,而这些丈夫们不断插话告诉妻子们该如何回答时,他就很不耐烦。[34]

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坦率回答前来采访的陌生人提出的问题不是传统社会许多人的习惯行为。在某些方面,有礼貌地回答问题的习惯更令人不安。许多文化教导人们,给人以否定回答是不礼貌的。于是,采访往往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采访人才意识到,他听到的都是被采访人认为他想听的东西。只有非常技巧地提出问题才能克服这一困难。

了解作出决定的过程 困难的采访有一个长处,那就是迫使

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思考他到底需要采访谁。在工业国，人们习惯于发表意见，人口也较同质，因此，从全人口中抽样几乎成了标准行动程序。而从发展中国家的全人口中抽样则常常浪费时间。正如威尔逊指出："在许多国家，人民大众被贫困、无知、根深蒂固的冷漠和当权者的麻木不仁与狡诈夺去了公民权。"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谁想发现重要的态度，"通过各级意见领袖自上而下地搜集信息，直至再也得不到有意义的信息为止，这样做往往更能行得通。"㉟

当然，如果要确定某个地区的健康情况和生活习惯，这样做就行不通了。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需要从全人口中抽样。但是，如果你所关心的是有待作出的决定，或是或被接受或遭拒绝的社会变革，那就没有理由对全人口作抽样调查了。相反，需要考虑有关的具体决定是如何作出的。也许需要进行研究来回答这一初步问题。但是谁要是了解该社会的决策过程，那么，谁就可以去找意见领袖们，从而有可能既省钱省力，又得到更好的数据。

数据处理　随着国家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研究的发展，研究数据流量的剧增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有迅速处理数据的设施。这就意味着必须安装资料卡打孔机，并最终安装电脑。但这不应吓得新兴国家不敢进行所需进行的研究。到它们需要为研究人员提供数据处理机时，其它政府部门、商界或自然科学研究部门也将需要这些机器，因而可以分时。到传播研究需要电脑的时候，国家的其它部门也将有电脑了。

成本与效益

计算传播研究的额外成本比较容易，但要计算传播研究节省多少钱就不那么容易了。

发展中国家要想进行卓有成效的传播研究就需要训练有素的

研究人员。由于大部分研究是在实地而不是图书馆进行的，所以，除了研究人员的工资之外，还有一些研究费用。研究总费用将是信息费用极小的一部分，占发展预算的比例就更微乎其微。但这毕竟是一笔额外费用。

如何比较这笔费用及其效益呢？传播研究究竟能否节省信息计划和节目的费用，尚无审计数字可以说明。但是，有理由认为，传播研究可以通过淘汰花钱多效益低的信息项目而自养。然而，效益高的信息比效益低的节省多少钱如何计算呢？达到目的和未达到目的的运动相比所节省的开支怎么估计呢？有的放矢的广播服务或报纸比无的放矢的节省多少钱呢？事先知道某一招贴画是否能收到效果比不知道节省多少钱？了解需要信息的人能理解什么类型和什么层次的信息比不了解这些节省多少钱？这些又怎么计算呢？

这些并不是抽象的概念，但也不是马上就能用钱来衡量的，不过，我们认为，这些情况是可以用发展的尺度来衡量的。恰当的传播研究能够提高信息的效率，并且反过来促进国家迅速顺利的发展。

注 释

1、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参阅H·海曼和P·H·希茨里的文章：《信息运动失败的原因，》《舆论季刊》，11(1947年)，第412—423页。

2 G·L·阿姆斯：《尼日利亚日记》，《NAEB杂志》，1961年9月—10月合刊第11—12页。

3. 关于较普通的传播研究方法，参阅R·O·纳夫齐格和D· M·怀特：《大众传播研究引论》，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出版社，1963年。L·费斯廷格和O·凯茨编的《行为科学研究方法》(纽约，1953年)，是对社会进行广泛研究的一本有用的手册。另一本有用的书是小S·P·海斯写的《发展规划成果评定》(巴黎，1959年)，有关传播研究的评论，参阅W·施拉

姆:《大众传播》,《心理学年度评论》,13期(1962年),第251—284页。

4. H·拉斯韦尔:《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前引施拉姆《大众传播》第117页。

5. M·克拉克:《墨西哥—美国文化中的健康状态》,第221页,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9年。

6. 前引库珀和杰荷达《宣传的入侵》。

7. N·E·斯珀尔:《西非和东非殖民地电影单元产品的一些情况》,《基础教育中的视觉教具》第37—44页,巴黎,1952年。

8. 这类研究的例子是:英国广播公司听众研究;美国报刊发行人协会广告部出版的《报纸读者再研究》;J·凯泽对法国报刊内容的研究;以及广播节目收听率。

9. 参阅W·施拉姆在前引《大众传播》一文中所作的评论;以及C·霍尔万、I·贾尼斯和F·凯利,《传播和劝说》,耶鲁大学出版社,1954年。耶鲁大学的其它丛书列在施拉姆的评论中。

10. 前引凯泽和拉扎斯菲尔德《个人的影响》。

11. 前引福斯特《传统文化和技术变化的影响》第137—138页。

12. 前引罗杰斯《发明的普及》。

13. 摘自L·霍奇登的私人通信,印度,新德里。

14. 前引米德编《文化模式和技术的变化》第185页。

15. R·留德菲尔德和W·L·沃纳:《文化人类学和现代农业》,《变化世界中的农场主》第989页,1940年农业年刊,华盛顿,1940年。

16. 前引杜布《传播学在非洲:寻找疆界》第159—160页。

17. H·P·比奇:《新教徒传道的地理和地图》,第468页,纽约,1901年。

18. 前引杜布《传播学在非洲:寻找疆界》第159—160页。

19. 同上,第72页。

20. 前引米德编《文化模式和技术的变化》第255页。

21. 前引福斯特《传统文化和技术变化的影响》第132页。

22. 同上,第128—129页。

23. J·菲利普斯:《锡兰的灭钩虫运动》,小H·M蒂夫和P·G·弗兰克编《越过

边界的手：技术合作实例研究》第91页，科奈夫尔大学出版社，1955年。

24. R·O·林顿和W·M·黑利，摘自前引米德编《文化模式和技术的变化》第184页。

25. L·W·杜布(前引《传播学在非洲》第181—182页)根据M·福斯特著《塔兰西人的氏族原动力》(伦敦，1945年)第158—159、211页援引此例。

26. 参阅前引杜布《传播学在非洲》第182—183页。

27. G·M·福斯特摘自前引克拉克著《墨西哥—美国文化的健康状态》第232页。

28. E·C·威尔逊：《现代化地区的概况研究问题》，《舆论季刊》，22(1958年)，第230—234页。

29. E·C·威尔逊探讨了这些问题(同上，第232页)。每一位论述发展中国家技术问题的社会研究者都提到了这些问题。例见L·鲁道夫和S·H·鲁道夫：《印度概况：马德拉斯邦综合试验》，拉利斯、萨奇曼和戈德森合写的文章；以及吉拉德的文章，见《舆论季刊》，22(1958年)。

30. 前引L·鲁道夫和S·鲁道夫《印度概况；马德拉斯邦综合试验》。

31. 同上，第239页。

32. 前引拉奥对两座印度村庄的研究。

33. 前引L·鲁道夫和S·鲁道夫《印度概况；马德拉斯邦综合试验。》

34. 前引拉奥《经济和社会变化中信息的作用：印度两座村庄综合研究报告》。

35. 前引威尔逊《现代化地区的概况研究问题》第234页。

第七章　建设大众传播媒介

发展从何处开始?

对处于经济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的几乎任何国家的描述都会包括下列内容：

新旧两种传播系统并存。正象存在两种社会制度——现代化的城市与传统的村庄——和两种经济制度——城里的工业化和金钱交易与农村的小农经济和易货贸易——那样，也存在着两种信息制度。在城里，报纸和半导体收音机已经普及，有许多电影院，也许还有电视。在乡村，传播仍然像过去多少世纪那样主要是口头和人际间的。新制度正在进入乡村，但很慢，很慢。

缺少训练有素的现代传播人员，这些人包括写作与制作人员、工程人员、管理人员和维修人员。

缺少扩大报纸报道范围的印刷纸，还缺少可以用来使新识字的人看到更多的报刊杂志的其他纸张。

缺少可以使信息逾越阅读障碍从而把现代生活带进乡村的收音机。

缺少各种各样的印刷、广播和摄影、放映设备。

小报财政拮据。的确，财政问题阻碍着现代传播向城市以外的地区的每一步发展。

对收音机的使用存在着不同的要求。有人要用于娱乐，有人要用于信息，有人要用于文化，有人要用于教育。

尽管电视的费用高得吓人，但仍然存在着要求引进电视（如果尚未引进的话）的压力。

现代传播的传送设施——通讯、电气化、运输、邮政服务——还很不够。

这些国家对为扩大大众传播所制定的国内立法与制度感到关切是不无道理的。

在综合与平衡其传播发展——平衡一种媒介和其他媒介的发展，使大众传播媒介渠道同决策、教学以及地方政府的人际渠道相结合，使"新的教育媒介"同教育相结合——方面，他们既无计划，又无机制。

大众传播正是从这里——从一系列诸如此类的问题和解决这些及其背后的次要问题的决心——开始的。发展是从媒介及其有关服务的现状开始的。不论是幸运还是不幸运，媒介在早期发展阶段通常处于这种状态。

我们在前几章中一直在谈现在和将来——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媒介的现状以及合理巧妙地使用这些媒介可能对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现在我们要来谈谈"怎样做出贡献？"这一实际问题。新兴国家怎样才能使其传播系统现代化并使之为国家发展服务？在许多步骤当中，先采取哪些步骤？下面我们将谈谈有关的一些问题，并尽量予以解答。

资　　金

让我们首先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大众传播媒介需要多少资金有个概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发展中国家在今后20年中扩充大众传播设施的费用为34亿美元，其中约有6亿美元为教育服务费用，

预计，大众传播媒介的增长率与经济总增长率相同。对未来的任何类似预测都肯定是非常粗略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个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各国的需要与能力的组织作出的这一估计，使人们对我们所说费用的大体数目有了一个初步概念。

将这笔费用同其他有关活动的大笔预算相比较，我们可以知道这笔钱是多还是少。过去几年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对教育所需的费用进行了估算。1961年5月聚会于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各国政府估计，当时的仅在非洲大陆[1]提高入学率的五年计划就需要约41.5亿美元。分别在卡拉奇、贝鲁特、利马和华盛顿集会的亚洲、阿拉伯国家和拉美各国政府，对其所需的教育费用得出了大致相似的结论。没有任何人敢估计今后20年发展教育的总费用是多少，但这笔费用肯定是大众传播媒介发展费用的很多倍。事实上，如果大众传播媒介能通过辅助教育而节省今后20年预计的教育费用的一小部分，其节省的费用就会超过发展所有媒介的总费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雷内·马休先生最近估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国在10年内消除2/3的成人文盲，将需19.11亿美元。这就是说，扫盲3.3亿，每人平均投资只有5.79美元。总投资只占扫盲运动国家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14%。[2]

这些数字是诱人的：只需从最富国家中任何一国的年度预算中拿出极小的一部分就足以消除世界上的文盲了。大众传播发展20年的总费用不到美国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这些数字并不大，认为可以筹集到这些款项的想法也并非不切实际，特别是当人们认识到，这类投资能减少教育的高费用并能促进经济的总发展时，就更是如此。

阻碍新兴国家传播系统发展的不是费用数字本身。相反，障碍来自随投资而来的管理问题：由于资金竞争激烈而需要合理分配资金，需要合理使用资金以尽量利用互补性（比如：教育与大

众传播媒介)；需要安排和错开增长率，以使某一投资产生最大的效益，最小的副作用(比如：扫盲率要以社会能有效地吸收新识字者为宜)。这些问题都是关键问题。

一个国家怎样判断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投资足够了呢？当然，发展中国家将根据下列尺度决定其对媒介的投资：

在特定条件下，对大众传播媒介投资X美元，将从经济发展中获利Y美元。

但是，由于若干原因，不可能获得这样一个成本——效益比例。

比如：考虑一下这样一个显然是国民发展目标并要求信息为之作出贡献的产品：公民。如何估计信息灵通的公民的金钱价值呢？可以设想，农业信息使农业增产，那么给增产部分估计一个金钱价值；信息运动使国民储蓄增加，这也可以用钱来计算。但是，人们对国家的政策日益关心，民族感增强，更愿意为国家的发展而共同努力，难道这些也能标价吗？然而，这些正是改善了的信息能够为之作出贡献的国民发展目标。

再考虑提高传播系统效率所产生的另一个无形价值：领导。传播可以帮助社会任何一级的领导，并且有助于领导的实施以及领导的形成。然而，大众媒介对领导所做的贡献的金钱价值是什么呢？

再考虑一下社会各部门投资和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相互作用是非常广泛的。加快大众传播的发展可以提高其他部门的增长率，这些部门增长率的加快反过来又使大众传播发展得更快。比如：教育与扫盲的发展能促进大众传播的发展，大众传播的发展又能促进教育和扫盲，而发展的各部分中没有一个部分发展的速度能明显超过其他部分。一个国家经济的总发展能促进电气化和印刷纸的生产，从而使大众传播媒介更容易普及，而这反过来又使经

济发展更顺利。除了各部门的发展相互影响外，各部门的增长率也相互作用。扫盲人数或学校毕业生人数骤增，可能不被经济所吸收，从而造成一部分不满和无业的人。有文化的人太少，受过学校教育的公民太少，就会拖经济的后腿，减慢工业增长的速度。所以，问题不仅是要所有有关的社会各部门共同增长，从而使一个部门的增长可以促进其他部门的增长，而且还要管理和安排其增长率和增长时间表。

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要想加快其大众传播的发展速度，就必须同时也加快工农业以及扫盲、教育、电气化等等方面的增长速度，而这些有关部门的增长又在某种程度上限制着对大众传播媒介发展所能有效投入的资金。这也就意味着，搞清楚大众传播媒介对这些相互作用所作的确切贡献是很困难的。

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是一个比例，而不是绝对数字。不幸的是，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不必担心其大众传播媒介投资会走在其他部门投资的前面。情况往往正相反。在决定发展投资时，传播总是位居后列。现将对一家有名的全国广播电台的资助的评论集中概括如下：

"印度的作法是优先事项的典型。印度平均每1000人有两台收音机。《第一个五年计划》将计划开支1%的2/10用于发展广播事业，而计划用于邮政电报的开支为广播事业开支的14倍，教育开支约为广播事业开支的60倍。但这还只是计划。五年的实际总开支比计划少15%，而广播事业开支竟减少45%，只占总开支1%的1/10多一点。《第二个五年计划》也同样不重视广播事业的发展，广播事业开支还是占总开支1%的2/10。《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广播事业开支被减少到1%的1/10。

外汇短缺的国家由于财政原因都愿意对印刷纸实行定量分配或征收严厉的国内货物税，或规定收音机和电视机的进口限额，

甚至完全排除电视。这证明，几乎没有什么国家对大众媒介的发展给予对钢铁厂、公路、铁路和大坝那样的重视。"③

所以，加速大众传播的发展，首先要求各国愿意在媒介发展方面认真投资，投一笔同其他有关投资成公平合理比例的资。如果各国能够克服争资金的想法(这一想法来自不同资金分到不同部门和某些投资比其他投资在政治上更显眼这些情况，这是可以理解的)，并代之以共谋效益的思想，就能够取得巨大成就。这就是说，对教育的某种投资将受惠于对教育媒介的某种相关的投资。某笔农业投资需要对信息媒介作某笔相关的投资。还可以列举出大众传播可以对之作出贡献的很多发展活动。

让我们再次指出，以一种使大众传播媒介能够对国民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速度发展大众传播媒介的基本要求，是作出严肃而巨大的财政承诺。就我们的观察所及，整个发展中世界的大众传播媒介都资金不足，发展不够，因而不能作出如果充分适当利用所能作出的贡献。

我们不想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发展媒介所需的全部费用都得出自政府。即使在政府所有的媒介体制内，报纸、接收机、电影院也常常被卖掉。政府对媒介的拥有量因发展中国家的不同而迥异。但是，大多数报纸是私人所有；大多数广播系统为政府所有；将媒介用于教育主要也是政府的责任。即使是政府所有的广播系统，也有一部分资金是来自商业广告。约旦的情况就是如此。约旦来自电台广告的收入部分用于发展本国的电视。因此，私人资金可以有助于一个国家媒介的发展，而政府立法与行政管理则可以使私人所有媒介的发展顺利些。

如果新兴国家能表明自己对其国民发展所需的传播发展的严肃承诺，那它们就会发现，获得资本援助容易得多。如果新兴国家对私人投资表示友好，就更有可能吸引私人投资。若它们表明

自己愿意执行一套周详的传播 优 先 项 目并在压力下维持这些项目，那么，它们就更能获得建设传播事业所需的技术援助、贷款或其他双边安排。但是，新兴国家必须准备自己作出适当的承诺。

计　划

在编制预算的交错压力下，将本来会用于筑路或建坝的开支拨给大众传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大众传播吸引私人资本或双边援助，或要求提供购买广播器材而不是工厂机械设备的赠款，也不是件容易事。即使在大众传播内，选择更有必要的而不是好大喜功的投资(广播而不是电视，教科书而不是国际短波，等等)，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而发展中国家若要使其信息渠道同其工业和农业发展协调一致，所必须作出的正是这种承诺。许多国家传播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对传播能促进国民发展缺乏兴趣或信心，而仅仅是在交错压力下不愿对发展传播事业做出承诺。

这种承诺的最佳基础，顶住交错压力的最有力的支柱就是一个将大众传播发展列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的设计周密的计划。

制订这样一个计划基本上是个国内任务。人们不时讨论过建设大众传播媒介的全球计划。也有人多次提出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订一项加快发展中国家媒介发展国际计划的建议。毫无疑问，国际合作会有很大帮助，也能够对这一合作努力在哪些方面最有效果提供意见和指导。但是，任何国际“计划”的首要目标都必须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制订它们自己的计划，进行它们自己的大众传播媒介发展。传播系统是一个国家的结构和职能的非常密切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发展传播事业的责任决不能转移到国外去。所以，尽管我们会不时谈到什么时候要求国际资金，在哪些问题

上各国可以交流经验，或哪些需要最好共同满足，但是，我们将要论及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为发展其大众传播自己能做些什么——因为任务就是这样完成的。

一个国家怎样着手规划其大众传播发展呢？这里有几个建议。对有些国家来说，这些建议似乎已经过时了，因为这些国家已经这样做了，或者已经找到了做得更好的办法。对另一些国家来说，这些建议似乎是不必要的，因为这些国家认为自己不用任何进一步研究或规划就已经完全知道应该做什么。但是，我们希望这些建议会对一些国家有帮助。

制订计划的应该是谁？这取决于制订计划的国家。在有些国家，这是计划委员会的责任；在其他国家，这是某个或某几个部门的责任；在另一些国家，也许是某个代表国营和私营部门的全国委员会的责任。各国发现，不管主管部门是哪一个，使规划有广泛基础，使私营部门在任何适当情况下都得到体现，并吸收教育、农业、卫生和社会发展等有关部门的参加，是非常有益的。目的是制订一个综合计划，这就要求广泛的参与。

计划自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估计现状——需要搜集资料，在这一阶段传播研究大有可为。第二阶段是确定优先事项和目标，大多数重要决定必须在这一阶段作出。第三阶段是回顾，即修订计划和重排优先事项这一不断进行的活动。

第一步：估计现状　首先需要有一个作为规划其余部分基础的基本清单。我们在附件A中列出了在制订这一清单时可能碰到的若干问题以及需要遵循的某些程序。

首先，经历过计划过程的国家发现，将各种媒介——广播、报纸、电影、书刊、电视——各个击破并把现有设施、覆盖面、受众的数量与类型以及提供的服务（传播了什么样的信息，有多少教学材料，有多少娱乐节目，对发展计划有何直接贡献等等）编

成清单，是很有用处的。

接着是把阅读训练、学校教育、电气化、运输、邮政、通讯、通讯社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培训等有关辅助服务列表成册。这些服务各自是什么现状？它们应以什么速度发展？最后，必须要问：这一速度是否足以满足发展大众传播的需要。

还要审查是哪些进口限制影响着印刷纸、印刷、广播、制片设备和生胶片的供应；审查对这些进口产品以及书籍和其他教学、信息材料征收多少税，对传播材料和事业单位收了多少国内税。这些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媒介的发展？

最后，有必要看看媒介在促进本国扫盲、教育、农业、工业培训、卫生、公民教育和其他媒介能够作出贡献的领域正在做些什么。媒介在干什么？如果得到设施和机会，媒介还能做些什么？

这时候，有可能用某些标准衡量大众传播目前的发展状况。比如：可以将媒介发展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最低标准（每百人每天10份报纸、5台收音机、2张电影票、2架电视机）同发达国家的成就或发达国家的人或学校的需要相比较。我们希望，主要标准之一是今后国家发展计划的需要：即发展机构和教育制度需要什么帮助。

在这项工作的基础上，有可能对下列需要作出一个大体上的估计：新的和改进了的设备、设施、辅助服务和材料组织、受过训练的人员、研究指导、政府行政和立法行动、资金。再根据这一估计对有多少帮助可以用来满足这些需要作出估计。要求私人满足多少资金需要才是合理的？预计从国际资金来源、双边安排或贷款能得到多少财政援助？私营企业或国际合作能提供多少技术设备？区域或双边合作能满足多少培训需要？能借到多少加快发展所需的专家？其他国家有没有经验能减少满足这些需要所需的费用和时间？回答了一系列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有可能对某一国家

消除现状与需要之间的距离究竟需要做多大努力作出实际的估计。

到现在为止的一切活动都可以说成是为传播发展计划搜集基本资料。这主要是指，某一发展中国家必须对自己在这方面的资源和需要进行调查和规划。这样，它在必要时就可以获得某些援助。可以通过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或双边关系借来传播专家，帮助对资源和需要进行研究。甚至有可能获得赠款来资助调查；一系列这样的馈赠确实颇有助于对传播发展和资金、设施与技能的有效使用进行规划。但是，责任基本上是落在本国身上。发展中国家必须对自己传播发展的现状、发展方向和需要确实有个准确的了解。

现在准备走下一步，这一步是问题的核心。

第二步：确定优先事项和目标 我们在前面谈了现状、发展方向与需要。但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总有些事做不到，总有些需要满足不了，总有些资金竞争者得不到所需的投资，总有些产品供不应求，总有些需要的技术专家找不到。所以，必须将传播的需要同发展计划其他部分的需要结合起来考虑。

我们一直小心谨慎，从没说过传播的需要必须同发展计划其他部分的需要对立起来考虑。实际上，传播发展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教育、改善医疗、社区发展、促进民族感、广泛参与公共事务或国家发展的其他宏伟目标并不矛盾，尽管在预算听证会上有时给人以矛盾的印象。传播事业是这些目标的奴仆和盟友。传播发展必须同这些目标共同发展。最终进步的不是农业、医疗或信息，而是整个社会。所以，巧妙的规划所关心的不是同其它部门相比拨给信息部门多少钱，而是预计的社会发展曲线需要多少信息。

因此，在确定优先次序时，第一条必不可少的信息是计划中

的社会发展曲线。农业与卫生在今后几年的目标是什么？公共教育和扫盲应发展多快？国家在提高本国人民信息水平和开发人力资源方面的总目标是什么？当然，这意味着，信息服务与设备应有多大发展和改善呢？

即使在确定了传播事业大致的优先地位以后，在传播业之内也必须有优先次序。最需要做什么？目前重点是放在广播还是发展电视上？目前教育需要的是更多的书，还是放映机和电影，或是无线电广播？信息服务在哪些方面落后了？比如：提高信息人员素质的培训计划在目前是否要比增添一些设施更有益处？

在就最需要做的是什么作出决定时，必须切实考虑到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比如：如果目前短缺的印刷纸的供应不增加，鼓励创办更多的报纸就没用。如果收音机的数量不增加，制造更多的无线电发射机就没有道理。如果不培训电视人员，引进电视就毫无用处。在任何部门的发展过程中，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建立事情的先后顺序。

在决定了能做到什么，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和事情的先后次序后，就会产生一套应该做什么的优先事项。

同编制基本清单相比，在这方面成立一个代表传播业各个方面的咨询委员会也许更有帮助。这一委员会是由1960年在曼谷召开的《东南亚信息媒介发展会议》建议成立的。会议认为，这样一个委员会将向规划人员提供灵通的信息咨询，向媒介反馈信息，从而使两者之间高度的理解和合作成为可能。

第三步：回顾　规划和回顾不应因搜集了基本资料和确定了优先事项而停止，而是正相反。即使永远没必要重新编制基本清单，还是应该经常地回顾信息媒介在国民发展中的作用及其问题。在许多国家，传播发展是国家计划的一部分，同国家其它部分的发展一道不断受到研究和修正。不管是否如此，任何一个广

泛代表政府和私营传播业的委员会都会对传播发展感兴趣。另一种可能是将回顾这一长期任务交给某个专门从事传播研究的组织，例如某个传播研究培训中心。但是，重要的是，要有主管人员思考传播发展的速度和性质及其在国家发展中所发挥作用的问题。

向国民提供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呢？新闻和公共事务信息的流通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需求？信息所不及的死点在哪里？经济社会发展——农业、卫生、改善社会条件、扫盲、教育等等——宏伟目标得到媒介的足够支持了吗？文化娱乐与公共事务和教育之间的平衡令人满意吗？对传播系统作哪些变革和扩充能有助于均衡覆盖面呢？

怎样才能使国家现有的设施产生更大的效益呢？比如，如果改善运输或提供公用报纸或增加报纸印刷量，能使大量现在没有报纸的识字人看到报纸吗？在某一广播电台覆盖的范围之内增加几百台收音机能对发展计划的有效性产生重大影响吗？有没有办法使现有的媒介有更多的用途？是否存在着可以加以利用却没有利用的广播时间？电影车在巡回放映途中能否将电影送到学校去？对现行作法进行试验有益吗？例如，目前，某个发展中国家用其第一个电视台每周播放几堂课和几次专题讲话节目。这个国家发现教学电视和电视收听小组有些用处。但其电视台信号只能达到几个村子，因此，一、二个小时的空闲广播时间可用来试验电视能否辅助这几个村庄的农业、卫生和扫盲计划。也可以在提供某个一般性电视服务之前对这种服务的某些内容进行试验。因而，某个现有设施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不断的回顾可以包括交流经验、交换材料，这些交流和交换也许可以通过区域研讨会或人员交流进行。有理由认为，某一地区的大多数或所有国家都出现过同样的问题，其中有些国家找到

的解决办法比其他国家的要好。同一地区不同国家就同样的主题编制了广播节目，拍摄了电影，或编印了印刷品也不无可能。这些提供了借以判断自己工作的外部标准，并可能包含着经过必要修改便可同其他国家共用的一些材料。能共用的高级材料越多，每个国家就有越多的时间和钱编制其他的高级材料。

但是，主要之点是，不应因制订了清单和计划而放弃传播发展的责任。这一责任应是积极的和不间断的。

培　训

传播的各个领域——执行信息与发展项目官员、新闻工作人员、节目与制作人员、书籍与期刊编辑、大众传播媒介教师与信息服务人员、广播电影技师、印刷人员、维修人员、技术员等等——都需要受过训练的人。发展中国家的这一需要几乎同对资本的需要一样普遍，但常常是有了渠道，受过培训人员的供应却远远跟不上。

尽管每个国家仍想派本国的一些有前途的人出国学习，但它最终还是想自己训练自己的传播人员。不过，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建立足够的培训机构——新闻学校、职业电影广播培训课程或学院、印刷职业培训、广播电影技校、印刷学校或者象印度所要建立的那种大众传播高级培训研究中心④——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已经有了一个或更多个广播电台和一家或多家报纸并打算开办更多的电台或更多家报纸的新兴国家，可以在现有电台或报社进行一些培训，也可以从国外现有的电台或报社借到有经验的管理人员。泰国在引进电视之前，先将未来的总技师派到国外技校和电视台学习几年，以获得经验。尼日利亚引进电视之前，先派